

炎黄春秋

YAN HUANG CHUN QIU



首次发表：

毛泽东在生日宴上讲的故事

首次揭秘：

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

首次披露：

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北戴河：毛泽东急召叶飞上将密谈

一个女人的乡村都市梦

上海滩的外婚介绍所

赵陀归汉与民族统一





专稿

人没有压力 是不会有进步的

/毛泽东 2

——《中共党史资料》与本刊首次发表毛泽东在自己生日宴会上讲的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人按整是有好处的……他的一生也是经常按整的。

英杰谱

北戴河：毛泽东急召

叶飞上将密谈/陈敦德 48

毛泽东请救兵

——南汉宸/邓加荣 8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汪东兴 5

春秋笔

许世友

在延安受审真相/莫文骅 14

——近年不少报刊相继发表转载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的事；曾参与此案时莫文骅将军认为不实，寄稿本刊披露许世友拖枪逃跑的事实真相。

保卫南京：

唐生智司令蒙冤

/宅巍德英 29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劭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孔

理事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贝兆汉 李广克

理事：白亚南 蔡道味

林春霖

秘书长：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100802

时代风

一个女人的乡村都市梦

/东平王凡 84

上海滩的外婚介绍所

/孙孟英 90

殒星篇

“我丁玲就是丁玲！”

/杨桂欣 42

——她和毛泽东交往亲密，反右时，毛泽东在国务会上点了她的名，历尽了20多年的艰辛。毛泽东辞世后，有人劝他揭露毛泽东……

陈独秀遇盗 /刘宏伟 41

古今谈

赵陀归汉与民族统一

/张克明 7

“中东路事件”与莫德惠

/刘作忠 95

轶闻录

首次披露：

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王晓桦 陈兴唐 22

——这里将打开一只真正的“历史黑匣子”，让广大读者真真切切地了解蒋介石早年的感情世界。

人海浪

伟人之女

李敏的近情往事

/王桂苡 52

——谁了解毛泽东的家事？谁理解毛泽东女儿甜酸苦辣的一生？请看本文真实的记录。

“老托派”郑超麟坎坷一生

/靳树鹏 68

——他曾是革命先驱，后来坐了三十五年大牢。如今已是93岁的高龄仍孜孜奋笔，他准备给人们留下一部鲜为人知的历史。

大陆“人蛇”出洞秘闻录

/向群 63

九州景

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

是谁设计的？ /舒云 37

神州光

炎黄文化一绝——璇玑图

/窦孝鹏 窦红梅 34

——一方图仅八百余字，却深藏七百余首动人心弦的爱情诗。此物现仍珍藏在陕西法门寺。

争鸣录

《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

/凌云 19

——这场版权官司打了好几年未曾了结。前国家安全部长特著文说明。

不该开的“天窗”

/贺星寒 82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①

● 毛泽东

(1960年12月25日)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在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帮助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②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③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齿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大使，也有契尔沃年科^④。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气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

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了，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的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张仪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

①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67岁寿辰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参加聚餐会的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江青的侄子王博文；工作人员有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吴旭君、张仙朋、林克、高智、李银桥、封耀松。

② 张仪，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任秦相。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字季子。曾任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赵国封他为武安君。

③ 鬼谷先生，即鬼谷子。相传战国时楚人，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

④ 六十年代初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在这里是讲故事作比喻提到他。

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①。“被开除过党籍”，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②。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③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书，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了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我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你们整风，批评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给你戴路线错误的帽子，就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嘛。总的说来是小事。我原说叫叶子龙同志参

加一下你们的整风，受教育，可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银桥同志不赞成。这次不参加也没有关系，以后到西楼机要室参加整风也可以。总之，不杀头，就不要紧，批评一下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们提出什么不让我下长江游泳，出去必须是三辆汽车。我说政治局决议都可以改变，就是他们的决定一点也变不得。又是规定什么只能在小游泳池游，只能在体育室活动。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同志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到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和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怀恨在心，大概他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我这几个孩子，发烧回来，我见了就心软了，叫他们在我的灶上吃饭。李讷，你在学校发了烧，我们的医生、护士去看你，你还发脾气，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愿意见他们。实际上你心里高兴，家里有人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你们系里有七八百人，如果有一百来人生病，都有家里人来看吗？你们学校里的同学，有多少人有家在北京？百分之十、二十、百分之三十吧！那么至少还有百分之七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受到大的处分。第一次是1927年11月，在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责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撤销毛泽东的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后讹传为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第二次是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七大”在龙岩举行，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若干原则问题作了结论，毛泽东的许多重要的正确意见未被肯定，宣布给他严重警告的处分。第三次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② 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1933年3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的“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实际上是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一场斗争。

③ 克劳塞维茨(1780—1831)，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将军。《战争论》是他的主要著作。



十同学的家在外地。他们这些人病了怎么办？一有病统统都回家？不可能。还不是在学校的医院里住？在学校里看病，还不是都要医好的？这次学校里总支书记还去看了李讷，她就高兴得很嘛。你们病了回家来，还不是想吃两天好的？吃两天就吃两天吧。我听到发烧到三十八度，心就软下来了。

在我们毛家，我这一代以前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毛岸英、毛岸青他们在苏联上的是军事学校、东方大学，还不是正规大学。现在你们三个^①，你^②和我也有关系，算四个，都要读成功。一下子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了。

从前有个八岁的小孩子，到了阎王老爷那里。阎王要把他下油锅，油烧得滚滚的，一丢进去，结果没有什么动静。阎王到油锅跟前一看，那个小孩子在油锅里游过来游过去，看样倒舒服得很。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我是汉口人。阎王一听，说：怪不得，你是汉口人噢，不怕油锅烫。原来汉口的夏天是很热的，汉口人是热

惯的，经受了锻炼。阎王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说：算了吧，放他回去。看来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

我的意见，林克、高智、小封^③等几位同志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你们看怎么样？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还有你，王敬先同志也下去，好不好？我看到山东去，不要到你的江苏去了。你们都赞成吗？赞成，那好。我们做一个决议，看什么时候走，说走就走，过了阳历年，一月二日走怎么样？那就这样决定吧。

现在下去苦得很啊，一天只有很少几两粮食吃。你们受得了吗？不怕就去。下去以后，一个礼拜来个报告，直接写给我。三个月回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到你们真正活不下去了，不行了，快要死了，打一个电话来，我们来把你们接回来。好，就这样决定吧！

① 指李敏、李讷、毛远新。
② 指王博文，江青的侄子。
③ 指封疆松。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 汪东兴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月28日清晨到达北京。当天上午，我到中海室外游泳池，见到毛主席，他正在看书，还未睡觉。我走近主席身边，轻声地说：“主席，还没有休息呀！”主席抬头看见是我，很高兴，说：“睡不着，出来晒晒太阳。你坐吧！”

我坐下后，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我说：“今天早晨6时左右。”

主席问：“住在什么地方？”

我答：“住在中直招待所。”

主席又问：“是谁通知你来的？”

我答：“公安部徐子荣同志。”

主席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君子协定，下放3年，现在多久了？”

我说：“我是1958年3月10日到达江西的，至今两年半，到1961年3月满3年。”

主席微笑地说：“还差半年时间，怎么办呀？！”

我回答：“听中央、主席的。”

主席听了我的回答，又点点头，表示满意，然后缓缓地说：“有的同志向我建议要你提前回来。”讲完后，眼睛看着我，像是听取我的意见。

我明确回答：“工作上需要可以提前回来！”

主席见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就说了目前有三件事待我回来办。

第一件事，我们和北边的关系紧张，超级大国威胁我们，要准备打仗，还可能打原子弹。目前我们还没有原子弹，将来会有的。现在中央决定要搞国防工程，防原子弹工程。有关首脑机关的工程，你要过问和参加。

第二件事，有人揭发中央警卫团外围警卫部队中有一个反动组织，是真是假，你回来抓紧调查处理。

第三件事，我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自我批评和批评，搞好团结，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件事待你回来负责抓。

我听了以后对主席说：“我回江西交代一下工作就回来。”

主席问：“要多久时间交代完？”

我计算了一下，来回路上4天，交代工作时间大约1周，共10天左右时间就可以了。

主席站起身来，说：“好，你明天回江西。”

我刚走到勤政殿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赶到我身边，说主席叫我回去，还有话要谈。

我又回到主席处。主席说，那三件事要抓紧办，要我打个电话给江西省委杨尚奎或邵式平同志，要他们把我担负的工作指定别人管，以后再抽出时间回去交代工作。并说：你今天回中直招待所休息，过了国庆就搬回中南海。

事后我把主席交办的事，分别向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和周总理作了报告。

1960年10月2日，我搬进中南海南楼的一层房子住下。3日下午见了毛主席。我把如何办

好三件事的想法和对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小整风的安排，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我说：进行小整风，首先，学习主席《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等文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其次，坚持正面教育，采取漫谈的方法，互相谈心，互相启发；然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把思想作风整顿好。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时间安排50天。主席对这样安排表示满意。说：这样做方向明确，办法对头。你召集他们开一个会，宣布做法。

1960年10月6日，在小整风的安排会上，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有帮助。毛主席还说，我在井冈山时，被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还传说开除了党籍，后来说我是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枪杆里会出什么政权，不懂马列主义，等等。这对我很有教育，使我看了很多书，后来还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书。我感谢这些同志，他们逼我读了些马列主义的书。大家听了毛主席亲切诚恳和富有深刻哲理的讲话，都积极地参加了小整风。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经过小整风，大家精神面貌有较大改观，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毛主席对我们这次小整风的成果是满意的。为了巩固这个成果，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认识，1960年12月25日中午，他请身边工作人员聚餐。参加聚餐的除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和江青的侄子王博文外，还有叶子龙、王敬先、吴旭君、张仙朋、林克、高智、李银桥、封耀松和我。

大家兴高采烈地祝贺毛主席67岁寿辰。边吃饭，毛主席边谈话：他从我们小整风说起，要我们从高从严要求自己，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引经据典，联系他亲身的经历，说明“人没

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鼓励我们认真改进思想作风，积极做好工作。许多同志放下筷子，用心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边说，边催促：“你们吃，你们吃呀！”这顿聚餐吃了两个小时。毛主席感人肺腑的谈话使大家深受教育和感动。大家认为，毛主席席间的谈话，不仅是对我们小整风的高度总结，而且也是鞭策我们今后不断进步的动力。聚餐结束后，我们立即把毛主席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作为今后的学习材料。

26日清晨，毛主席又给我们7位同志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

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我建议发表毛主席这次谈话记录。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虽然批评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但原文发表我认为不会损害这些同志，反而会使我们感到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如此坦诚相见，如此关怀，亲如手足。

这次小整风后，从他自己以身作则做起。他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因为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们欠人家的债要还给人家的，我看有米饭、有青菜和油、盐就可以了。”“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能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照价付款，钱由我稿费内开支。”

我们认真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了。记得当时各种实物付款有1万多元人民币。

（转载《中共党史研究》第46期）

赵佗归汉 与 民族统一

● 张克明

近二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聚居于岭南的居民,不断向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进行开拓,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蕃衍生息,他们仍然把故园的文化、习俗、意识保存下来,“宁卖祖田,不卖亚妈话”,这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表现。

可中原文化又是如何传播到岭南的呢?

据史载:秦始皇为了开发南越,即岭南广东广西地区,便把以前逃亡被获的人犯,全体释放,充作军人,使他们南征。按秦制,凡入赘及贩货商人,都被视作贱奴,也一齐南下,以后逐批从中原调发居民,统计有50万人之多,试想,当年全国人口不过2000万,南越地区亦顶多不过100万。50万人南下,的确是一支浩荡的南下大军。其时南海郡领导人南海尉任嚣早死,真正进入角色的是属下龙川县令赵佗。有同志说赵佗是中国第一批南下干部。

赵佗趁中原战乱,一面绝道据守,阻止北乱南扰;一面击并桂林、象郡,东西数千里,10年经营,自立为越南武王。这时刘邦在去世前一年,便承认南越王这一既成事实,遣辩士陆贾南下,劝佗称臣归顺。

陆贾将汉与南越两者在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的优劣,作了形势分析,使赵佗不得不信服。陆贾还在中间插了一段动情的话:“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这是很能打动人心的。游子思故乡,差不多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因素之一,现在每年有不少侨居海外的同

胞,每逢清明节,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回乡拜祖扫墓,心情亦复如此。

刘邦死后,吕后四年,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因此动怒,背了汉朝,称南越武帝,且疑是长沙王进谗,遂发兵攻长沙。长沙王上报朝廷,请兵援应。吕后特遣隆虑侯周灶率兵往讨,适值溽暑,士卒遇疫,途次多致病死。且岭南一带,由佗派兵堵截,无路可入,只得逗留中道。到了吕后病歿,才得班师回京。赵佗以兵威财物,赂遣闽粤,……共得地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建左纛与汉天子仪制相同,俨然称帝。

汉文帝再派陆贾出使南越。

赵佗向陆贾解释他造反的原因,中间有一条“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尽管政见不合,互相敌对,对方的祖宗坟墓却要尊重。汉文帝立即下令真定官吏,为佗父母坟旁特置守邑,岁时致祭,且召佗兄弟亲属,各给厚赐。并在给赵佗的信中,言明只要佗去帝号,服从中央,“岭以南王自治之”。赵佗深受感动,依据“岭以南王自治之”的诺言,赵佗锐意经营南越,与朝廷相安无事。他在位70年。其后数代不过20余年。总计“自尉佗初王后,五世93岁而国亡。”

赵佗如诸侯,以汉为中国之主体,但在南越,仍推行其原有的制度,颇有类于一国两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政权的分裂是暂时的,中华民族却是永存的。

南越有近百年之安定,中原南下50万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处,互相融合,把中原技术、文化、意识、语言延续下来。广州话至今仍保存如此多的古音。赵佗开拓了这素称蛮夷之地,建立有南国特色的文化,功不可没。

1996年是秦始皇南海建郡的2210周年,亦是龙川县建县的2210年,饮水思源,追念前贤,至时将邀请港、澳、台及海外人士参加纪念活动,并举行有关的学术讨论。

(责任编辑:卢弘)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原文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论文。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毛泽东请「救兵」



△1930年，南汉宸与杨虎城、周参谋晤于三原县

1940年冬，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发动围歼我新四军9000余人的皖南事变的同时，又调动几十万大军包围了陕甘宁根据地，修筑了一万多个碉堡，想把我边区军民困死、饿死。敌人狂叫“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对进入边区的行人严加搜索，连马鞍下面垫的棉花、饮牲口用的帆布桶都给没收去。弄得我们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笔，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更严重的是没有粮食吃，军队、机关干部和学校学生都饿饭。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从延安数万名干部之中大胆地启用了一个人，委以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的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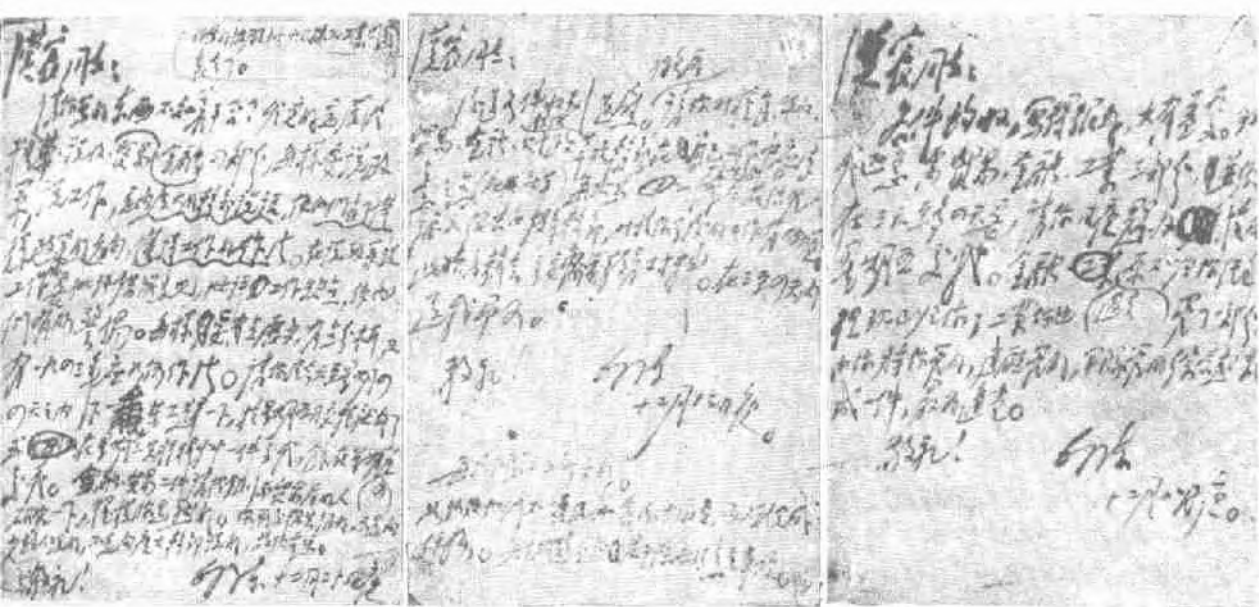
此人，就是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的南汉宸。

这天，南汉宸在吃晚饭时接到通知，要他夫妇俩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是毛主席有要事要找他们谈。十几里的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汉宸呀，形势严峻呀！我们可以说是揭不开锅了。”一见面，毛泽东开门见山，“你看，这日子过得多紧呀！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事情严重不严重呀？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的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因此我们研究后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要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

● 邓加荣



南汉宸大吃一惊，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找他们来是谈这个问题！

“我知道这是个大难题，文章不好做呀！俗话说，难为无米之炊吗！今天，就是要你能做出



△1937年，南汉宸到达延安

无米之炊来，没有米也能给延安这四五万人开出饭来！”

“主席，你——”南汉宸听到中央对自己这样的信任，虽然他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也不由得心口发热，喉头咽哽得说不出话来。

“汉宸，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呀！我们相信你会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难关给闯过去！”

这次谈话长达四小时之久，临走时毛主席送他们到窑洞门外，又叮嘱了一句：“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就这样，南汉宸从1941年2月起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的秘书长。

南汉宸接过边区这管家钥匙的时候，要什么没什么，而最为迫切的难题，又是粮食问题。

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土地贫瘠，加上十年内战，边区已是一贫如洗，因之抗战以来，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实行的是休养生息政策，轻赋薄敛，尽量不收和少收人民的税赋。政府机关和军队的开支，主要是靠中央拨款、八路军军饷，海外侨胞和大后方进步人士的捐赠。这些外援差不多要占边区全部支出的80%以上。这时边区机关、学校和部队所需的粮食，主要是从关中一带购进来的。自从1940年9月起，国民党停止给我发军饷，接着又对我边区实行封锁禁运，这

时我们不仅没有钱从外地购进粮食，就是购买了也无法运进来。最后，仓底都打扫光了。听说，粮食局仓库里有个叫阎麻子的过斗员，原是长征时的一位老班长，春节期间他见库里的粮食已经露了地皮，心酸地把带土的粮食用水淘洗干净，蒸了一盆米饭给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同志送去，算是给他们过个年。

有的单位，已经有几天开不出饭来了！

他去找粮食局长。粮食局长杨玉亭直摇头，望着露出了地皮的仓底，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

“南厅长，”粮食局长向他汇报说，“我们去粮食浪费的地方不少：仓库多是些破窑烂屋，缺门少锁，虫蚀鸟啄，自然损耗大；加上管理手续不健全，虚报冒领的事经常发生，各地用的升斗也不统一，漏洞很多……”

他又去找副厅长霍维德和前厅长张慕尧，两人都是长征时期的老干部。

“粮食，怎么闹得这么紧张？”他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事情的端委。

“说来这和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张慕尧认真地思考一阵之后说，“我们在执行政策中，曾有一段时间片面地强调要行‘仁政’。抗战初期，我们吃粮干部和军队人员少，外援也多，几乎不向人民征收粮食。后来我们供给制的人员增多了，由抗战初期的三万人增到五万人，可我们仍然不愿意去向人民征粮。即使去征，也只是向富有者摊派，中农以下几乎没有出什么负担，征粮的面很小很小……”

“我们总是强调量入为出，没有从革命需要出发，从革命必需的支出出发来组织收入。本来，去年9月蒋介石已经给我们断了粮，从外面购进粮食完全不可能了，各机关部队的自给经济还没建立起来之前，本应当下大力气从人民手中征粮和购粮来保障需要，但还是囿于仁政的思想，不敢放手去征去购！”霍维德说。

“我们一些同志观念中的那个仁政，实际上还是尧、舜、禹、汤、文、武等那种对待人民的所谓省刑薄税的想法，这样的仁政在战争与革命的今天是行不通的。革命的政府要给人民做更

多的事情，因而它也就必然要适当地取之于民。取不是为少数人享用，人民会很乐意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的！”南汉宸从理论上清楚地摆明了片面施行仁政的谬误。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去年本来明知要有14万石粮食才够支出，可是却只征收了9万石粮。留有这么大的差额怎么弥补？外筹是不可能了，只好临时抱佛脚，两次去向群众借粮，借粮不足，又用官价去买粮！”张慕尧说。

第二天起，南汉宸便与霍维德一起走访了延安、安塞、吴堡、清涧等几个县，与县里的同志一起座谈，仔细地算了笔账。回来后与县粮食局同志一起反复地核实，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抗战以来，我边区人口大体上保持在140万人以上。我们在1937年只向群众征募粮食1.4万石，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3%，每人平均负担一升多一点。1939年国民党开始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这年公粮增加到5.2万石，但也只占粮食总产量的2.9%，每人负担4升多。1940年我们连连带借带购加到一起，总共才9.7万石，占全年总产量的6.3%，每人平均负担7升多。根据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材料，去年四川一省征粮4800万石，按全省700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负担7斗，比我们多十倍。这些年边区政府奖励农耕，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显著地改善了。南汉宸他们这次下去也走访了十几户农家，因是新春，其中有六户农家在包饺子。这与革命前十户人家有九户身穿八卦衣、家无隔夜粮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组织征粮工作团，马上动身到农村里去，向群众借粮。”南汉宸断然作出决定。很快，一支有几百人参加的征粮工作团组成了，是由中央党校、抗大、鲁艺、陕北公学和政府各机关抽调出来的骨干力量。

南汉宸在动员报告时说：“关键的两句话，一定要反复地讲给群众听：‘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

数百人组成的征粮工作团分成几路，一竿子到底地深入到村。时正残雪未消，有多少机关、学校、部队正在等米下锅呢！



国民党一搞封锁禁运，陕甘宁边区各项物资更感奇缺。为了打破困境就得想法子冲出去，同边区外面进行物资交流，只能在素称陕北三宝的食盐、毛皮和甘草上打主意了。

但南汉宸调查后发现，三宝之中的甘草体轻堆大占地方，运输起来很困难。皮毛产量有限，边区军民自用尚感不足。剩下的只有食盐了。

我三边一带盛产池盐，其中以老池、莲花池、烂泥池、苟池、娃娃池、花马池为最大。远在清代就远销到关中、山西、河南、甘肃、宁夏、绥远一带。明末清初时，在兰州设有盐运大史，左宗棠治理西北时也曾把三边盐税作为他的一项重要财源。过去，这些盐池都是私人经营的，私人打盐，然后卖给驮盐的贩子远销到各地。为了充分利用盐的优势，南汉宸亲自到盛产盐的盐场堡和定边一带去和士绅们座谈，认为只要我们加强生产管理、改善运销条件，1941年里销出40万驮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把生产抓上去，组织运销，比去年增产一到两倍是完全有可能的。

南汉宸为此首先去找朱老总，争取到部队的支持，使驻扎在三边一带的军队也参加打盐，这样，我们就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民工盐户的私人打盐，一条是部队的兵工打盐。兵工打盐由于操作技术比较先进，抢打抢收及时，盐的质量要比民工打的好得多。对于民工打盐，我们也给予了一定的技术、设备上的支持。为此财政厅在三边地区专门设立了一个盐务局，负责统一管理兵工和民工的生产，同时也适时地规定出合理牌价，统一收购。

运盐出去也是困难重重，为此南汉宸想出了许多办法。首先，是发动军队和民工修整道

路，将羊肠小径变成直路、大路、能行车的路。用一个半月时间，赶修了定庆路（自定边经环县、曲子至庆阳）、庆临路（自庆阳经令水、富县至临镇）、延靖路（自延安经真武洞至靖边）以及衔接成渝公路到盘龙和甘谷驿的支线。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边区财政厅拨款10万元作为开石矿、添修桥涵等费用，动员了10多万民工参加了这一抢修道路的工程。第二年财政厅接着又拨款200万元，修通了延定路、定庆路，整理了延富路。

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在运盐的沿途上设立骡马店、转运栈，广种苜蓿，挖窖贮水，想方设法解决运盐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问题。为了鼓励边区的运输力积极参加运盐活动，财政厅明令规定：凡脚户或群众参加运盐的，其运盐的运费收入不交公粮。为了争取把我三边年产之盐都能运销出去，南汉宸代中共中央西北局草拟出《关于运盐工作的指示》，号召党政和群众团体机关都要抽调干部下乡组织群众运盐。例如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历尽了千辛万苦，亲自带领群众赶牲口去盐池运盐。为了推广他的事迹，《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高克林同志写的长篇通讯《鲁忠才长征记》，后来毛泽东写《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时，还把这篇通讯收进该书里边。

国民党对我们运去的盐，开头是采取堵截的政策，可他们的士兵每天也得吃盐，因此想要拒绝食盐入境就等于切断自己的活路；于是，不得不网开一面。但是他们又采取压价政策，把食盐的价格压得低而又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压价，我们在各口岸地方，如富县的茶坊，耀县的柳林、铁王，公水县的西华池等地都设立了盐业公司，将脚户运去的盐统一地收买下来，等到对方市场上出现了一定有利的价格时，我们再成批地推销出去。在日本鬼子将山西的潞盐和江苏的淮盐产地都占领后，秦晋一带的食盐只有靠三边供应。我们知道消息后立即将食盐价格提高一倍。开始时他们不接受，不准备进我们的盐。但他们库存不多，只熬了23天，阎锡山方面就主动找上门来按我们的价格来买盐了；西安

方面憋了一个多月后也妥协了。

南汉宸在盛产池盐的三边地区的盐场堡设立盐务局,使池盐的产量和质量很快提高,1941年的盐产量达到62万驮。

其间,他还在延安白家坪建立了三边区被服厂。他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和运盐队伍,从西安方面购得了20多台缝纫机。

1941年春,仅有80多人的边区被服厂28台缝纫机日夜不停地运转,硬是在两个月里,将四万多套单军装赶制出来,使边区的军队、干部和学员全都换上了新装。

一天,南汉宸刚从军需处回来,副厅长霍维德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拧着眉毛说:“4点钟,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下午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

“怎么,出了什么事了?”南汉宸已猜出原因的大半,但他还是想听听自己副手的看法。

“我们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霍维德说。

“噢,还写了两封长信!”南汉宸有些紧张起来,他记起边区政府里,近几个月来一直存在的激烈争论,许多人都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尽管他一再申述必办理由,但始终未能得到理解。

“此外,还有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高岗司令员在内都是一个意见!”霍维德说,“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我们没做,不等于民间没做呀!请问,米脂、绥德的义合、宋家川、螭蜊峪等几个小镇子,当年人贫地瘠,而这些年来怎么会发展成有几万人的繁华集镇呢?还不是靠从宁夏、绥远来的土特产经过他们那里倒手,才发展起来的吗?闭着眼睛不看现实不行!”

“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是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

“那样,我们也不必与邓宝珊将军握手,不必同李鼎铭先生讲合作了。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地主,还怎么能坐到一起讲革命呢?”南汉宸

激动地站起身来,来回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步。

下午不到3点钟,南汉宸便离开延安南门外陕甘边区政府大院,骑马直奔杨家岭。

窑洞里充满阳光。毛泽东笑盈盈的,南汉宸在他对面坐下,二人从容地闲谈起来。

“汉宸,你年龄多大了?没有我的岁数大吧?”

“我是光绪二十年生人,用西历来说就是一八九五年。”

“比我小两岁。是哪个月份的?”

“十二月十四日”。

“是阴历还是阳历?”

“是阳历,我查过万年历,从阴历上换算过来。”

“噢,咱俩还是同月生人,我们也都是快到50岁的人了!”

几句闲话讲过,话题自然转到土特产的事上来,毛泽东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

南汉宸见主席这样虚怀若谷,心气便也平和下来,于是便将所面临的窘境和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后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噢,这么严重了?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泽东诙谐地问道。

“是啊,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自从主席在1939年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机关单位都开始开荒种地,在工业上发展了织布、纺线、织毛衣、袜子,自己生产火柴、肥皂、瓷器等等,减少进口货物总价达300万元,成绩可以说是非常可观的!”

“这也就是我们要下决心修复栈道的理由,虽然是峭岩陡削,我们也非要下决心把栈道修好不可!”毛主席说。

“遗憾的是,把这些栈道都修通了,我们还是走不出去。我们已把大部分干部都动员起来,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 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连区长和区委书记都亲自带上运输队去运盐了。征粮工作团连除夕的夜晚还在农村里征粮，结果，年终时的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路，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

“春天不是发行了500万元公债吗？”

“不是500万，而是680万，但这也只能解救一下燃眉之急。不能让我们彻底地度过艰难的1941年！咱们边区的收支，大体上是这样一笔账：我们出口的东西（包括全力以赴组织人力向外运输的盐在内），只能占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每年输进来的物资却要占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出口和入口相较，超数量太大。怎么办？我们边区又没有金子银子，只好靠货币发行来弥补亏空。现在边币发行的数字已经很大，币值一个劲地往下跌，比如，棉衣过去是70元一套，现在是300元，再发行就无法收拾了。那怎么办？必不可少的开支总得设法保证呀！”南汉宸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说。

“是呀，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汉宸，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

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路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走。那么，就只有走第一条道。当然，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要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因为没有抗战，不打走鬼子，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要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说服动员，发动大家一起来讨论……”毛主席深入地剖析事情的成败得失和二者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说一千道一万，路只能走第一条，想法子弄到粮、弄到钱、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在明修栈道的同时，也要想法子暗渡陈仓。否则，只有困死、饿死或者解散。

于是，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有一天，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拍着肩膀说：“你们先生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说着竖起个大拇指。

(责任编辑：仲文)

1993年《追求》杂志第二期发表了《许世友蒙难记》一文，上海、北京的报刊竞相转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莫文骅将军对此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将他为此写的文章交本刊发表。我们认为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提出新的史实和看法，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和正确地了解历史，有利于弄清历史真实情况，求得共识，这对于解放思想和团结同志是有益处的。我们欢迎作者、读者经常提供这方面的稿件。

——编者

许世友



△红军时期的许世友

在延安受审真相

● 莫文骅

前几年，我看过叛徒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也看过别人写的一些回忆录，谈及1937年4月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十多个军师级干部，在“抗大”学习时，由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批判张国焘的不满，组织了一起企图拖枪逃跑事件。最近，又看到《追求》杂志刊登衡学明同志的文章和上海《文汇报》及北京《文摘报》的详细摘录转载。这件事，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已正确处理过了，现在又公开提出来，我有责任将经过的实际情况说出来，以供读者们参考。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期毕业学员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由于“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干部的需要更加迫切。1937年2月，毛主席派林彪、刘亚楼和我到延安，筹办“红大”第二期。那时，红军主力汇合，大批红军干部需要培养；同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稍微放松，国统区的大批爱国知识青年涌向延安，纷纷要求入学。因此，学校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扩大招收学员1300多人。“抗大”校部设在延安原师范学校院内（和学生住在一起），学校组织机构业已初具规模：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杨立三任教务部长、邓富连（邓飞）任校党总支部书记。后来刘伯承兼任副校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从四方面军来了，校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

这一期开学正值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不久。由于全国红军的大汇合，第一次把一、二、四方面军军师级干部汇集在“抗大”学习（主

要是四方面军干部和少数一方面军到四方面军工作的干部，他们集中在第一、第二队）。这就可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总结交流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进一步肃清“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从思想上统一和提高认识，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中有一项是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积极贯彻“延安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这是一次极为生动的、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根据中央决定，学校的方针是把批判张国

焘与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过去是有功的，是好干部），在认真学习中央决定和有关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学员联系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反党反中央的所作所为，进行回忆和对比，深刻认识、分析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不管哪一方面军的同志，大家敞开思想，站在党的立场，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讨论。当时朱德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曾到“抗大”亲自讲党的建设，号召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这次教育，完全是正面学习，没有搞任何的过火斗争。当然，斗争中可能有个别过火言论，但都及时纠正了。没有说什么“土匪”“枪毙”的，更没有动手打人，因为这是党内思想斗争。文章中说，学员钱钧在斗争大会上打张国焘，钱钧是许世友的“师弟”，毛泽东在场不制止。这话不对。1. “抗大”没有对张国焘面对面的斗争。他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抗大”无权把他弄去斗争，就是中央扩大会议，对张国焘也只是背靠背批判，他没到会。2. 毛泽东从来没参加过“抗大”斗争张国焘的大会，也没开过；至于“托洛茨基”这个词，当时没有用过。只在“七·七”抗战后，社会上批判在山西太原的托洛茨基份子张慕陶破坏抗战时，“抗大”才用这个词，这是3个月以后的事啦。是批“张慕陶”，不是批“张国焘”，大概误传了。当时，大多数的四方面军干部态度是端正的，拥护中央的决定，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并敢于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其



△1949年许世友（右1）在解放长山列岛前沿阵地上。



△一九八二年九月，许世友、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在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

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所以他决定不走了。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能走了。但他们逼他一定得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经过仔细考虑，不得不亲自向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我听邓富连讲完这件意外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自有红军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是破天荒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决定让邓富连同志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同时，我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跑了几处都没找着，于是只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长。得知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我即去找他。主席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只过一条街，很快就找到了。我向林彪详细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先回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待向毛主席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这样，我便急忙回校了。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消息没走漏出去，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尽管如此，我还是向保卫科同志及身边人密告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我和邓富连及谢富治，还有保卫科同志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立即将许世友等一伙人逮捕，以防止事变的爆发引起恶劣的后果。于是，学校于下午4时吹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高干的第一、二队学员也到各自教室开全体会议。第一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第二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由傅钟向一队，谢富治向二队宣布了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宣布前，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派人把两个队的教室包围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了出去，由保安处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一共抓了有十多人。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了所有的手枪。这场危险的未遂事变，就这样被平息了，使“抗大”以至党中央避免了一次可怖的灾难。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开特别军事法庭公

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由各机关团体代表约150人参加。审判长为董必武，书记周景宁，陪审雷经天、周兴等4人。由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傅钟报告被告人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许世友等人供认：因对抗日统一战线发生怀疑，企图拖枪逃跑，去打游击，承认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法庭经过审理，认为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余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当时的《新中华报》于6月9日曾对判决许世友等人，作了公开报道。没过多久，党中央又决定对所有参与事变的人进行特赦，予以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党中央、毛主席这样做是对的，既严肃处理又宽大对待，是从团结和教育人的目的出发，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正确的政策，不仅是对于争取帮助许世友等同志起了好作用，而且对团结教育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全体红军干部，也起了极良好的作用。

那时，张国焘在延安。事情发生后，“抗大”震动很大，议论纷纷。学校在城隍庙门口坪里开大会，向全体教职员、学员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要张国焘去给大家，尤其是四方面军的干部讲一次话，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启发四方面军同志认清他的错误，站到中央方面来。张国焘迫不得已由朱德总司令、林彪陪同到会讲了话。他对自己的错误和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一字不提，却哼哼哈哈、不痛不痒地说什么“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更引起大家的不满和愤慨。当时，全校就此事开展了大讨论，大家列举了大量事实，愤怒地揭发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反党反中央的罪行，也批判了许世友等人的罪过。四方面军有的同志在揭发时甚至痛哭流涕，傅钟同志也作了长篇的揭发张国焘的发言。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是党中央到陕北后最大的一次党内斗争。这次斗争完全是以团结教育的方针，既挽救张国焘本人，又教育了四方面军的干部。但是张国焘后来表面上承认一些错误，实

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1938年4月，他乘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逃出边区，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不过，到头来只落得个孤家寡人，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带走。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反复曲折中，终于认清了张国焘的丑恶嘴脸，紧紧地站到党中央、毛主席一边来了。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英勇奋斗，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就是许世友等人当年企图拖枪逃跑事件的经过。下面再把几个有关的具体问题说明一下：

1.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355页中说，“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的指挥人（指批判张国焘）。在358页中说，“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这些完全是造谣。政治部从来没有派过工作组，因为只有两个队，用不着派。而且，罗瑞卿当时不在“抗大”，事件发生后，教育长刘亚楼因别的事被免职，罗才来任教育长的（不是副校长），我当时是副主任。

这本书的第364页中说，“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张国焘完全造谣，根本没有这个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抗大”学员开会，不会不告诉“抗大”的领导同志，而自己去一个一个地通知学员。我在“抗大”工作期间，毛主席从没有参加过“抗大”学生队斗争张国焘的支部会，只参加过一次总结会，时间是秋天。

这本书355页说：“学校中的武器，被收藏起来，以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如果枪都收起来了，那还会发生企图拖枪逃跑呢？真是胡

说。

张国焘在此书第359页中又说，在捕许世友等人时，“当时红军学校副校长何畏也被捕了”。360页又说“被秘密逮捕”，这更是造谣。何畏是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红一、四方面军汇合时，成立红军大学，他任政治委员（不是副校长）。在“抗大”学习时，表现不好，但没有参与企图拖枪逃跑一事，因此没有被捕。到秋天，他要求去西安治病，经罗瑞卿和我及邓富连研究，认为他过去有战功，应该让他去治病，经口头报毛主席同意，答应了他的要求。走前我们和他谈话，希望治愈早日返回延安，并给了一些国民党纸币。他嘴上很感激，表示治愈后即回来。但到西安后就跑了，不知去向。

2. 据我所知，许世友被捕后，宣判前毛主席没和他接触过，朱总司令也没有和他接触过。“抗大”没有警卫连，更没有“毛主席学问大还是张国焘学问大”之争。“抗大”领导人和学员混在原师范学校内住，没用卫兵。“抗大”门卫是由中央警卫连负责，这个连是一方面军的。在延安没有四方面军的部队。在当时毛主席威望非常高，而又处在反张国焘斗争时，一方面军战士不可能争论这个问题的。在干部中也没有这种争论。以上两点可能是“文学创造”。我觉得《追求》杂志衡学明同志的文章，对许多事没弄清楚，仅凭许世友个人档案的材料（我判断许世友的档案不会有这些材料），就说这是“冤案”，公布于世，是欠妥的。我认为：组织结伙拖枪逃跑，受法律处分是“冤案”，这种逻辑如果成立，我们手中有枪的人，尤其是带兵的高级将领，倘若自己觉得与党中央路线有分歧或对党中央有不满和委屈情绪，是否也可以率队逃跑，武装分裂，另立山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是国家的柱石，每时每刻都应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责任编辑：仲文）

《我的前半生》 是怎样问世的？

● 凌云



△作者凌云

溥仪《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是谁？早在该书出版之初，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时候，便已议论纷纷；此书绝非溥仪一人所写，必定

有一个“捉刀人”在。例如，1965年，加拿大汉学家陈志让教授和英国汉学家麦克利维在他们写的书评中，充分肯定此书的价值之后，都提到“捉刀人”的问题，陈志让还猜测这个“捉刀人”是个共产党员、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学者。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我当时的工作关系，熟悉溥仪的整个改造的全过程，也熟悉这本书的成书全过程。

建国后，我们关押了一大批在解放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战犯和一部分日本战犯，1950年苏联又送回来一批日本以及伪满战犯。所有的战犯被分别关押在几个战犯管理所内。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以及其他伪满战犯，都是被苏军俘获后于1950年移交过来的，他们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战犯的改造工作，一开始就制定了改造方针，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和作法。这项工作自始至终由公安部组

织实施。我被部党组指定负责各战犯管理所的联系，并处理有关的日常事务。

经过改造，战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改造战犯的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果实，出现了连国外舆论也承认的奇迹。在日本战犯中，一些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战士；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认清了中国的命运，成为拥护新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伪满，伪蒙的王公大臣，真正认识了过去卖国求荣行为的丑恶，开始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末代皇帝溥仪是其中突出的受人瞩目的一个，他经常向到战犯管理所访问的人畅谈接受改造的感受，以自己成为一个新中国的普通平民为荣。

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后期，纷纷拿起笔来，总结自己的过去，写出不少生动感人的认罪材料，题目大部分都叫做“我的前半生”。溥仪自己不能动笔写作，而由溥杰代笔撰写了一本50多万字的回忆录式的认罪书，题目也是“我的前半生”。此书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7年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此书经战犯管理所油印。

分送公安部及有关方面,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当时公安部办公厅负责人刘复之、席国光、王仲方等同志和我议论过这本书。我们认为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出这本书,用意是好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书中自嘲自骂的地方比比皆是,几乎每段叙述完事实就责骂自己一番。这种认罪过头也不是实事求是。溥仪从未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新人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叙述。不过从中还是能看出一个皇帝发生的变化,也能从近80年的动荡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大略看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当时不少同志认为,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将溥仪的思想转变脉络理清,就很有公开出版价值。于是,为广泛征求意见就将原材料交由群众出版社印成内部发行本,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在一定范围内购买阅读。这是1960年1月,溥仪刚被特赦回到北京不久的事。随后部里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主任李文达同溥仪一起来整理书稿。那时估计不足,想在一个月內完成改稿,后来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为了安排这次改稿,由我出面约请溥仪、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群众出版社负责人姚良和李文达都参加了,席间主要谈的是有关合作写书的事。

1960年4月,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住在附近的旧香山饭店。每天下午,溥仪到饭店与李商量如何整理书稿。共用晚餐后,溥仪回植物园,李就在住处动他的剪刀浆糊,另外,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整理稿中。这样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一个来月,全书还只整理出一半。两个月后,24万字的整理稿算是出来了,但这是一个失败的整理稿。李文达后来在汇报时说,溥仪很多事记不清,也说不清,他只能说出自己的感觉,而战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他说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所以改造工作如何进行,自己的思想如何转变,都说不清楚。对于历史事件的背景,由于他深居禁宫,也所知甚少。他对周围人物的介绍,都是大而化之。对于传记文学所必要的素材,非常缺乏。以溥仪经历之复杂,所处环

境之多变,结交历史人物之众多,世所少有,使一个常人,也很难记得全、讲得清,何况溥仪没有积累材料、记录生平的习惯。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了,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李文达建议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爬梳剔抉,提炼成文。

公安部有关的领导同志同意他的建议。他首先到东北做调查,大部分时间在战犯管理所,此外也到长春、哈尔滨等溥仪住过的地方。这年8月间,党组指定我和夏印、于桑同志、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和劳改局长听取李文达的汇报。他在会上讲了许多溥仪在改造过程中的非常生动的故事,都是溥仪没有讲过或语焉不详的。更主要的是,他抓住了溥仪由怕死不认罪到悔恨过去、向往新生的思想变化脉络。后来,溥仪对李文达就他思想转变过程的中肯分析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正是他要说而说不出来的。李在会上提出推倒原著、另起炉灶的方案。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同意,并积极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要李完全脱产写好这本书。这次会议的记录和李当时提出的方案以及后来的手稿都存在群众出版社的档案里。

汇报会议以后,李文达即按既定的方案做进一步的采访、查档、翻资料,并开始写作。1962年6月,初稿已印成大字本,分上中下三册,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2年10月,又印成修改稿大字本上下册送各有关方面。1963年杀青,此时已三易其稿。在送印刷厂校对期间,又在校样上作了9次修改。因外文出版社根据陈毅副总理指示急待将此书译成外文,经新华印刷厂突击赶印。本书于1964年3月正式出版。

此书的完成,离不开群众出版社的资料后盾,离不开各大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支持,离不开李的几个助手的辛勤劳动。但最根本的还是李文达本人的刻苦努力。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经常彻夜工作。他曾在我主管的局工作五年,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他做调查研究十分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这个作风在他写《我的前半生》中又有



△《我的前半生》和各种外文版本



△薄仪与李文达



尽情的发挥。据我所知，他为了研究薄仪的性格、思想和跨度 80 年的历史背景，给薄仪周围的重要人物都做了专题研究，写出每个人的传略，对围绕薄仪的重大事件，也都做了专题研究，写成专文。仅是编写有关事件的大事记、年表，就有 20 余种，100 多万字。有人说，李文达写作使用资料重量超过一吨。究竟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这决不是无根据的夸张。1984 年，国家版权局在(84)权字 7 号文件中确认该书为薄仪和李文达的合作作品，二人为合作作者，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在写作过程中，李文达和薄仪一个是末代皇帝，一个是传记文学的作者，已经结交成为一对好朋友。薄仪对李无话不谈，大小事都要与他商

量。薄仪曾表示，在老李帮助下，较系统地为此书而研究了一遍近现代史，使他眼界大开，思想境界又有新的升华。而李文达也觉得自己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尤其加深了对党的改造政策的体会，他与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也成了好朋友。我听到这些汇报以后，当时就有个感想：我们政法机关的监狱和劳改队对犯人的教育，特别是重要犯人的教育，决不能仅限在铁栅门之内。我们劳改单位对释放人员走上社会后仍负有责任，特别是对那些重要的释放人员，要配合各种社会力量继续做好工作，给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对薄仪来说，他与李文达合作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继续接受教育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党给了薄仪巨大的关怀。

经过这本书的写作，李文达与薄仪家族也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和他们保持了经常的真正朋友的往来。爱新觉罗晚一辈中有人对李文达说：我们全家都感激您。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本书李与爱新觉罗家族的交往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成为他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有人明知这本书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欣赏，但能为他说话的人不說話，想为他说话的人不能说话。就这样，李文达就白白地被关在秦城监狱里六年零九个月。我想，现在把《我的前半生》成书的过程公开写出来，是时候了。

(凌云：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首次披露：

蒋介石

抹去的

婚恋日记

● 王晓华 陈兴唐

最近，各种版本的《陈洁如回忆录》风靡海内外，有人称为历史的“黑匣子”。本文作者有幸翻阅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从那些被删节的未发表的内容中，发现了“真正历史的黑匣子”，他们从中整理出一部份，让广大读者了解蒋介石早年真实的感情世界。



1921年，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的感情日趋冷淡，“甚至不愿同食”。4月3日，蒋介石在溪口丰镐房内看《通鉴》，“见毛氏与经国擅自城舍（宁波城中的屋舍）归，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此刻的蒋毛婚姻已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竟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图痛苦。”此时，蒋母王采玉病重，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看见家庭破裂，因此主张毛氏回家，结束分居的局面。一向以“孝子”自居的蒋介石，掩饰不住对高堂的怨恨，在日记中写下：“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

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重圆破镜，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拟发最后离婚书。”

尽管蒋介石对母亲包办的婚姻，下定分手的决心，但为了母亲的病，还是暂时维持着婚姻关系。蒋母病故后，蒋介石以沉痛的笔调，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写了一封信，请其做毛福梅的工作，同意其离婚的要求。信云：“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定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痛苦。”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张静江寓所，结识了少女陈璐，一见钟情，感情发展迅猛。

这里需要提及蒋介石与其妾姚冶诚的关系。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接结青楼女子姚冶诚，后纳为妾，以弥补与毛氏婚姻之不足。但日子一久，狂热的爱情，好象天天吃山珍海味一样，也有腻的时候。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略择几段，便可说明：

1919年4月13日：“以妾贪，怨怒并集。”

10月18日：“冶诚赌博不休。”

1920年1月1日：“早晨未起床，瞥见楼下电灯尚明，（冶诚还在打麻将）甚恨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可胜言。”

蒋介石经常对姚冶诚寻衅：

1920年1月18日：“中食，以发恼投箸外出。回则见冶妾独自属履，大骂一顿……”

“中食于静江家，为治诚事呕气受辱，实难为怀也。”

2月8日：“近日益忿妾举动之贼劣，心术之狠贪……”

5月10日：“近日治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

5月23日：“昨日治诚来（病）院，余见之，心甚愤恚，病症加剧，因即令回寓，不欲其在旁侍候也。余夙罹孽重，遇此冤家也宜哉。”

6月16日：“听母亲教训，述及治诚性行之凶狠，令人发指。余再不下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裸虫也……”

6月24日：“治诚又来讨气，被妇悍泼，不可言状。得罪于我，又得罪于我母，使我母心疼病重，我置妾之辜大矣。懊悔曷其有极。治诚去后，忧愁闷忿佛郁牢骚，自坠地以来，未有如此之甚也。晚外出闲散，聊以舒怀。”

6月28日：“此次离沪游普陀，非行乐也，乃为治诚所逼耳。”

从上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姚冶诚的悍泼、贪婪、赌博、不知治家、不懂孝道，都使蒋介石气恼，况且蒋姚间经常大吵大闹，惹得四邻不安，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写下：“处置治诚事，……静江、季陶、觉生诸兄，俱来商量此事。”张静江、戴传贤、居正都是党国要人，都来商议蒋氏与姚氏感情纠葛之事，可见影响之大。但是蒋介石采取冷处理的方法与治诚分居，主要原因是：“盖因去之……则纬儿（蒋纬国）无人抚养，恐其常有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这说明姚冶诚手中有张王牌，即她抚养着蒋纬国。蒋介石舐犊情深，投鼠忌器，只有自己找心理平衡，在日记中写道：“吾谓中国妇女，现在决无解放之可能。诚思多少祸胎，由妇女而起；多少事业，为妇女所败；多少英雄，受妇女所累。自今

而后，吾将奉独身主义，不再造此罪孽矣。”家庭矛盾，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竟想出家当和尚，“我为何还恋尘缘而不自解脱耶？”但蒋介石还是有七情六欲，与姚氏不在一起时，也不由自主地生出思念之情。并写下情意绵绵的信。

192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香港给远在宁波的姚氏写信云：“治诚妹鉴：我昨日到香港，现住在浅水湾香港酒店，风景甚好，惜纬儿与你不能同来也。你病如何？不甚念念……”

同年12月31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从广东起程去广西桂林组织军事。行前，遥念亲人，手执羊毫写道：“治妹鉴：前寄纬儿两函，想已收到，中正定今由香港起程往桂林，路上约须半月工夫，甚寂寞也。贵恙如何？甚以为念。家乡不知太平否？如恐危险，可往城中陈先生家住过年（陈志坚，就读奉化新女校时曾与毛福梅同学，后做了蒋纬国的家庭教师，故蒋称之为陈先生。笔者注），待明年正月底，再回溪口往家亦可也。人在家无事，请每星期写一封信来，如有要事，可托上海发电报也……”

此刻姚氏纸贵，不啻万金。

1922年1月24日夜，蒋介石在桂林旧藩署八桂厅院中仰望满天星斗，不由牵肠挂肚地想起故乡的亲人，提笔给姚冶诚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信：“治妹鉴：兄在桂林，日夜想在家过旧历年之心甚切，因之无时不想着你与纬儿也……”

春节后，蒋介石按捺不住缕缕涌出的思绪，又给姚氏写了一封信：“治诚吾妹爱鉴：我在此地，心里烦闷，恨不得从速回家享福……这一回，总算来得顶不好了。但是已经来了，只得跟着老头子（系指孙中山）做一天算一天就是了。”从蒋介石的几封家书中，笔墨间飘逸着一种爱恋情愫，再

也不是怨气冲天，“怨怒交并”的嘴脸了。

蒋姚间的关系，此后一直保持分居状态，姚氏一直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直到六十年代在台湾病逝。

二

蒋介石与陈洁如认识的时间，是在他与毛氏的关系降到冰点，与姚氏的关系不冷不热的时候。大致时间是1921年8、9月间。

1921年9月9日，蒋介石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陈洁如”的字样，记载如下：

“惠寄璐妹后更名洁如书。”

这年11月17日，蒋介石回家葬母之际，“给讯璐妹。”忙至12月11日，蒋介石告别母墓，第二天回到上海。

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璐妹来省近侍。”

这短短的几个字，包含了多层意思，说明这一夜，二人如胶似漆，继



静江二兄惠存

△蒋赠张静江照片

▽陈洁如
△宋美龄



修母墓工程，至5月22日，携纬国离家赴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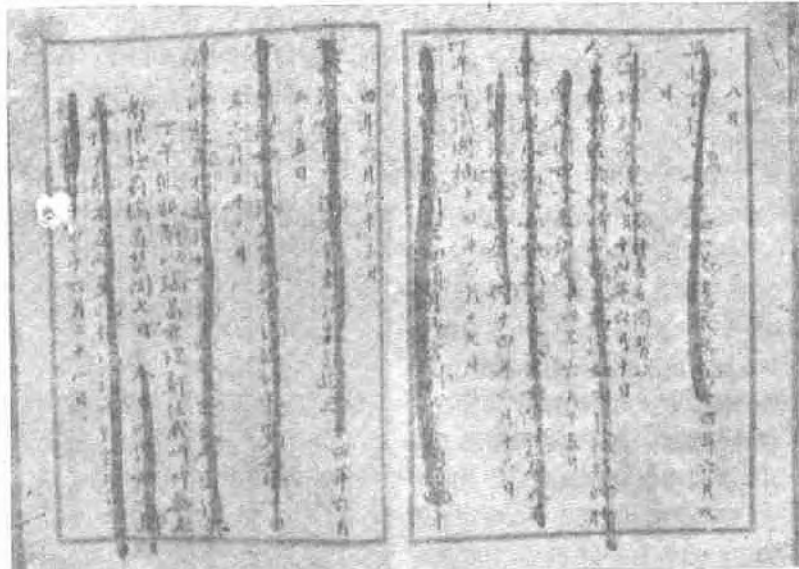
5月23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找陈洁如。是日日记：“晚，访璐妹。”

此次沪行，前后共8天，蒋又回奉化监修母墓。

1922年6月18日，蒋介石得到汪精卫与孙中山的电报，知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电报催蒋“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当即做好“间关赴难”的准备，不久到了上海。

6月2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晚，璐妹来探，即去。”

这几日，蒋介石还向张静江托付后事，心情自然沉痛，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劲头儿。为了解忧，他于6月24日“晚，与璐妹并坐汽车，游览夜景，以粤难无法解救，聊以写我忧耳。”6月29日赶到白龙潭的永丰舰上。孙中山顿觉有了依靠，他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个来此，不啻增加两万援兵。”陈洁如并未随行。1922年6月30日：“上午，发给冶诚、璐妹讯。”这里，说明《陈洁如回忆录》中伴随孙中山在舱底，并在叛军开炮时，吓得尿水横流的情节，全系



△毛思诚集蒋介石日记，蒋审查时抹去其中一部分。

缙反侧。第二天蒋介石去广东，筹划北伐作战计划。

从1922年1月上旬起至3月下旬，蒋介石在桂林给陈洁如写了8封信。

2月9日，蒋介石徘徊在八桂厅的庭园中，“静对明月，每思家乡上灯节之闹热，心辄彷徨。”不由地长发感慨：“诚璐与纬儿三人，有一在此，即

足以慰寂寥……”

蒋介石此次桂林之行，劳而无功，在讨伐陈炯明的问题上，孙中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蒋便心灰意懒，辞去大本营参谋长之职。孙中山“恳切慰留”，但蒋介石决心做了俗人，于4月23日乘轮北返，28日回到奉化老家。

此阶段，蒋介石的主要任务是监

伪造。当永丰舰冲过车歪炮台时，只有蒋介石与孙中山同舟同济，于是孙中山表扬蒋“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画多中，乐与余及海军人士共死生。”是年8月14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回到上海。

此时，蒋介石经过一番磨难，又回到歌舞升平的上海滩，再次见到陈洁如，悲喜交集，大有恍如隔世之感。这对鸳鸯的感情一发而不可遏。请看蒋介石日记：

8月15日：“晚，宿于璐妹家。”

8月16日：“傍晚，与璐妹同乘汽车，往北新泾游玩。”

9月10日：“访璐妹三次。”

9月12日：“下午，寄笺与璐妹。”

10月4日：“晚，璐妹来旅社。”

10月5日：“晚，偕璐妹纬儿往观影戏。”

10月7日：“领璐妹纬儿至极司非而路晚餐。”

同年10月11日，姚冶诚带着满腹妒火，从宁波来到上海，蒋介石“见其面貌凶狠，心甚不快。”而又无法哄得一对佳人都满意。12日晚，外出散心解闷，“携纬国观剧”；他在日记中感慨道：“嗟乎，家族之累人极矣，吾何以摆脱之？”

姚冶诚是旧人，陈洁如却是个十几岁的新人，温故而知新，于是姚氏的忌妒，并不能阻止陈氏之温柔，反而更把老蒋推向陈的一方。有日记为证：

10月16日：“晚，璐妹见过。”

10月17日：“晚，璐妹来访。”

10月18日：“晚，璐妹又来。”

10月19日：“下午，候璐妹。晚，偕璐妹观剧。程艳秋之貌及唱，似皆不及梅兰芳也。”

11月29日：“下午，访洁如。”

12月4日：“下午，璐妹随侍。”

12月5日：“晚，璐妹与纬儿玩耍。”

12月6日：“晚，璐妹来会，十时去。”

从以上日记中对陈洁如的记载来分析，蒋陈的关系已发展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境地。在蒋介石的笔下，是带着一种满足、欣赏、爱怜的心态，对陈洁如进行描述的。他写道：洁如“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此阶段的陈洁如还是一个不带俗气的，纯洁天真的温情少女，对此“冶诚妒态时现，终欲使人不乐何。”（1922年12月13日日记）可以说，蒋介石与陈洁如的感情已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改不了既得陇又望蜀的本性，就在这一时期，他应邀去莫理哀路孙中山宅中参加宋子文举行的一个晚宴，一位风姿绰约、仪态大方的青年女子，使蒋介石一见倾心，宋子文把她介绍给蒋介石，说是他的小妹宋美龄。不久，他迫不及待地向宋子文提婚，被宋子文礼貌回绝。蒋介石并不死心，请孙中山帮忙，并对孙说：“你认为可以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孙中山认为不可能，但还是将此事与宋庆龄商议。据说当时宋庆龄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去，也不愿她嫁给这么一个人。”

此时，蒋介石还狂恋着陈洁如，宋美龄又另有新属，此事暂告一段落。

三

当时的蒋介石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仅仅是一个小角色，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陈洁如也仅是一对平常的老夫少妻，陈洁如与姚冶诚的争风吃醋，撒娇使性，恃宠专横，都可以用年幼无知来解释，不但令蒋容忍，相反使蒋感到高兴。如果就这样过下去，也许会夫唱妇随，白头到老。蒋介石写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便可以说明，当时蒋在感情上是离不开陈

的。1924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蒋介石携姚冶诚、蒋纬国到达广州。陈洁如视蒋中正的举动是既不中又不正，感情的砝码倒向姚氏一方，是令陈洁如不能容忍的。她大发脾气，向蒋介石发出通牒，表示要一刀两段。老蒋吓坏了，急急忙忙给他的义兄，陈洁如的保护人张静江发出快信，请其给陈洁如作工作，转寰关系。信全文如下：

“静兄大鉴：今接璐君函，以纬国冶诚来粤，彼即不与吾相见，并作永远之辞。未知如何？现尚在沪否？其意究竟如何？请电复，敬请近安。

弟中正叩首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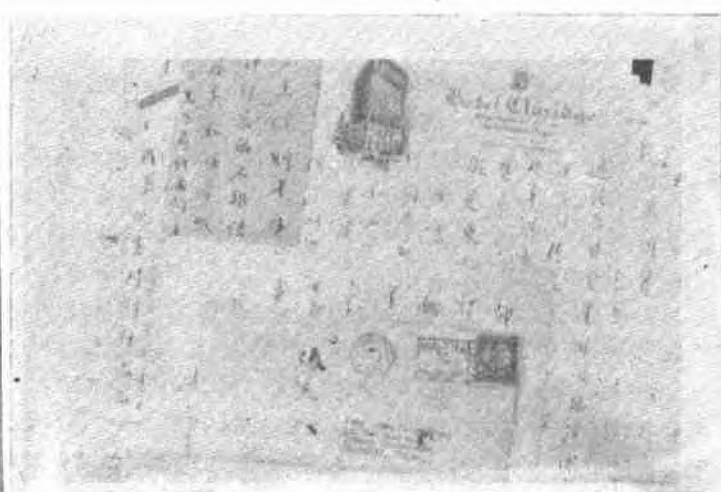
蒋介石和张静江间信函很多，但落款处用“叩首”字样并不多见，可见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这是蒋陈感情里出现的第一次危机。这是陈洁如威胁要蹬掉老蒋，而且动了真家伙。蒋介石是如何处理的呢？很多正史都论述，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决定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并在1月24日指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后指定在黄埔岛上旧有的广东陆军军校与海军学校为校舍。蒋手下的筹备委员共有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7人，2月21日，蒋介石突然具禀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并当即买舟北去。

蒋介石的出走，与财政经费有很大关系。当时孙科为广州市政厅长，杨西岩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二人拒发军校开办费，搞得老蒋大光其火，以“自维愚陋，不克胜任”为借口，拂袖而去。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其中有不能明言的理由即是：“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蒋介石明白，他与陈洁如的爱情不能靠写信的方式来维持，处理爱情危机的唯一方法，是回到陈洁如身边去。

2月2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



△陈洁如在美国



△陈洁如滬美期间，给国内好友张静江夫人朱逸庄的信。

民党执行部转蒋介石，催其回粤复职。一时间，廖仲恺、胡汉民、戴传贤、杨庶堪、汪兆铭等人纷纷电蒋。

蒋介石依旧恋着陈洁如，等孙中山让了步，答应了蒋介石“解散财团，刷新政党”的条件，黄埔军校的开办银子也到了位，4月21日，蒋介石才偕新妇靓姐，燕燕于飞，从上海大模大样地回黄埔军校视事。蒋介石此番闹得很过瘾，孙中山向他低头让步，廖仲恺、许崇智到沪、甬劝奉，胡汉民、汪精卫通电相催，他知道自己已成了举足轻重的“大腕”了。这真是料想不到的神来之笔，功劳的一半，在陈洁如的身上。

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为他日后宏图大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介石经常身披黑色大氅，身后有四个卫兵陪着进出军校大门，所有的军官、士兵看见他都要立正行礼，他把这些都列在黄埔军校的校训中。最后总结为“亲爱精诚”四个大字。

他的学生，黄埔一期毕业生宋希濂回忆说：“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孙中山的逝世，给他创造了一

个大好机会，在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纵横捭阖，运用自如地控制了纷乱如丝的政治局面，成了中国更大的政治舞台上闪闪夺目的“新星”。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爱情依旧是爱情，但理智已经显现裂变。

请看蒋介石的日记：

1925年4月20日：“近日不滿意于洁如，亦爱亦憎，情思缭乱。”

4月26日：“下午，携洁如赴汕，船次为情魔缠绊，怜耶恼耶，殆无已时。”

4月28日：“既不能舍之，又不肯谅之，大丈夫之于女子，何情痴乃尔乎？”

4月30日：“下午，与洁如游西湖，途中又生气。我为此碧玉，几病神经矣。”

5月22日：“昨夜又与洁如吵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乃一至于此。”

5月28日：“夜由汕头搭车船往海丰，睡至三时，浪入舱口，锦衾尽湿。此为洁如之物，不胜牵念。”

真是爱乌及屋，情思缭乱。当6月6日陈洁如要回上海时，蒋陈在码头上依依惜别，蒋介石倒像个情种，

“洁如返沪，终不放心，恨之而又爱之也，恨之而又惜之也。”蒋介石身陷在这情魔之中，他为这巨大的痛苦而无法自拔。陈洁如走后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思念洁如，疼忿交并，留舍莫决。终恐其离我以后，受骗受苦，故又不忍弃之，毋乃太恋乎？不知洁如之意，曾亦想乃将来之受骗受苦，而愿恋此不去否？女子情漓，英雄心醉，何其痴也何其痴也！”这段话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心情是多么矛盾与痛苦。这就是感情与理智的搏杀。他知道，陈洁如这样一位小家碧玉，天真幼稚，没有什么心机与手腕，无论如何不配做一位叱咤风云大人物的终身伴侣的，分手只是时间问题。但此时他与陈洁如的情感又是如醉如痴，他的感情是离不开陈的。

6月8日：“今日心气略舒，然终不能忘怀洁如也。”

6月9日：“早起，百忙中写寄洁如一笺，隐恨无穷。”

6月15日：“今日精神倦疲，时时欲睡。又为洁如事发征移时，特电纬国母子来粤。”

6月16日：“晨六时起床，为洁如事，痴想良久。男女问题，令人不能解决如此，其奈之何？”

蒋介石对陈洁如还是不能忘情，于是要陈洁如回到他身边，陈洁如迟迟不到，“时发暴躁”，蒋介石为何烦躁呢？因为6月23日这一天，广州军民学生为援沪“五卅惨案”，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沙基附近时，遭到英军射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一时，广州的气氛异常紧张。就在这个当口，陈洁如只身从上海乘轮返广州，蒋介石担心她的安全，自然乱发脾气。

6月28日：“晨六时起床，想起洁如前情，痛恨又起，几乎晕绝矣。下午，假眠醒，以瑞昌（蒋的仆人）亦坦盦，任我叫呼无应者，恨极，罚瑞昌禁闭七日。”为了陈洁如，警卫员也受过。

但是，陈洁如一来，俩人又恢复昔日的吵闹、生气。有时为了一件小事，蒋竟“迁怒洁如，噪闹镇日。”

8月1日：“下午，又与洁如纠缠。”

8月13日：“晚七时，未见洁如回，心又躁急矣。”

8月15日：“今早下床，发火气……洁如耐心侍奉，毫无嗔怒之态，亦可恕其既往矣。”

8月18日：“午正，回寓，见器物凌乱无次，大叱洁如，气煞半天……”

蒋介石喜怒无常，“性躁而僻”，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变态，只好“思读性理书以养之。”

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不久，便登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宝座，当时正是他的不惑之年，雄姿英发，气吞万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左右中国命运的时刻，于是陈洁如的爱情悲剧的帷幕拉开了。

四

尽管5年过去，蒋介石对宋美龄始终未能忘怀，而宋家大姊三妹这时

也来黄埔军校参观，蒋介石一见便心荡魂摇，不能自持。

他从心里感到十分矛盾，常对陈洁如“心躁色厉，使洁如难堪”，过后心又“甚悔”。但要与头戴“蒋总司令夫人”桂冠的陈洁如离异，就必须找出些理由。他6月20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洁如仍是一女孩，于不知治家之道。……”

7月10日：“今日以洁如治家无方，教育幼稚，不胜怨恨。”

7月30日：“以洁如不谙家世，心甚懊闷，驰函劝令读书。”

11月12日：“得洁如书，知其迁赁月租七十二元华屋，不胜恚恨。奢靡趋俗，招摇败名，年青妇女，不得放纵也。”

综合陈洁如的“罪状”不是治家教育孩子无方，就是任性、虚荣，奢靡趋俗。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7月2日，蒋介石“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这是最好的注脚，蒋介石已移情别处，心系佳人了。

1926年7月27日，蒋总司令誓师北伐。上午8时，他偕夫人陈洁如、公子蒋纬国和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由广州东山蒋公馆乘轿车至天字码头，转乘大南洋电船直驶粤汉铁路的黄沙车站，再从那里上火车去韶关督师。

在黄沙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国民党要员谭延闿、吴稚晖、顾孟余、宋子文、何香凝等及送行者二百余人。

蒋介石一行抵达后，与主要送行者站成一排拍照留念。蒋介石与陈洁如中间，站着加伦将军；陈洁如左边依次为何香凝、鲍罗廷夫人、顾孟余、鲍罗廷；蒋介石右边为谭延闿、吴稚晖、李福林、宋子文、李济深、雷铸寰与白崇禧。前排正中坐着张静江，身旁是蒋纬国。

拍摄完毕后，陈洁如已是泪眼如麻，蒋介石安慰她，并许下誓言，海

誓山盟。但刚一分手，戎马倥偬之际，于7月30日，便给他的义兄张静江写了一封信，为与陈洁如的离异，迈出一大步。信内容如下：

“二兄大鉴：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无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何？今日在乐昌休息有怀。

蒋中正

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从蒋介石蓄谋以让陈洁如出国的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到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上海新关码头登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止，共1年零19天。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陈洁如奉令出国留洋学5年，但一去便与蒋介石成为永别。

正当美国各地陈洁如欢迎热方兴未艾时，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上海大都会，申报在9月28日突刊《蒋中正启事》：

“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未有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蒋介石翻脸不认人了。“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蒋介石在经济上卡着陈洁如的脖子，生活费只能维持，便没有再多的了，连欲回国的川资也没有。不仅如此，蒋还利用外交手段，使陈洁如长期滞留美国。

蒋介石此时却对宋美龄大献殷勤，绞尽脑汁，写了一封颇为著名的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成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

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真是奇文共欣赏，蒋介石还厚着脸皮风尘仆仆，赶往日本之旅游胜地云仙，向隐居在那里的宋美龄之母倪桂珍处乞婚。

宋美龄却满怀喜悦，他回答《交通日报》记者的提问：

记者：“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女士当时作何感想？”

宋美龄笑容可掬说：“此是五年前的事情，当时我并不太注意。”

记者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宋美龄答：“半年前，但最近始有成议。”

宋美龄说的半年前，是指1927年5月间，蒋介石邀宋美龄幽会于镇江焦山，在明山秀水湖光山色中，二人聊聊我我，海誓山盟，别有一番浪漫情愫。法海和尚已无法阻止一出新白蛇传了。蒋介石当时便向宋美龄发誓。要赶陈洁如下堂，事实发展也正如此。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报登出蒋中正宋美龄结婚启事。5天以

后，蒋介石、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举世瞩目的婚礼。

蒋介石举起右手，虔诚地宣誓：“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宋美龄为妻。从此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

宋美龄将右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我宋美龄，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从你为夫。……”

婚礼主持人余日章大声宣布：“蒋介石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今日已在上帝和蒋宋二府的亲友面前交换戒指，互立盟约，结为夫妇。我现在郑重宣告你们二人已正式结为夫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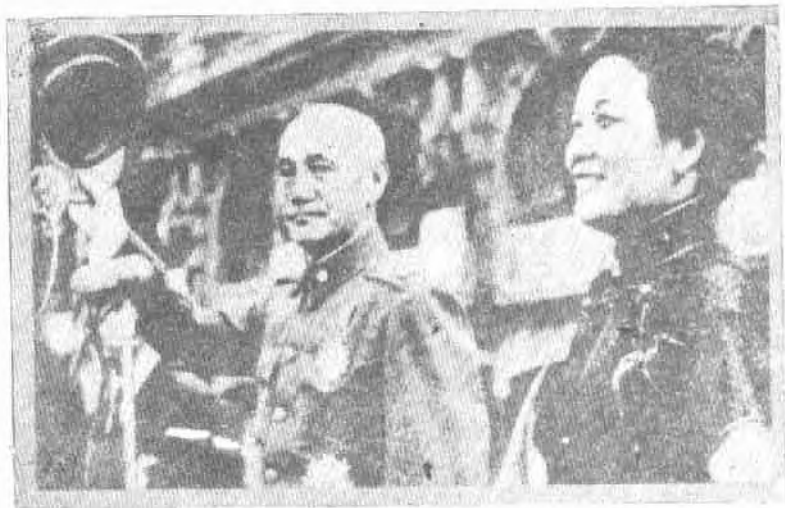
陈洁如的痛苦是深切而漫长的。1928年3月20日，她在纽约的一幢寓所中，于昏黄的孤灯下，给太平洋彼岸的好友朱逸平写下一封信：“吾可爱的逸姐姐……我自来美国后，只有写过一封信给介石，因我心中实在不忍作书与他，大半是我恐怕他们爱

好似鸳鸯般的夫妻发生冲突，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的。”写到这里，她伤心欲绝，泪流纸上。她抽抽噎噎，继续写道：“一口气只能闷在自己肚子中，我想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人可能知晓我心中的苦痛了。……”写到这里，她大放悲声……

蒋介石在新婚之际，能否想到陈洁如、姚冶诚、毛福梅？因为没有资料，笔者不能再杜撰下去，只知道蒋与陈分手的35年后，蒋已是75岁高龄的老翁，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托戴传贤的儿子戴安国给时居香港的旧情人陈洁如写了一封充满了真挚感情的信，信云中：“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在临终前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更是悲悲切切，她说：“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笔者写至此，不禁浩叹。只能用半阙宋词来结束此篇：

金剑已沉埋，壮气萧萧。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琼楼遥殿影，空照秦淮。（责任编辑：刘家驹）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



保卫南京： 唐生智蒙冤

● 宅巍 德英

奉命于危难之际

1937年深秋。

上海失陷，日军对于南京志在必夺。

12月6日夜晚，郊外隆隆的炮声，在南京市内已可隐隐听到。大战在即。敌人马上就要杀到南京城的门口。

在百子亭唐生智公馆的院子里和狭窄的街巷中，停满了各式高级的轿车、军用吉普车。一个连的宪兵部队，荷枪实弹地在公馆的四周负责警卫。

唐公馆的大客厅里，临时增放了許多椅子，里面坐满了守卫南京的高级将领。他们每人的领章上，至少都有一颗发亮的星星。这是南京卫戍部队的精英。此刻，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以及南京卫戍军正副司令长官唐生智、罗卓英、刘兴陪同下步入会场。

“委员长还在南京！”

蒋介石的出现，在将军们的心中引发出一股激情。因为事实戳穿了外界关于蒋介石已离开南京的传闻。

蒋介石走到主席位坐了下来。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地，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

固守。”

蒋介石稍作停顿，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正襟危坐的部属，把话锋一转，说：“战争的形势在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责任逼着我离开南京。这在我的内心是异常沉痛的。今天，我把保卫首都的责任交给了唐将军。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智勇兼备的将领。他必定能负起这个光荣的责任。你们服从唐将军，要像服从我一样。”

唐生智受宠若惊，即席作了慷慨的发言：

“本人受国家厚恩，受委员长的殊遇、培植，深感无以为报，自当敬遵委座命令，与诸位共负守城责任。”唐生智继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现在正是我们戮力用命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做一名无愧于先人，无愧于党国的军人，我们就能创造自己光荣的历史，创造伟大民族的历史！”

唐将军的话，颇有些鼓动性。将军们个个热血沸腾。

会见结束后，唐生智陪送蒋介石夫妇上汽车。

“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这也叫患难见真情吧！”蒋介石握住这位8年前还是冤家对头的手，深情地说。

“这是军人应尽的责任。我还是那两句老



△日军坦克冲击南京中华门

话：“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您的命令，我决不撤退。”唐生智报之以坚定的誓言。

12月9日正午，在南京上空盘旋的日机，从飞机上撒下了雪片一样的传单。传单上赫然印着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劝降书”：

百万日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城正处于包围之中……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首府。乃东亚文化荟萃之地……贵军如果继续抵抗……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希望根据下列手续，与贵军和平地接交南京城。

大日本军总司令官 松井石根

传单上还规定了中国军队代表与日军代表谈判投降的具体办法：

日军投下的“劝降书”，迅速被送到唐生智的手中。

“岂有此理！”唐将军将日军的“劝降书”抛掷于地，叫来作战参谋，口授命令：命令：

1.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唐生智在稍稍停顿了一下之后，便又

胸有成竹地继续口授：

2.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交缴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78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唐生智在记录稿上签了名：“即刻发出。”

此时此刻唐生智决定收缴船只，背水一战，充分表现了他率军守土的决心，但是，却因此种下了一颗永远咽不下的苦果。

12月9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决定降与战的关键一天。

当大地在蒙蒙的晨雾中刚刚苏醒的时候，古城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中国军队毅然用猛烈的炮火，来回答松井石根的劝降。

中日双方的资料中，都记载了中国军队这一义无反顾的勇敢抉择。

《申报》记者对12月10日的战事报道说：“南京之战事，不因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将军，要求和平入城而比较和缓，抑且光华门、通济门、中山门一带之战事，更形激烈，自



△我军炮兵在还击日寇

朝至午，未有片时停息，华军对于死守南京，至为坚决，予日军以重大打击。”

日本方面的资料作了这样的记载：

“唐生智无礼至极，非但在10日正午以前没有任何回复，反而从10日早晨起，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我军，作为酬报。”

历史为中国军人记下了首都保卫战中骄傲而光荣的一页。

午后1时正，炮声在南京城郊的各个方向更为猛烈。

进攻南京和保卫南京的战斗，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松井石根在这一天的《阵中日志》中写道：直至正午，中国军队仍无答复，故午后命两军进攻南京城。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乃欲罢不能之事也。

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国军队的忠贞不屈。

蒋介石命令撤退

12月11日中午12时，在四周一片混乱的枪炮声中，唐生智办公室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副官报告唐生智，是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从江北给他打来的电话。

“唐司令长官，委员长已经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

“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

顾祝同焦急地说：“这些我管不了，反正今晚你务必撤退过江。”

“不行啊，有许多事情应该向各部队长交待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的责任，由谁来负？”挑着卫戍司令长官重担的唐生智，不能不想到他手下的10余万大军。

“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快过江吧！”

“最早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

“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

“今晚要我过江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这场艰苦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通信参谋给唐生智送来了一份蒋介石撤退令，电文是：

唐司令长官：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中真。侍参。

顾祝同电话中传达的意旨，终于以正式命令的形式，出现在唐生智的面前。既然是最高统帅的命令，只能坚决执行。

唐生智开始沉思。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么多部队，要在敌人的炮火下撤走，不那么容易。

夜幕落下，唐生智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第二份撤退令，内容与前电完全一样，只是在文末注有“真戌侍参”字样。它表明，电报是中午戌时，即11时至1时间发出的。

次日凌晨3时，唐生智把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等人，召集到自己的住处。

“现在复廓阵地已有多处被击破，城垣已经无法守卫，委员长有命令，叫我们撤退。”

唐生智以低沉的声音说，接着又对几位参谋、官员吩咐，“你们赶快去准备一份撤退命令。”

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谁也没有吭一声。撤离首都，这对于中国军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和耻辱。

当天下午5时，唐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卫戍部队中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被召集到了唐公馆。

“南京现在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以为还有没有把握守卫？”唐生智首先向大家提出问题。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气氛十分紧张。

唐生智见没有人发表意见，便宣读了蒋介石昨天两次发来的撤退令。他要参谋长将印刷好的南京卫戍总部撤退令“卫戍作命特字第一号”，发给每人一份。

撤退的原则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时间选择在当天下午至次晨6时之间。规定除第二军团可就地渡江外，只有第36师、宪兵部队及各直属部队，可于下关渡江，其余各野战部队，均需自原阵地冲出重围，向皖南集中。

“要塞炮和运动困难的各种火炮，弹药、通信器材，都要彻底销毁；突围中要注意破坏沿线公路、桥梁。”参谋长叮嘱说。

会场上又是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唐生智缓缓地站起身来，以激昂的声调高声说：

“战争不是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各位应当记住今日的耻辱，报仇雪恨！”

将军停顿了一下，又向部属们交待：“各部队应指定统率的长官。如果因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说到这里，唐生智对书面的撤退命令，又作了一项重要的修正：“第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以过江，向滁州集结。”

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生智随意地作了这么重大的修正？不得而知。但这个修正，来得太唐突了。一下子使渡江的部队增加了2倍多，共5个师，这是江边本已十分紧张的渡船所无法承受的。它注定了要结出一颗无法下咽的苦果。

会议进行的时间很短，没有商讨，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几十分钟会议便匆匆结束。悲剧即将发生。

司令长官艰难过江

12月12日傍晚，一辆黑色的美国轿车，缓缓地开出唐公馆。刚刚下达了撤退令的唐生智，准备乘车去卫戍司令部作最后的检查、部署。

可是，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上，已经挤满了潮水般的官兵，水泄不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

于是，轿车掉转方向，准备由中央路出和平门，驶向海军专用码头。可是，此刻的南京城，到处是人，特别是通往江边的道路，更是人山人海。轿车仍然开进了浩浩荡荡的人流之中。车窗上虽贴有卫戍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较少地受到戒严部队的留难，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也只能一寸一寸地移动，开开停停。在这里，鸣号、叫喊、命令，丝毫不起作用。

唐生智在撤退令中，把卫戍司令部与特务排，安排在六次渡江中的首批，开渡的时间是下午6时。可是，等他艰难地赶到煤炭港附近的海军码头时，已是8时正了。

他终于登上了一艘小火轮。

江边人声鼎沸，为争抢船只发出一阵阵的叫骂声。

城南方向，枪炮声愈来愈紧，大火映空。

小火轮鸣笛一声，离开了喧嚣的码头，在茫茫的黑夜中，向对岸驶去。

唐生智回首南岸，听着那成千上万名部属的喊叫声，望着自己誓死保卫的南京城，愧恨交加，默默无语。

小火轮行驶的速度十分缓慢，因为江中到处漂浮着木筏、抱着木板挣扎的士兵，以及已经淹死在江中的士兵尸体。

突然间，从北岸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有人喊道：“唐司令长官有令，任何船只、人员不得靠岸！”

唐生智这才想起，自己下达撤退令的时候，没有及时通知江北的部队，将原来不准渡江的命令撤销。现在懊悔、遗憾都已经来不及了，紧要的是使渡船安全靠岸。

“喂，船上坐的正是唐司令长官，不要开枪！”副官们拼命地叫喊。

小火轮终于艰难地靠岸了。岸上的士兵们好奇地注视着唐生智一行高级指挥官狼狈地下船上岸。

浦口只剩下少数的留守部队，也没有汽车在这里等候。唐生智、罗卓英、刘兴等人，只好沿着铁路线，准备步行到滁州。对于这批将军来说，要靠两条腿走这么长的路，真是一场灾难！

行不多久，从花旗营方向传来了枪声。参谋人员判断，这是江浦的日军正向浦口方向包围过来。

“我们是不是先到六合，再去三战区顾副司令长官的驻地扬州。”参谋长建议说。

“好吧，那就先去六合后去扬州吧。”唐生智已无别的选择，只好赞同。

“哎呀，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是否可以帮

我找部车子来？”没走多远，身体虚弱的唐生智向他的部下求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深更半夜，又是在荒僻的农村，到哪里去找汽车呢？

一位姓陈的副官，好不容易从农民家中，寻到一辆板车。农民死活不肯借，因为这是他们一家唯一的运输工具。好在有钱总能解决问题。副官用高价买下了这辆车。

“钩座，只好委屈你了，就请先坐上这辆车吧。我们再注意寻找汽车。”陈副官说。

唐生智正准备上车，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车上还残留着许多牛粪，连声说：“这如何可以坐呢！这如何可以坐呢！”

士兵们只好继续扶架着唐生智，缓慢地向前行走。

又走了几里路，唐生智几乎要瘫倒在地。他实在走不动了，回过头来问陈副官：“你寻着汽车没有？”

“报告钩座，连汽车的影子也没见着。要车，还只有那辆板车。”

唐生智叹息道：“我带兵20来年，大小经过百余次战斗，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说罢，便无可奈何地坐上了那辆沾满牛粪的板车。

黑夜中，南京城，那烛天的火光，那震撼人心的巨响，更显示出一副痛苦与失败的景象。

唐生智到达六合后，乘上顾祝同留给他们的汽车，直奔滁州。

功过历史自有公论

南京城失陷了。唐生智狼狈出走。将近10万名未能渡江的守军，绝大部分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这对于唐生智，对于中国军队，都是一大悲

剧。唐生智也因此得到了“败仗将军”、“逃跑司令”的雅号。

平心而论，唐生智奉命于危难之际，以带病之躯指挥战斗，毅然拒绝敌人的劝降，不能不说他具有极大的勇气和爱国之心。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唐生智指挥失误，战略呆板，撤退不善，又给中国军队和战事带来惨重的损失。人们为这位身经百战、戎马倥偬的将军，表示深深的痛惜和责备。不过，唐生智个人，只能在历史提供给他的那个舞台上活动，因而，由他所承担的责任，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对于他来说，蒋介石的决策，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南京不利防守的地形，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情况既不是他造成的，也不是他的力量所能改变的。

唐生智在保卫战之初，确曾表示过“誓与南京共存亡”。但是，也不能就此要求他一定要牺牲在石头城下。以唐生智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若竟然死在南京，这对于敌我双方的士气，并不能产生什么有利于我的战场效应。他的撤退，乃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作为一名军人，在战斗前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后来奉命撤退，阵地亡而人存，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常有的事。

唐生智守南京的功、过，都是客观存在。

过不能掩功，功不能抵过。没有必要强求将他的功、过，量化成一个精确的数字比例。历史不是数学。他的功、过，历史自有公论。

（责任编辑：刘家驹）

（孙宅巍，男，52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南京政府的覆亡》、《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等书。李德英，女，54岁，南京无线电一厂工程师，著有《将军在海峡那边倒下》、《轰动台岛的吴国桢事件》等作品。）

炎黄文化一绝——璇玑图

窦红梅 窦孝鹏

自从我的故乡——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发掘出释迦牟尼佛祖的真骨舍利以后，这里立即成为世人瞩目的圣地，一切与法门寺有关的传说、故事、史迹也随之名传四方。窦滔之妻苏若兰的织锦回文璇玑图便是其中之一。

在法门寺西北的法门镇，有一座矗立的照碑中央的一块青石板上，刻着一个纵横各29字、合为841字的文字方阵。这个文字方阵便是前秦名将窦滔之妻、才女苏若兰的织锦回文璇玑图。它内涵无限，变幻无穷，竖读、横读、顺读、倒读、回环读、交叉读、进一字读、退一字读、跳间读、左右旋读皆成诗文；有三言、五言、七言，还有四言、六言；也有绝句、律诗，诗文隽永、韵节和谐。更奇的是原诗是用五彩线织在一个八寸见方的锦面上，它浸透了一个女人对世事、对家乡、对爱情的无限忠贞和思恋。

关于窦滔和苏蕙（字若兰）的故事，我从一懂事就听说了。那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的故居就在我们村——扶风县城北不远的周秦坡村。

苏蕙是东晋始平（今武功县）秀才苏道质的三女儿，能诗善文。苏道质曾任陈留县令。16岁时她与大将军窦真的孙子结婚。据地方志载，东汉时扶风出了四大朝臣——“班、马、耿、窦”，其代表人物如班超、班固、马援、马融、耿弇、耿秉、窦融、窦固等。窦滔即窦固之后。

窦滔先被前秦苻坚任命为秦州刺史，政绩斐然，现在天水市还留有他的不少遗迹。不少地名都以与他有关的故事命名。不久，苻坚又命他去攻打汉中、成都等地，窦滔不从，惹怒了这位前秦皇帝，罢免了他

的秦州刺史，并贬谪到边远的西北沙漠——西流沙（即现在的敦煌）去服苦役。

苏若兰在家乡日夜盼着夫君归来，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总不见窦滔的音讯。后来，她听说窦滔因忤旨被苻坚贬谪西流沙，更是悲痛欲绝。她本是才女，心里的苦思无法宣泄，只



好以诗寄情。她日里思，夜里写；夜里思，日里写，诗稿在桌上摞起几尺厚，一年又一年过去，数一数写出的诗词大约也有几千首了，可还不见自己的丈夫归来。

秦苻坚在统一了北方领土后，又夺取了东晋的襄阳。他又启用窦滔，拜窦滔为安南将军，镇守襄阳。

当窦滔从流沙回到法门寺故乡准备携眷赴任时，朝廷给他送来了许多锦丝银器和一名女侍者。朝官说：“这是皇帝的一片圣意。”窦滔只得领情。

侍女叫赵阳台，生得小巧玲珑，聪明伶俐，至多不过20岁。

窦滔仍然和苏蕙相会在小西巷的故居。这一夜，他们互相倾诉着离情别绪，喜一阵，泣一阵，痛彻肺腑。窦滔浏览了若兰为思念自己写的诗篇，感到字字是血，句句为情，因此辗转难眠。

若兰想不到刚回来的丈夫又要远行，再加上赵阳台的出现，感到自己的爱情受到了干扰，心里很不是滋味。

朝廷不断催窦滔赴任。窦滔也催促若兰赶快准备。若兰感到委屈，赌气说：“要去你去吧，我不去！”窦滔只好洒泪与若兰分别，带着赵阳台赴襄阳上任去了。

窦滔走后，若兰在孤寂中又平添了无限的懊悔、伤感和怨恨。她把自己过去所写的几千首诗，反复排列、组合、修改，润色，组成文字方阵。然后独坐绣房，轻摇纺车，纺出蚕丝般的卷卷细纱，拿到池塘里去漂洗，印染，染成了红、蓝、黑、紫、黄的五色线（苏若兰漂洗纱线的池塘，现被当地人称为洗纱塘），然后架上织机，脚踏手挥，梭来线往，照着自己排列的文字方阵，织呀织呀织起来。

多少个昼夜过去了，多少心血溶进去了，倾一腔情思，满腹才华，终于织成了一个8寸见方、彩色斑斓的锦图。图上纵横各29字，共841字。它五彩相宜，莹心耀目。反复诵读，可读出7958首诗来。并取名曰：苏氏心诗璇玑图。

苏若兰把回文璇玑图，托人带到千里之外

的襄阳，呈给窦滔。也许是心有灵犀吧，别人一时读不懂的这种回文诗，他却能心领神会。窦滔从苏蕙的首首诗歌中，理解了她那颗永远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心，看见了她那颗玲珑剔透、晶莹聪慧的心。他悔恨交加，深感对不起若兰。为了责己悔过，他毅然将赵阳台送回了关中她父兄处，而备车以盛礼把苏若兰接到了自己身边。一对饱经分离之苦、屡遭忧患磨难的夫妻，终于相亲相爱地团聚了。

苏若兰的织锦回文诗传出后，上至京城百官，下至乡野黎民引起极大轰动。人们争相传阅、抄录、刻印，视为奇文。更为不少文人墨客、诗人学者所重视，他们互相研读切磋，力图透解，却终无一人悉通。有人去问若兰，她笑道：“徘徊宛转，自为语言，非我佳人，莫之能解。”言下之意，只有她的丈夫窦滔可以读懂她的诗。

是的，苏若兰的回文璇玑图里，写下了许多自己对窦滔的怀念和恋情，如：

仁贤别行士，颜丧改华容。贞物知始终，岁寒识凋松。

写自己在与丈夫分别后，由于苦苦思念，以致面容憔悴，丧失了往日的美丽。然而她对窦滔的感情就如严冬的青松一样，能经得起任何考验。

又如三言诗：嗟叹怀，所离经；遐旷路，伤中情；家无君，房帙清；华饰容，朗镜明；葩粉光，珠曜英；多思感，谁为容？

充分表现了丈夫远离后，自己孤寂辛酸的心情。

后人对苏若兰的回文璇玑图都有极高的评价。唐朝的武则天皇帝还亲自为它作了序，序中记叙了窦滔、苏若兰的身世和结婚经过，她尤其盛赞苏若兰“才情之妙，超古迈今”。

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对苏蕙的才情十分惊叹，写诗赞曰：“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只有英灵苏蕙子，更无悔过窦连波。”

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汝珍在他的小说《镜花缘》中，不但写了窦滔和苏蕙的故事，而且全文收录了武则天写的《璇玑图序》并《璇玑

图》本文，更可贵的是书中还较详细地介绍了《璇玑图》的若干种读法，他的导读能把读者引入一个个美妙的境界里。李汝珍还借书中人物的口称赞《璇玑图》“上陈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兴寄超远，此等奇巧，真为千古绝唱。”“得睹如此奇文，可谓三生有幸。”

苏蕙的《璇玑图》传到农村后，在平民百姓中也引起极大反响。过去，关中农村姑娘出嫁时，有一种散发自织的花手帕的习俗，就是从苏蕙的回文织锦演化而来的。农家姑娘不可能在手帕上织什么诗，她们便纺线染彩，织成八寸见方、彩线纵横的花手帕。家境富有的一下要织三五百个，家境不好的也要织百十个。待到婚嫁的大喜之日，新娘一到男家，便作为

礼品散发给有关亲友和帮工人员，如背新娘进院门的，要先给花手帕；给新房挂门帘的，糊窗纸的，要给花手帕；答谢厨师、帮工要送花手帕，拜见舅舅、姑姑时，更少不了花手帕……总之，人们从花手帕上不仅看新娘的针线手艺如何，也可以看出新娘是否大方、慷慨。以后，不少姑娘出嫁时，不再纺织线手帕了，而是花钱到商店买来许多质地、花色不同的手帕送人，使这一古老的习俗，蒙上了现代化的色彩。

一方8百余言的《璇玑图》，竟能读出7958首诗来，它的读法必是多种多样、繁缛无比的。现根据璇玑图所示，请读者试读：

(责任编辑：白雪)

苏若兰织锦回文璇玑图

琴	清	流	楚	激	弦	商	秦	曲	发	声	悲	摧	藏	音	和	咏	思	惟	空	堂	心	忧	增	慕	怀	惨	伤	仁
芳	廊	东	步	阶	西	游	上	姿	淑	窈	窈	伯	邵	南	周	风	兴	自	后	妃	荒	经	离	所	怀	叹	嗟	仁
兰	休	桃	林	阴	翳	桑	怀	归	思	路	河	女	卫	郑	楚	房	节	中	闹	淫	安	清	所	房	君	中	情	仁
凋	翔	飞	燕	巢	双	鸪	土	迤	透	其	人	志	咏	齐	商	双	发	歌	我	容	衣	想	华	容	朗	镜	家	德
茂	流	泉	情	水	激	扬	眷	顾	其	人	翠	荣	耀	流	华	观	羽	治	容	谁	感	英	耀	珠	光	纷	葩	虞
熙	长	君	思	悲	好	仇	旧	蕤	情	我	感	伤	多	忧	宫	羽	同	声	相	谁	感	多	思	感	谁	为	荣	虞
阳	愁	叹	发	容	推	伤	乡	悲	情	我	感	伤	多	忧	宫	羽	同	声	相	谁	感	多	思	感	谁	为	荣	虞
春	方	殊	离	仁	君	荣	身	苦	惟	艰	生	患	多	忧	宫	羽	同	声	相	谁	感	多	思	感	谁	为	荣	虞
端	禽	心	滨	均	深	身	加	不	忧	是	婴	藻	文	繁	虎	龙	宁	自	感	思	岑	形	炎	城	明	庭	妙	虞
面	伯	改	汉	物	日	我	兼	思	何	漫	漫	荣	耀	华	彰	旂	戎	戎	君	侧	伤	幽	未	犹	倾	难	闹	虞
殊	在	者	之	品	润	乎	愁	我	生	何	宛	充	颜	耀	观	绣	衣	梦	想	劳	形	峻	在	炎	戒	消	作	虞
意	诚	感	步	育	浸	集	悴	章	时	桑	诗	端	无	终	始	始	始	仁	颜	贞	寒	嵯	深	兴	后	源	人	虞
感	呢	亲	飘	施	惹	殃	精	微	盛	翳	兴	比	平	始	苏	心	图	显	行	华	终	凋	微	渐	至	女	因	虞
故	遣	闻	飘	天	罪	何	退	微	业	孟	鹿	理	兴	苏	心	图	显	行	华	终	凋	微	渐	至	女	因	虞	虞
新	废	远	微	地	积	怨	幽	悼	思	伤	怀	日	在	感	年	袁	念	是	独	居	怨	远	大	赵	好	特	虞	
霜	冰	齐	殊	乔	贵	其	备	悼	思	伤	怀	日	在	感	年	袁	念	是	独	居	怨	远	大	赵	好	特	虞	
冰	齐	殊	乔	贵	其	备	悼	思	伤	怀	日	在	感	年	袁	念	是	独	居	怨	远	大	赵	好	特	虞	虞	
齐	殊	乔	贵	其	备	悼	思	伤	怀	日	在	感	年	袁	念	是	独	居	怨	远	大	赵	好	特	虞	虞	虞	
洁	子	我	谁	均	难	苦	辛	知	我	者	谁	世	异	浮	沉	华	英	黯	曜	白	日	西	昭	景	薄	榆	虞	
志	惟	同	谁	均	难	苦	辛	知	我	者	谁	世	异	浮	沉	华	英	黯	曜	白	日	西	昭	景	薄	榆	虞	虞
清	新	衾	一	专	所	当	麟	沙	流	颓	逝	异	浮	沉	华	英	黯	曜	白	日	西	昭	景	薄	榆	虞	虞	虞
纯	贞	志	一	专	所	当	麟	沙	流	颓	逝	异	浮	沉	华	英	黯	曜	白	日	西	昭	景	薄	榆	虞	虞	虞
望	微	精	感	通	明	神	龙	驰	若	然	倏	逝	惟	时	年	殊	白	日	西	昭	景	薄	榆	虞	虞	虞	虞	虞
谁	云	浮	寄	身	轻	飞	昭	亏	不	盈	无	倏	逝	惟	时	年	殊	白	日	西	昭	景	薄	榆	虞	虞	虞	虞
思	辉	光	伤	散	妾	孤	遗	分	何	情	者	已	微	身	长	路	悲	感	生	民	梁	山	殊	塞	隔	河	虞	
想	群	离	声	殊	乖	雁	归	人	房	幽	处	已	微	身	长	路	悲	感	生	民	梁	山	殊	塞	隔	河	虞	虞
怀	悲	哀	应	翔	雁	归	人	房	幽	处	已	微	身	长	路	悲	感	生	民	梁	山	殊	塞	隔	河	虞	虞	虞
所	春	伤	有	女	为	贱	人	房	幽	处	已	微	身	长	路	悲	感	生	民	梁	山	殊	塞	隔	河	虞	虞	虞
亲	刚	柔	有	女	为	贱	人	房	幽	处	已	微	身	长	路	悲	感	生	民	梁	山	殊	塞	隔	河	虞	虞	虞

是谁

设计的

天安门城楼的

大红灯笼？



●舒云

1979年，中国电影代表团住进了东京的新大谷旅馆，日本友人森茂带着一家与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员的田华再会了。同来的还有另一位日本朋友小野泽亘和他的夫人。田华和她的爱人苏凡一直都在想念这两位与他们曾并肩战斗的日本朋友。那时，森茂和小野泽亘是华北军区文工团舞台工作队的队员，队长苏凡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田华呢，名气虽然没有后来演电影那么大，但她有一张日本式少女的脸庞和一对闪烁着灵慧的大眼睛，引起了森茂的注意。森茂向小野泽亘打听。小野泽亘说，这个女孩子叫田华。

刚到晋察冀时，森茂在抗敌剧社的北方美术供应社做宣传工作，小野泽亘在人民剧场搞舞台美术。他们是1945年10月底，悄悄离开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翻越了八达岭，来到解放了的张家口。正好歌剧《白毛女》在紧张排练，两个月后就要上演，抗敌剧社立即给他们安排了工作。那时，白毛女由王昆扮演，大幅的宣传画就是小野泽亘画的。田华在《白毛女》中当场记。当然田华在电影《白毛女》中一炮打红那是解放以后的事了。不过，还是在田华当场记时，森茂就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农村女孩子将来一定会出大名。

在新大谷旅馆，田华与森茂和小野泽亘不停地说着往事。她还是森茂记忆中的那样开朗。田华拿出她特意带来的森茂翻译的日文书，还

带了她与爱人苏凡以及孩子们的照片。然后又掏出一大堆北京的土特产，其中有一个精美的烟斗。

“森茂，森茂。”田华指着烟斗笑着叫森茂的名字，森茂莫名其妙。他凑过去一看，才发现烟斗上刻有熊猫的浮雕。在汉语中，熊猫和森茂的发音差不太多。原来，田华指着熊猫在叫森茂呢。

森茂忘了汉语，却忘不了美丽的天安门宫灯，那是他和小野泽亘的杰作呵。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设计装修的节日天安门成了新中国集会的中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如今已经80高龄的小野泽亘和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森茂，渴望在余生中再看一眼他们亲手装饰过的天安门。自从他们返回日本，还没有重返第二故乡的机会，也许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

田华从日本出访回来，聂荣臻元帅邀请她来家中做客。田华不到12岁参加晋察冀的抗敌剧社，一直与聂帅很熟。聂帅最后一套亲笔签名的回忆录是送给田华和苏凡的。田华把小野泽亘和森茂的情况告诉了聂帅，说人家为我们开国大典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表示感谢，能不能请两位日本朋友来一趟中国。

聂荣臻很清楚，开国大典时他是总指挥，布置天安门他虽然没具体过问，但他知道两位日本友人的功绩。他说，你们写个报告，我批给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王炳南，由他去办。

如果苏凡起草一份邀请报告，肯定一路顺风。也说不定两位日本友人来中国故地重游会像日本首相访华一样轰动中国呢。可惜田华和苏凡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打报告名不正言不顺。我们俩算什么，怎么能起草邀请报告？这事儿就泥牛入海了。

以后，苏凡把这事与原北影厂长汪洋谈过，也与战友文工团的老团长刘佳谈过。但是重返中国对于两位日本老人来说，无论财力体力都不能支持，那就成了一个梦了。

小野泽亘是1943年逃到中国避难的，他是左翼美术家，在北平的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两年后，他与北平地下党接上了关系，通过城市工作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这个剧院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公开名字。小野泽亘一到张家口，就参加了《白毛女》、子弟兵与老百姓》、《戎冠秀》的布景设计。他还为《白毛女》画了布景。

森茂与小野泽亘是在张家口相识的。森茂参军很有意思，他原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兵士，专门绘制反共宣传画。这样，就要让他知道八路军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准许他看马列和毛泽东的书。森茂是个有头脑的正直青年，他越读越觉得共产主义有道理，而最终被毛泽东的书“俘虏”了。

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小野泽亘在抗敌剧社装置室，森茂分到画线室。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晋察冀日报》社设立了生产部门——利民广告公司，森茂被招进了公司的图案部。因此，到9月份从张家口撤退时，森茂与《晋察冀日报》社的人一道，小野泽亘则与抗敌剧社的人一道撤退到老革命根据地阜平县。此后，森茂又进了裕中烟厂附属的印刷局工作，专为九龙枝牌等香烟绘制商标图案。1948年夏天，森茂来到解放了的石家庄，在电影队与小野泽亘重逢。不过很快小野泽亘与电影队的一部分队员先行去了北平。不久，森茂与小野泽亘又联系上了，他告别了裕中烟厂，一个人前往北平，来到小野泽亘居住的东单。这个地方距离大华电影院很近，此时大华电影院已



△1945年的田华和苏凡



△1993年春节田华和苏凡在江陵饭店

在抗敌剧社的管辖之下，森茂和小野泽亘与在张家口人民剧场一样，分到演出股工作。就这样，森茂沿太行山脉、华北平原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抗敌剧社。

1949年4月，抗敌剧社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小野泽亘和森茂分配到舞台工作队。队长是森茂自张家口久别的苏凡。

森茂曾经挨过苏凡两次批评。第一次是他刚到张家口不久，他匆匆忙忙去找在舞台上工作的小野泽亘。刚登上舞台，就听见一声很不客气的话，喂，没事不要到舞台上来！森茂慌忙退下。后来他知道说他是苏凡。另一次批评也不是因为工作。那天他去王府井，一边走一边吃花生。归队不久，苏凡到他的房间对他说：“你怎么一边走一边吃东西？这可不是解放

军的行为。”森茂十分羞愧，后来他回忆起来，还颇感心有余悸呢。

小野泽亘和苏凡从张家口一开始就一块工作，彼此配合十分默契。苏凡对小野泽亘也十分器重。

田华和苏凡是进入北平以后举行婚礼的，苏凡也希望他的两位日本朋友幸福，忙着为他们张罗对象。小野泽亘40出头，森茂也30好几。1951年，东北的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到北京，其中有铁路总局和航空队所属医院的日本女人。为了加深交往，大家在一起演演戏，森茂编脚本，小野泽亘舞台设计，航空队的男人女人表演剧目。一天，苏凡带来两名日本女性。森茂和小野泽亘见过她们。小野泽亘立即看上那位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很快就相好了。森茂对另一位年轻女人不太有兴趣，虽然她很漂亮。他想找演过戏的女性谈朋友。森茂很快与一位年轻女性见面，不幸，人家已有丈夫。到这份上，森茂也不好再回头去找那位年轻女性了。他只好苦笑着用日本的一句俗语为自己解嘲，缘分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他开始为小野泽亘奔忙。

小野泽亘举行婚礼时，森茂细心地把小野泽亘的房间刷成热烈的蔷薇色，而把自己的房间漆成忧郁的淡蓝色。

苏凡把小野泽亘的结婚仪式定在歌舞队的排练场。森茂请来专门熟悉日本食物做法的主妇，准备了丰盛的日本式宴席。文工团全体团员，以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汪洋，在电影队时与小野泽亘一块负责音响效果的青岛、佐佐木以及许多在北京的日本人都参加了小野泽亘的婚礼。盛大的仪式一开始，在音乐家徐曙的指挥下，唢呐吹起。森茂觉得唢呐声美妙极了，吹奏这种令人愉快的音乐是中国人举行婚礼的习惯，在日本只有在大街小巷卖豆腐时才吹。不过，森茂回国后再也没有听到这种令人怀念不已的美妙乐声了。

以后，小野泽亘在京郊一所学校里工作了5年，养下一儿一女。又到了武汉，最后经由上海回国。

森茂是在回国的海轮上认识一位日本女

子，一见如故，很快结婚了。他比小野泽亘先回国。回国后森茂无家可归，也没有可以投奔的亲戚，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日本，为了挣生活费，他不得不画他所不愿意画的东西，经营一个出版社的插图工作。小野泽亘80多岁还要和兄弟合办画展，以此挣钱糊口。

森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中的大部分青春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所以中国可以说是我的故乡。我尤其忘不了夜以继日为开国大典忙碌的分分秒秒……

那是1949年9月底的一天，不知为什么，森茂醒得很早。一辆吉普车停在洋溢胡同的红色大门前。炊事员拉开门，华北军区宣传部的张致祥部长来了，苏凡忙将他迎了进来。不一会儿，森茂听见苏凡叫上小野泽亘和张部长一齐坐车走了。原来，为开国大典装饰天安门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台工作队同志们。舞台工作队在苏凡的指挥下，在天安门城楼上全面铺开了工作。

这时，天安门广场正在进行扩张工程，清除广场上的杂草垃圾，拆掉广场侧面的砖墙。天安门城楼上也有不少忙碌的身影。天安门屋顶上清除杂草的人们像一只只鸟儿在屋脊上移动。天安门内侧墙的墙壁上，华北大学的学生正趴在梯子上，在巨幅画板上描绘毛泽东的标准肖像。

当时最为难的是天安门的装饰问题，因为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国旗都还没有定稿。一天苏凡拿来一本国旗图稿，里面辑录了初选的国旗草图，其中还有朱德总司令的一幅。每张草图都有详细说明。

苏凡对小野泽亘说，先不管国旗定稿问题，你先考虑一下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的最佳设计方案。

小野泽亘和森茂为此绞尽脑汁。此外还有很多事都必须去做，眼看时间一天天迫近，这两位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的美术专家，终于想出了在10根红廊柱中间吊八盏大红宫灯的方案。仅仅一星期，他们先后画了20张



△森茂、小野泽亘和他的同事在日本举行画展

草图。周恩来一眼看中了八盏太阳般的宫灯，他在画稿中做了局部删改，抹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周恩来强调说，突出城楼就够了，不要搞得花里胡哨，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但也要严肃。

八个大宫灯一经确定，周恩来就给卡死了日期，要求在庆祝大会前两天张挂起来。

张致祥叫苏凡坐他的小车，跑遍北京城，苏凡得来一句话：北平城里压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只剩10天了，张致祥急得直上火。小野泽亘说，大宫灯小宫灯不是一样吗？咱们自己做。苏凡直奔故宫，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里，翻出一个活着的扎灯艺人的地址。

庆祝大会前一天，八个大红宫灯竣工了。挂出来后，周恩来十分满意这八盏推陈出新的既民间又宫廷式的大灯笼。1949年9月30日深夜，小野泽亘和森茂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忙活。

隔着护城河，外宾观礼席围上红色的布帘，格外漂亮。这个宾礼席是由小野泽亘设计的。天安门左右城墙上八根乳白色的旗杆，飘扬着八面崭新的红旗。广场前面为国旗预备的旗杆尚未完工，工人正在紧张作业，焊接时飞溅的



△森茂一家和田华



△小野泽亘一家和田华

青白色火花时明时灭。

凌晨，小野泽亘和森茂刚刚钻进被窝，苏凡推门而入，慌慌忙忙地告诉他们，周恩来看了天安门的准备工作后，叫他们拆掉天安门正门的背景设计。

原来，天安门城楼正面的休息大厅用八面

陈独秀遇盗

● 刘宏伟

1938年8月，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迁居四川省江津县一个叫做石墙院的一间偏房中。虽居乡下，常有国共两党要人在陈家门口出出进进，颇为引人注目。自然也招惹得当地盗贼对“来头不小”的陈家垂涎三尺。有一日，盗贼乘陈独秀因病住进县城医院的机会，偷偷潜入陈家企图行窃。进得门后盗贼大吃一惊：只见这间房子阴暗潮湿，正值大雨，雨水透过屋顶

的破损处不停地漏进来。屋内陈设仅只一张书桌，两张木床，三两凳子和几只书箱。盗贼翻遍旮旯角角，竟然找不到一点金银财宝。盗贼大怒，把翻出几件换洗衣裳，一些手稿和一枚刻有“独秀山民”字样的篆体阳文玉印章，全部卷走。由于手稿和印章在盗贼看来实属无用之物，便随手弃之。以至于当警察局破案时，衣物被找回，而手稿和印章却再也无处去寻了。

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自然形成了背景。来自日本的美术家小野泽亘觉得封建味道太重，为了体现他理解的革命，他把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六面，留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立体大五星，20匹红布扯出长方形红光。立起来后众人连连叫好。谁也没想到红光太浓，整个图案像一幅越南地图。

这被远望天安门观察整体效果的周恩来发现了。

舞美队员们刚安装上去的装饰又开始往下卸，小野泽亘若有所失，如果国徽的图案早些定下来，或许还能完成背景的设计。可是直到此时，他仍然不知道国徽是什么样子。

森茂忙着修改毛泽东肖像上的衣襟。本来，毛泽东像下是为人民服务和毛泽东的签名。周恩来一看，马上让涂掉，说，毛主席哪能这么不谦虚，自己称自己。这几个字是和肖像连在一起的，森茂只好把五个字的地方改成衣襟，又上面补上一枚纽扣。他一面画一面担心新粉刷上的油漆在阳光照射下是不是会很显眼？

几十年后，天安门开国大典的照片中凡是照出毛泽东像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衣襟下面有一道颜色很深的宽边。不过，一般不知道底细的人不会发现毛泽东衣服上的不同。

小野泽亘和森茂终于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回宿舍。苏凡又来叫了。哦，马上庆祝大会开始了。他们匆匆忙忙穿上新的蓝制服，从苏凡手中接过

写有工作人员名字的黄色布条佩在胸前，急急向天安门赶去。

森茂迷迷糊糊地走在路上，好像连记忆也没有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了。森茂突然把目光投向悬挂国旗的杆上。焊接作业按时完工了，国旗呢？制作好了吗？不久，广场上挤满了手擎红旗的群众代表，国宾席上代表也开始汇集，卫兵们并肩站成一条直线。这时，森茂仿佛看见一队人从中山公园方向走来，前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森茂的心不由地扑通扑通直跳。

中央领导来之前，中央门内走出一个人，穿着蓝色的人民装，走过桥，站在广场上与那些警卫谈话。然后又在大路上走了一圈，看了看旗杆，又消失在中央门里。

森茂站在离这个人几步远的地方，认出他就是周恩来，凌晨3点修改天安门新置时刚刚见过他，但是一点也看不出他的疲倦。

很快，大典开始，国旗升了起来。哦，五星红旗！国旗！终于按时赶制好了。

天安门城楼上，苏凡挥舞双手，向城楼下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森茂和小野泽亘也不约而同向苏凡行了一个中国式的军礼。敬完礼，俩人才想起来，没有穿军装，怎么行军礼呢？

几十年后，森茂想起这件事还好笑。

（责任编辑：刘家驹）

「我丁玲就是丁玲！」



△丁玲，一九三九年攝於延安，時年三十四歲。



▽1954年春，丁玲重返她闊別23年的故鄉湖南常德。



● 杨桂欣

1980年春天，丁玲在北京协和医院作了乳腺癌的切除手术。夏天，她应江西省有关部门的邀请到庐山疗养。这时候，我为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学术讨论会，也上了庐山。她知道我要上庐山，便让女儿和女婿托我把家里九寸黑白电视机捎去。送去电视机的时候，我告诉她：“我的同学当中有人读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你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很有意见，说你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强调自己对毛主席的那种感情，如说这本小说也是为他老人家写的呀，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是怀着战士冲锋时的那种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等等。人家说了，现在是八十年代了，还强调这些干什么？”我还告诉她：“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让我转告你：现在你应该写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文章，这将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利于你丁老太太自己的。”

我说完之后，丁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位同学根本没有理解我在《重印前言》里那样写的意思！我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真情实感。这是历史。我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用不着作家自己去解释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我一贯相信读者，他们能读懂我所写的本意。”

我情不自禁地和她叨叨起来：“你之所以要这样写，就是要让人们理解：你对毛主席那样虔诚，那样热爱，而他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了你的名，使某些人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她却说：“毛主席有缺点，晚年更有大错误，当然可以写，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写的。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还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我受的冤屈再大，也决不能在这时候去揭露毛主席缺点和错误，不能给妄图全盘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等到适当的时候，我当然是要写的。今天不妨讲两个故事给你听听。”

她说：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

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二

1981年春末，茅盾同志去世，丁玲特地从鼓浪屿飞回北京送别恩师。早在庐山的时候，当我要求陈明为我去北大荒画一张联络图，丁玲便决定1981年夏天回北大荒探望，要我跟她去。我趁她回北京，便去询问什么时候动身。刚敲响她家的门铃，给我开门的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位60多岁风韵犹存的老太太。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甘露，是丁玲在延安结识的一个好朋友。丁玲告



△1981年7月，丁玲去北大荒探望时在松花江畅游。右为陈明，左为本作者

诉我：萧三从苏联回延安，甘露才20岁出头，毅然和萧三结合。后来，萧三在苏联娶的妻子来中国了，甘露只好和萧三分手。她还告诉我：她在北大荒期间，有时回北京看病或办事，都请甘露帮忙，她才不怕别人指责她同我这个“大右派”划不清界限呢！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是绝不推辞和马虎的。

我和甘露交谈了起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丁玲；在西柏坡时，她和丁玲一起陪毛主席散步；毛主席得知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勉励她去基层去锻炼，最好能去当一个时期县委书记，等等。她还告诉我：“1979年丁玲刚回北京，身体不怎么好，还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扬同志，那一次，是陈明约我陪丁玲去的。周扬的态度冷淡得令人意外，叫我这个旁观者也看下去！”不久周扬突然回访丁玲。那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天下午，丁玲到政协开会去了。周扬突然来了。陈明接待了他。后来，陈明告诉我：“他对我解释，为什么没让我当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还说他的老婆苏灵扬三十年代在上海也参加过左翼戏剧工作，这次也没有当上代表，名额有限，咱们两家，每家都有一个代表，这就很好了啊！他这次来，还给我带来了文代会的列席证，还有一个纪念册，好像是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我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吧。”

我和陈明正在高声大噪地发感慨，丁玲便从对门那间屋子里走过来，激动地说道：“他哪里是来看我呀！要是真心来，事前可以打个电话，无论如何我也会在家里迎候他。说不定他是知道我要去政协开会才来的呢！他来这里要干的事，他所讲的那些话，也说明了他是专门来向你陈明作解释的，不是来看我的。”陈明立即批评她：“别那么太敏感、太多心好不好？他来了总比不来要好嘛！”

待丁玲回到她自己房间，陈明把自己室门关了起来继续对我说：“真是一个老小孩，一提起这类事就激动，怎么劝也改不了。其实，这也难怪她。给江丰平反的时候，陆定一亲自到江丰家里赔礼道歉，说江丰错划为右派，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江丰把这件事告诉我，非常感动。要是周扬对丁玲也能像陆定一对江丰一样，哪怕不赔礼道歉，而只来看看她，那么她的情绪也会更加稳定和愉快。”

我从陈明屋子里出来，丁玲坐在客厅里。一见她，我暗暗后悔刚才不该大发感慨，弄得老太太激动不已。几十年的疙瘩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了，文艺界是需要大团结啊！老太太见我站着发愣，便叫我再坐一会儿。她说：“我还在山西等着平反，我女儿蒋祖慧凭着和周扬的女儿是同学、朋友的关系，到周扬那里打听我的平反问题，不料，他竟在我女儿心上捅了一刀，说什么你妈妈的右派问题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历史，还是有污点的。什么污点！在我女儿面前讲这个话，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周扬对她女儿说那话，确实是不够人道的。即使真有污点，也只能由党组织来宣布，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擅自论定。

三

1981年7月中，丁玲重返北大荒。行前，她给我讲起划成右派之后于1958年刚到北大荒时的一些事情，如作协派的监护人所用的软卧火车票竟由她付钱……农垦总局政治部的李主任看了她所持的介绍信如何不平等等。

到达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第二天上

午，丁玲坚持到农垦局机关去看望。丁玲到达之前，李主任早就坐在会议室里。他们在会见中，我迫不及待地请他给我讲讲当年接受丁玲报到的情景。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从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几十年间从未见到过丁玲交给我的那种介绍信，什么不给工资，不给生活费，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这哪里是我们党的政策呀！？我们党对人的处理，从来都是坚持给出路的政策的。过去，连俘虏要回家还给路费呢！丁玲过去是共产党员，是著名作家；不管犯了什么大错误，只要不杀头，也应当给生活费呀！实际上是要从生活上置丁玲于死地。文艺界的事，我们农垦部门管不了，但丁玲既然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给她必要的生活费，我们农垦局是有权办理的。”说到这里，他的脸都红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丁玲后来在她那篇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把当年同我说过的写了一些，只是太简略，现不妨抄录一段：

“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旧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引者注：陈明因为替丁玲申辩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于1958年春夏之交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坠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

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和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是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看来，我比所有右派都罪大恶极！……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也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

丁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和评述某个人，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也情有可原了。

四

在延安时期她和毛主席交往较多。那时她和毛主席谈什么干什么都很随便，在毛主席面前第一次失礼是他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当时，她接到了参加婚礼的请柬。可是，正是在这前两天，保育院通知她：女儿蒋祖慧病了，眼睛红肿，都快看不见了。她心急如焚！这是她1934年秋天在南京生下的女儿，后来她回忆说：“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即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和丁玲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幽禁，曾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1991年在台湾去世），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保育院在

延安城外很远的山沟里，丁玲得知女儿得病的消息便张罗着借马。好不容易，任弼时同志帮她借来了一匹，她顾不上对毛主席失礼，便骑着马看女儿去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似乎没有计较我的失礼，但谁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会是个什么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几十年之后，她对我谈起这事，还表现出后悔不已的情绪。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一听便拉下脸来：‘哼，你以为是我要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诬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丁玲刚刚复出，我当她的《生活·创作·修养》一书的责任编辑，在是否把《三八节有感》收到这本书中去的问题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她告诉我：“当年在延安的一次高干学习会上，文艺界只有周扬和她两个人出席，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发难，批起《三八节有感》来了。那时毛主席还是保了我一下，说《三八节有感》有批评也有建议，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后来，毛主席还对我说过：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

五

1984年8月中，我因要去西北便到了玲那里打个招呼。告辞时，丁玲说：“你等等，让你看一个东西。”说完，便到她自己的屋子里拿出报纸包的东西放在餐桌上，叫我坐在那里去看。原来是党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发来的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重申了1941年在延安审查丁玲南京期间表现的结论，并进一步肯定丁玲同志是一位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读完以后，我高兴极了，很想在她面前发点感慨，不料，丁老太太却抢着说：“现在，我可以死了呵！”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着，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待我从西北回来，听说她要办刊物。我说：“你要干的事多着呢！《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写完，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这样重要的回忆录，还应该继续写下去，越多越好！还有，还有……”这时候，她不再作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劝她：“这几年，人家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

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斥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看着老太太的这股倔劲，我坚持告诉她：“这样说你的人，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也有，他们还要求我劝你呢！我的这些同学和朋友，同你所指的持一定之规的人，是没有什么联系和来往的呀！”

丁玲不禁笑了起来，说：“杨桂欣，你还是太嫩了一些呵！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同他们没有联系，没有来往，这对他们不是更好吗？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群众说你丁玲僵化、保守、‘左’于我何干？他们还可以炫耀他们是尊重群众意见的呢！”说到这里，她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好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就是好啊！不许再搞政治运动，现在，他们再狠毒，也只能在非公开的舆论上下功夫，拼命说我丁玲是‘左’派僵化、保守。再想和当年那样，趁我主动要求去北大荒的机会，盗用中宣部的名义，开出那样不讲人道、不要党的政策、连对待俘虏都不如的介绍信，他们是绝对办不到了！”

六

1985年7月中旬，丁玲正准备去河北省蔚县疗养和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一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大夫便命令她：必须立即住到医院里来！从此，她除了在九月间回家看《莎菲女士的日记》电视剧，并和剧组主要成员座谈该剧之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木樨地22号楼5门18号。她在这里住了六年。当她坐着轮椅下楼回医院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啊！”1985年11月间，协和医院第一次发出丁玲病危的消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医院向她汇报工作。一进门，便见她盘坐在床上，陈明则坐在沙发上。她一见我，便满脸笑容，大声地说：

“杨桂欣，你猜前些日子哪些人来看我了？”我说：这没法猜，反正关心你、爱护你的人知道情况都会来看你。我还未说完，她便高声大气地嚷道：“陈登科来了。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死不了！’这不又恢复过来了吗？现在，我正在争取医生同意，让我回家过春节。到时候，把你们的家属都请到我们家里去。”

我怕她太兴奋，劝她休息，但她仍说个没完。我真怕她是回光返照！好在这时护士进来了，正准备回家，她却又说起来：“杨桂欣，你刚才说关心我、爱护我的人都会来看我的，这倒是不错。不过，有的人对我的关心并不是什么爱护，他来这里看我，是搞火力侦察，看我丁玲还能活几天。其实，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陈明听了，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坚决制止她继续说下去，并把她扶下床来，让她在沙发上坐着。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解释为什么说是“火力侦察”，又为什么说“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其实，她的解释对我来说显得多余。

丁玲住进协和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看她。有一次，她激动地告诉我：“你知道有谁来这里看我吗？”不等我回答，她便说：“默涵和白羽都来看我了，向我赔礼道歉，检讨他们在我的案子上的错误；白羽还说，他是来向我赔罪的。我说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再说，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呀！”

丁玲逝世的第二个月，即1986年4月，刘白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说：“新中国诞生后，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临到她头上。如果说前半生的坎坷，来自敌人阵营，而后半生的坎坷，却来自自己阵营，这是不能不令人唏嘘惋惜的。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思之疼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白纸黑字，公诸世间，比起在丁玲病房向丁玲赔罪，更显得真诚，显得庄重。如果丁玲九泉有知，我想她会欣慰不已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北戴河： 毛泽东 急召 叶飞 上将 密谈

● 陈敦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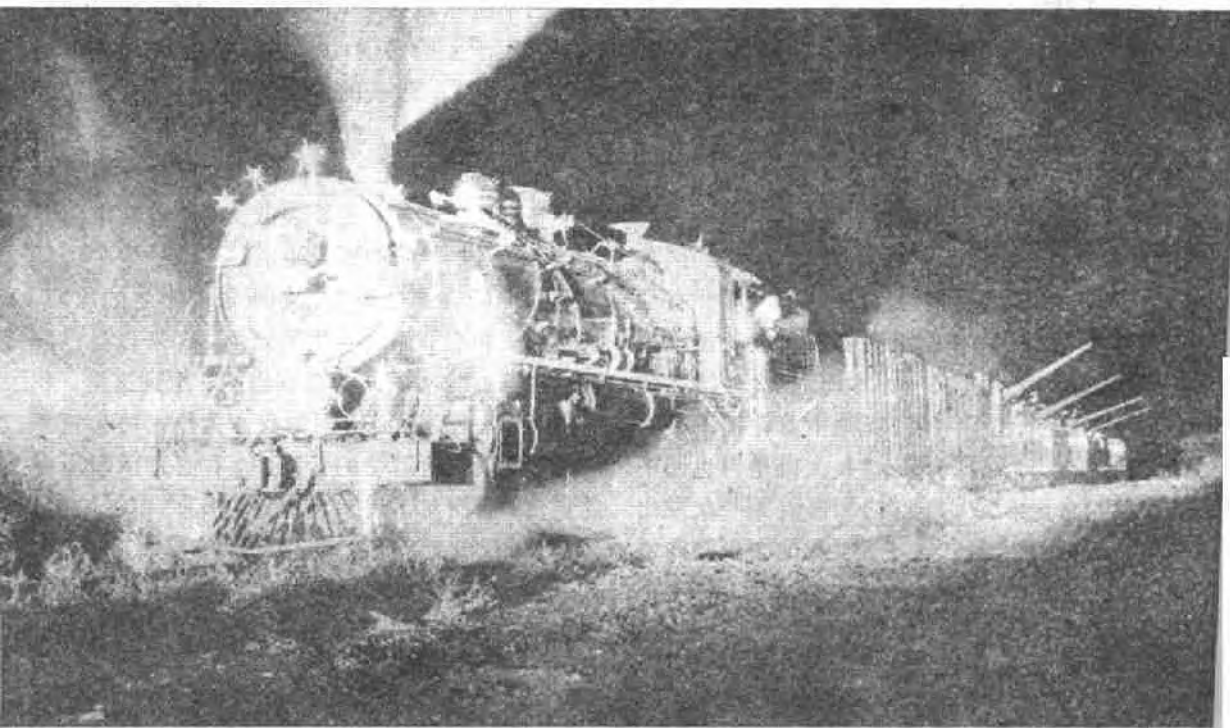
1958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在北戴河的别墅里，亲自指挥了大规模炮击金门作战。这是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的独特作战，使新中国继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与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所作的政治、外交的较量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8月20日黄昏，毛泽东站在北戴河岸边望着大海，精神因高度集中使他兴奋起来。古人在北戴河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句子，他此时是“东临碣石，以思金门”呵！

7月17日，他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和空军入闽的命令后，空军马上行动起来，决定由在朝鲜战场的现代化空战中经过考验的五个师第一批转场入闽，力争打好第一仗。并由聂凤智为司令员，组成福州空军指挥部指挥作战。

考虑台湾海峡美国海空军力量的存在，他让中央军委为空战规定纪律，要求不进入公海上空作战；美国飞机不进入大陆领空即不许主动向其攻击。人民空军飞行员作战十分英勇。空军第十六师飞行员周春富架米格17型歼击机，在飞行高度比对方低的不利条件下，单机冲入敌阵，击伤其一架，但自己也被击落，周春富跳伞后落入海中。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空战进展，闻讯后让秘书用电话通知福州军区，一定要救起落水飞行员。经海军炮艇和平潭县1800多艘海船反复搜寻，一直未找到下落。空军入闽20天，经数次空战，显示了实力，击落国民党军飞机四架，击伤五架，自己被击落一架。从此，福建上空的制空权被解放军空军掌握。听说福建老百姓为此欢呼：“我们头顶上也真正解放了！”他很高兴。

福建有了空中掩护，地面炮兵部队在未遭受空中袭击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荫蔽集结，32个炮兵营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各部队在台



风暴雨的恶劣气象条件下艰苦行军，未被国民党军发现。还在前线抢修了各种急造军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为大规模炮击创造了条件。七月底，他还得到报告，由东海舰队陶勇将军指挥的一个大队的鱼雷快艇，从上海秘密乘火车南下厦门，陆上行舟，顺利入闽，瞒过了国民党军队和情报部门的侦察。

8月20日，他在北戴河几经斟酌，终于下了最后决断：“立即炮击金门。”这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需要及中美两国关系的考虑。当日，他让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立即通知叶飞赶到北戴河来汇报。当晚，他对林彪、彭德怀谈炮击金门作战方针时说：“我们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经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门、马祖撤兵，或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陆作战，视情况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叶飞于8月21日中午到了北戴河，刚安顿住下，立即去面见毛泽东。

叶飞作了如下记述——

……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军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呵！”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了决

心：“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8月22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即炮击金门。直通福建前线的专线电话架到北戴河叶飞住的房间里，然后再转报毛泽东。

“八·二三”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这个避暑胜地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

炮火准备的时间是“八·二三”下午五点半。据曾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回忆，直至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召见黄克诚、王尚荣和雷英夫本人时，才最后确定按预定计划炮击。

1958年8月21日晚间，预定参加炮击金门的解放军陆军36个炮兵营，连同海军的6个海岸炮兵连，先后荫蔽进入发射阵地。至23日拂晓，完成了射击准备。同时，对厦门、莲河这两个炮兵群担负对空掩护任务的高射炮部队，也都进入了阵地。

前线指挥部为了首次炮击的突然性，除了要求荫蔽进入阵地外，还控制了海岸，海船只准进岸不准出，以免走漏消息。规定炮兵一律不准事先试射，而用精密法准备射击诸元。力求使各炮群的首批炮弹同时落至既定目标。

如果说1949年10月那次首攻金门，掩护木船队渡海的解放军炮兵仅有80余门105毫米的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这次炮轰金门，确实今非昔比了！骨干炮群是苏制152毫米和122毫米的加榴榴弹炮；但是，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期间缴获的美制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150毫米榴弹炮。总共达到459门。这是解放军炮兵战史上较大的一次炮战，从规模上看可以和攻克锦州、朝鲜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中的炮战并列。其中使用的部分美制和日制旧式火炮，原已准备淘汰，此次是利用这次炮击将旧炮及其库存的

弹药用掉。从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看，解放军炮兵大多经过抗美援朝激烈炮战的锻炼，作战经验优于对方，火炮数量也优于对方，加上有大陆依托，运输便利，弹药供应充足。但是从火炮的质量上看，国民党军炮兵却略占优势，其以美制155毫米榴弹炮为骨干，还有部分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火力组织比较严密，但因运输线被封锁，弹药不足，损失补充也不容易，战斗持续时间长，在火力上必然处于劣势。只要美国海空军力量不介入，解放军以陆、海、空三军配合封锁金门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8月23日，星期六，当天下午5时许，金门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正召集官兵，一面举行周末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俞大维训话。夕阳已往西边靠大陆下斜，从金门太武山往西看，会有点刺眼，海边风平浪静。聚餐散后，官兵正在散步离去。他们对于解放军这次突如其来的炮击，根本没有觉察。

下午5点半，福州前指发出开始“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升起，从西边厦门炮兵群、北边莲河炮兵群与东北边围头炮兵群，发出震耳欲聋的炮声，26000余发炮弹从不同方向落到金门北太武山国民党军阵地上。顷刻间山摇地动，金门岛立刻陷入火海和烟雾之中。金门防卫司令胡璜正陪同训话完毕的俞大维，漫步走回司令部，赵家驥、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站在翠湖岸边的桥头上谈话。据目击者刘毅夫撰文记述当时情景——

突然有阵嘶嘶声音，掠过太武山头，驰落翠湖，紧接着是山摇地动的不断爆炸声，整个翠谷烟雾弥漫，弹片横飞，硝烟冲鼻，翠湖亭塌了，小桥断了，公路出现了无数炮弹坑，很多断树在空中飞舞，石砾、泥土、草木，混杂在继续不断的爆炸声与弹片中飞舞激射……

俞大维在炮弹爆炸时，被附近的一个叫廖光华的科长钻入路边山石下躲避。胡璉拔腿就跑，侥幸跑回司令部。在桥头谈天的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于第一群炮弹落地爆炸时炸死。赵家骧担任过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参谋长，是解放军的老对手，是辽沈战役中侥幸逃出的大官。章杰是空军将领，曾担任台湾的空军副参谋长，在金门负责对空联络。吉星文是老西北军官，七七事变时曾担任值守卢沟桥的团长，曾在何基洋将军指挥下奋起回击日军侵犯，一时闻名全国。

解放军的首次炮击收到了奇袭之效。岛上国民党军官兵毫无戒备，好些人晚饭后在滩头纳凉，爆炸声中纷纷慌忙逃入掩蔽部。停泊在料罗湾的中字号登陆艇和台生轮运输船被炮弹击中，陷于瘫痪。岛上的有线通信网完全被炮火破坏。胡璉跑回司令部立即拿起电话下令炮兵还击，但电话已经不通。他拿起多部电话机，叫炮兵阵地，没有一部有声。他懊悔了。

过了20分钟以后，国民党军的炮兵才自发地还击，发射了炮弹2000余发，很快就被解放军的炮火压了下去。首次炮战持续了85分钟。解放军发射炮弹3万余发。金门方面事后承认伤亡600人。

“八·二三”炮击使台湾十分震动。台北等城市实行紧急防空措施，一些部门还进行了疏散。蒋介石一时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估计解放军会登陆金门，并有可能攻击台湾。他向艾森豪威尔告急，要求美国迅速帮助防守金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不大的台湾海峡，摆开了五艘航空母舰的阵势。

金门岛，一下子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金门首次炮击，成果颇丰。毛泽

东同意叶飞从北戴河赶回福建前线。

叶飞的心情处于一种特别的亢奋状况之中。作为九年前金门首攻失败的十兵团司令员，他请求处分，承担责任，毛泽东只是说主要是接受教训。这些年来，攻占金门，一直是他心头大愿。夜里经常为此睡不安寝。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连坦克部队都调来了。老百姓第一次看见解放军的坦克车和那么多重型大炮，轰轰隆隆，连厦门街道都震动了。老百姓高兴了，议论纷纷，都猜测不只要攻打金门，也要攻打台湾了。

在叶飞8月底回到厦门前线时，中央军委又增调炮兵第二、第六师入闽参战，加强火力。为了在夜间准确打击驶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船，还从空军调来一个探照灯排，对金门外海的海面进行照射，每隔10至15分钟照射一次，让炮兵根据灯光寻找射击目标。

8月底，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到厦门了解战况后，就对叶飞说：“这次趁亚楼司令在，我们是不是提出用空军轰炸金门，炮兵配合，将胡璉的炮兵给它摧毁性的打击？”

叶飞说：“出动空军轰炸金门，还必须慎重考虑。目前毛主席还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原定炮击金门的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们不实行金门登陆，现阶段就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

叶飞为了尊重韩先楚的意见，征得韩同意，将俩人的意见同时报告给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在北戴河。

第二天，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答复叶飞：“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主席同意你的意见。”

9月1日夜，一支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国民党军运输编队驶入金门海域。我军护卫艇掩护鱼雷艇出击，经过激战，国民党沱江舰被重创而沉没，我军损失两艘鱼雷艇。

解放军空军派出飞机在金门侧边上空侦察，拍摄照片，让炮兵根据照片在地图上确定射击目标，成功地实施对机场跑道的袭击，阻止了台湾的机降补给。

从9月3日起，金门守军只能靠台湾空军补给。可是空投飞机畏惧炮火，不敢低飞，金门岛又呈哑铃状，岛面窄长，导致高空投掷物极易飘落海中，飘落面向大陆这边的海滩及开阔地，也会被解放军炮兵摧毁。因而空投成功率甚低。

金门岛上守军躲在地下靠储备品度日，处境日益困难，台湾中央社战地记者刘毅夫冒险来到金门岛，带去的几瓶酒和几块月饼，都成了岛上高级将领的宝贝。

炮击金门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召集各方面的人士研究中国领海主权问题，并征求了一些熟悉国际法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西方国家根据海牙协议，确定了3海里的领海线，并要求世界各国遵行。其实这种3海里的领海线只利于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使它们的舰船可以方便地到别国近海进行军事经济活动。毛泽东在大家畅所欲言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经济、国防利益出发，本着独立自主和不惧怕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态度，综合国际上的情况及中国国情，最后确定了领海线为12海里宽度，并决定于9月4日正式公布。至今事实证明，12海里领海线，适合我国具体情况，既没有影响他国沿海的经济利益，也保护了我国近海的部分资源，而且这一宽度又是在我国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之内。当时我国海军海岸火炮的有效射程也在12海里以上，岸炮火力能够确保给侵入这一水域

内的外国舰船以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在宣布领海线以后的三天里，命令福建前线停止炮战，就是准备看一看美国军舰飞机对中国领海线的态度如何。从这年9月7日起，每逢美军舰船飞机越过中国领海线，中国政府发言人都要发出一次严重警告，并在华沙中美会谈中提出交涉。美方虽说答应调查，同时也声称：你们宣布的12海里领海，我们是不会承认的，但我们的军舰也决不会进入12海里。

毛泽东命令福建前线停止炮击金门三天的限期过去了。金门海面沉浸在一种不寻常的平静之中。

接近中午时分，海上观察哨发来报告，海上出现由14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正朝金门海域驶来。过一会观察得更清楚，这是一支由美台双方军舰混合编队组成的舰队，编队中包括美军的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其余是国民党海军的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美军舰只上的美国星条旗已看得清楚。中午时分，军舰停在金门附近海面做出掩护姿态；国民党海军的2艘运输舰驶入金门料罗湾码头卸货。

叶飞即向毛泽东报告美国舰为国民党舰船护航的情况并请示对待方针。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

叶飞又请求：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叶飞又问：我们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据叶飞事后回忆，当时接到毛泽东这个命令，他本人与炮兵部队都极为吃惊——

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

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更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两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我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遍，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8日，台湾国民党军由于前一天靠美舰护航得以平安运输，十分得意，又出动4艘登陆舰，在美军1艘巡洋舰及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再次向金门驶来。美舰又停在金门外海，由国民党的登陆舰驶向岸边卸货。

叶飞从云顶岩指挥部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

北京接到前线电话后，毛泽东即下令开火。

12时43分，解放军以43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组成的强大炮群突然开火，连续发射了21700发炮弹，猛烈射击金门岛上的军事目标及驶入料罗湾的登陆舰。在炮击中，美乐号登陆舰当即被击中起火，引爆了舰载弹药而沉没。美珍号中弹累累后向外海逃窜，另外两艘登陆舰也在中弹后逃走。这时，美国军舰根本不管国民党舰只，急速退驶到料罗

湾以外近12海里海域徘徊观望，始终不发一炮。

当时在国民党旗舰上的战地记者刘毅夫曾记述美舰的表现——

……这该是美国军舰开炮压制共军的时候了，最低限度他们也该开炮表表情呵！我站在旗舰姚道义支队长身旁，悲惨地看着我四艘无助的运补舰挨炮，再用无法形容的眼睛回头看美国兵舰，他们好像根本无动于衷，他们好像奉的命令就是来金门参观；而美其名曰“护航”，哎，狗臭屁的护航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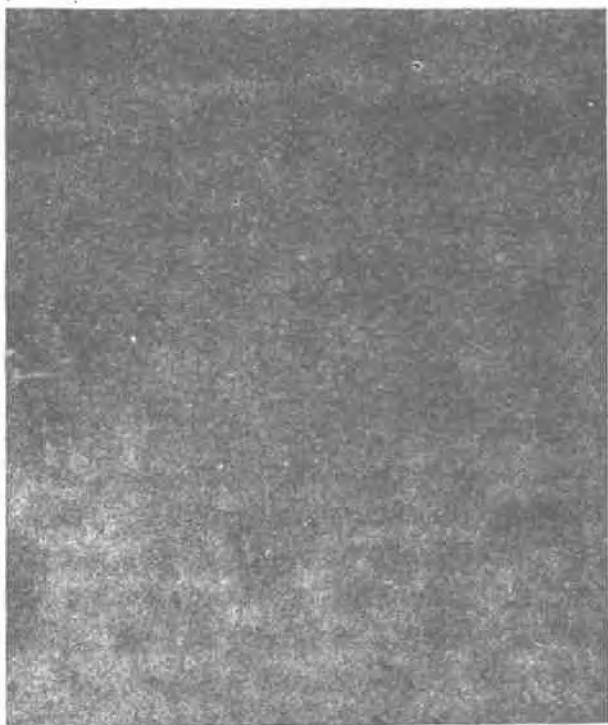
9月11日，4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军的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当时毛泽东已经离京赴南方各省视察，由周恩来在京布置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解放军炮兵再次轰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这些运输舰一遭打击就向外海逃走，只有1艘被击伤。美国军舰态度如旧，解放军一发炮就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不打。

通过9月8日、11日两次炮击，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

叶飞终于领悟过来：他明白了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了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强大的美国底牌摸清楚了。它要冒和中国打仗的危险，它就不干了。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国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也力求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就在台湾海峡形成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金门炮战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显示出来。当时，毛泽东立即调整政策。在1958—1959年内，新中国决定大幅度裁军，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建国35年中最低的，全军总员额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责任编辑：刘家驹）
（本文即将由八一出版社出书）

编者按：近年书、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子女生活经历的作品，其中不乏道听途说或臆测编造之处。本文作者与毛泽东之女李敏有着几十年的交谊，她把自己亲历亲知的真情实事写成本文。本刊征得有关方面同意，郑重推荐给读者。除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家人和家风，也望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



伟人之女李敏的近情往事

● 王桂苡

五十年代初，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我的同学中，许多都是当代中国名人之后，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他的红军战友贺子珍共同的女儿李敏。最初我只远远地默默注视着她。由于她那伟大的父亲，似乎她也很神秘甚至神圣。后来我们在一个宿舍睡觉，一张餐桌吃饭，我们间的距离终于缩短了。原来，她竟这么普通，又这么单纯，并且显得格外的文静、清秀和娇小。

我们刚认识，她就告诉我，自己的小名叫“娇娇”。

一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那是1936年，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妈妈贺子珍在保安县一孔石窑洞里生下了她。长征途中，根据地里，妈妈和别的红军战士一样，经受着无尽的饥渴寒暑，更曾在敌机轰炸时，多处受伤，这使得刚出生的

她，显得那么瘦弱娇小。赶来看望的邓颖超妈妈怜爱地抱起这个小娃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正在一旁的爸爸毛泽东忙说：“对，就叫个‘娇娇’！”

于是，“娇娇”就成了她的“代号”，只是有人叫她“毛娇娇”，有人又叫她“贺娇娇”。其实不管叫什么，她自己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她正式名为李敏，更是很久以后的事。

有一回，李敏让我看一张模糊不



◁17岁时的李敏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全家在北海散步



清的老照片。上面有一群大小不齐、男女不分的小孩，有的穿着拖到膝盖的旧军衣，有的裹着土里巴几的老棉袄，正列队昂头唱歌。李敏指着排尾一个“小不点儿”笑道：“瞧，这就是我！”

直到前几年，我有次去看她，她又翻出这张照片，戴上老花眼镜，仔细辨认着照片上的自己，笑得两眼眯成一道缝，从眼镜上方看着我，手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当年的尊容，瞧她多么傻！”

其实，正是她那“傻得可笑”的年代，生活中却充满了艰难和酸辛。

由于她当时无法理解的原因，妈妈生下她的第二年，就离开了她和爸爸，去了苏联。一岁多的娇娇，开始寄养在一户陕北老乡家里，虽然享受着山区农家别的孩子同样的“待遇”，却失去了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亲生父母的关怀爱护。以后她又被送进著名的延安保育院，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每逢星期六，保育院的小伙伴们，都被正在延安工作的爸爸妈妈接回去过“礼拜”了。娇娇看着他们有的搂着爸爸的脖子，有的亲着妈妈的脸庞，连蹦带跳，跟着爸妈回家了；即使爸妈不来的，也有被称为叔叔、阿姨的工作人员，替他们的父母将孩子接回家去。

一个又一个星期天过去了，娇娇始终没有人来接，她好像没有家。其实她爸爸就住在杨家岭，离保育院并不远，但是，她的记忆中，爸爸却没有来过保育院接过他的娇娇。她总是和保育院的阿姨、叔叔们一起，没滋没味地过着一个又一“礼拜天”和节假日。

长大了的娇娇，回忆起这一段生活，总是声音轻轻却不无沉重地说：“那时，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或者靠紧了我，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个孤儿！”

我的父母都是在战争年代牺牲

上了到阿拉木图的飞机。

妈妈被娇娇， 被当成“疯子”

娇娇到了苏联见了妈妈。直到50多年后，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也成了她少有的几乎是最幸福美好的回忆。

我不止一次地听她叙说自己的这一难忘的时刻。

妈妈见到娇娇时，高兴地故意一遍又一遍问她：

“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她说。

“妈妈叫什么名字？”

“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她每次说到这都甜甜地笑着，眼睛里溢出幸福之情。

有一次我随意地问她：“在苏联的日子过得好吗？”

只见她的眉头微微一蹙。我的问话触动了她深藏在心底的痛苦。她两眼怔怔地看着我，好半天才说：“许多人的童年，总是幸福的。可我的童年，



△贺子珍和贺怡



的，她虽然父母双全，却尝够了我多年深受的苦情。也许正是这种“孤儿”同感，使我们成为知己。

不过，她的爸爸并没有忘记娇娇。1940年，她在爸爸的安排下，和朱德伯伯的女儿朱敏等四个孩子一起，搭乘一架苏联飞机，转道甘肃和新疆，上苏联去找妈妈。

他们在延安上飞机后，领着他们的叔叔板着脸说：“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情况，你们几个人，都不许乱说乱叫，更不许乱动！听到没有？”

娇娇似懂非懂又十分庄重地点着头。

飞到兰州时要换飞机，机场上布

满了国民党军队的哨兵。飞机上有中共要人的孩子，不能让国民党知道。领着他们的叔叔把几个孩子藏到机舱里头，快天黑时才把他们一个个用毛毯裹上，伪装成“行李卷”，扛上了另一架飞机，在里头又饿又冷地闷了一夜。第二天起飞前，国民党的人上来检查，他们更是动也不敢动，连气都不敢出，终于混过了敌人的眼睛，直到再次起飞以后才被从“行李卷”中解放出来。飞到迪化（即乌鲁木齐）时，这几卷“行李”又被送到苏联领事馆，但一去就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吃喝拉撒全在里头。由于遇到暴风雪，飞机停飞，他们在那儿憋了四五天，才又被当成“行李卷”运

却是苦的！”她凄苦地微笑着又对我说，“如果说你的童年像黄连，我的童年呢，就该叫做苦苦菜！虽然，我也有着爸爸妈妈，但是我却并不幸福，好日子总是不如苦日子多，好像我走到哪儿，苦事就跟到哪儿！”

就在她见到妈妈，享受到短暂的亲情以后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全苏联的生产和生活都乱了套。娇娇开始还和妈妈住在一起，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零下30度，屋里都冻了冰，物质供应极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点黑面包。德国军队不断深入苏联内地，娇娇和妈妈，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浸入了战争的苦难之中。

苏联政府一面领导全国抗战，一面继续尽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在战前就建立了一所“国际儿童院”，专门收留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子女，为各国培养新一代革命和建设人才。中国孩子在国际儿童院里，共有70多名，其中有着与娇娇同父异母的哥哥毛岸英、毛岸青。

娇娇的妈妈对岸英、岸青兄弟十分关心，由于国际儿童院的生活也很艰苦，她让他们每个星期天都来和自己同娇娇一起过。两个哥哥一来，娇娇也格外高兴，跟他们一起玩，陪他们上食堂吃饭。当时他们都定量有限，妈妈和娇娇领到的口粮，当然不够岸英、岸青两个小伙子吃。妈妈同娇娇平时就尽量省着吃，又在星期五买了些土豆，星期六就煮了一锅，岸英兄弟一来，连平日省下的黑面包，加上热乎乎的土豆汤，四个人吃得十分痛快。这成了他们在战争年代的异国土地上的天伦之乐。

可惜这种日子没过多久，他们的生活又起了变化。先是妈妈被送到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那里不能带孩子，学习任务又很重，只得让娇娇也到国际儿童院去。不久大哥岸英又学军事和参军去了，娇娇和二哥岸青留

在儿童院不同的班级里，过着同样的没有亲人的艰苦生活。

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像，其中也有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画像。老师常常对孩子们讲述各国的革命情况和斗争事迹，也讲过毛泽东正领导中国的红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那时的娇娇不知道毛泽东就是自己的爸爸，她离开爸爸时太小，对爸爸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当时她的幼小心灵里，只有着亲爱的妈妈和两个哥哥。

有一天，二哥岸青和娇娇在礼堂里玩，二哥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问她道：“妹妹，你知道他是谁？”

“知道。”娇娇说。“老师讲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是。”二哥说着又贴着她耳朵小声道，“可是，他又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娇娇眨巴着两眼对二哥道，“我没有爸爸只有妈妈！”

“不！”二哥认真地接着说，“我没有瞎说，毛泽东是我们的爸爸，我们都是被他送到这里来的。”

娇娇想大人是不说瞎话的，二哥也是大人了，加上他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娇娇不由得有点相信了。不过她还是想象不出，这个毛泽东为什么会是自己的爸爸。她的记忆里，只有着妈妈的亲情。

娇娇永远难忘妈妈。她在儿童院有次得了肺炎，因为战争时期缺医少药，病情不断加重，眼看她呼吸微弱，浑身都抽搐起来。医生认为她已没治了，要把她送进太平间去。

急急奔来的妈妈一把抢过娇娇，紧紧抱着她，医生怎么说她也不撒手，硬是把不省人事的娇娇抢走了。

妈妈卖掉身边仅有的一些衣物，换回一些奶粉和冰糖，又用自己种的土豆，换来半杯牛奶，然后撬开娇娇的嘴一点一点地往里灌……娇娇居

然活了下来，又调养了一段时间，竟能下地走路了。

儿童院的“首长”认为娇娇已恢复健康，非要她马上回儿童院去。妈妈却说什么也不放娇娇走，争来争去，就同那些人吵起来，那些人竟说妈妈是“疯子”，要把她关到精神病院去。后来竟真的把她当成“精神病患者”，硬给抓走了。

这样，娇娇真的成了“孤儿”。直到1948年，爸爸妈妈的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在苏联找到了贺子珍母女，才让他们骨肉重逢了。

这次重见妈妈，娇娇更是永世难忘。她一见妈妈就愣住了，这是自己的妈妈吗？她正瞪眼看着因受苦变形的妈妈，妈妈却一眼认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娇娇。娇娇被妈妈一把搂在怀里，热泪奔泻而下……

不久，在王稼祥叔叔等的安排下，娇娇和妈妈还有岸青等，都回到了祖国。终于结束了在国外的不堪回首的生活。

“民女王贵”和 “公主李香香”

她回到哈尔滨后，又见到了毛泽东画像。有人对她说那就是她爸爸。她不敢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就悄悄去问妈妈。妈妈也说是，这下她不得不信了。就在心里不断勾画着爸爸的形像，想象着他是个怎么样的爸爸，可是总觉得很虚幻模糊，想来想去就给照片上的爸爸写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这封信是用俄文写的，因为娇娇没有学过中文，连祖国的话都不太会说。毛泽东看了翻译出来的信，马上挥笔给娇娇回信写道：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回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信还没寄出，毛泽东又吩咐把信改用加急电报发出。娇娇的爸爸也急于想看到自己的女儿。

娇娇的妈妈把来电译成俄语，念给女儿听了。娇娇兴奋得跳了起来。

1949年夏，姨妈贺怡带着娇娇，从东北辗转来到当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又把她领到正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面前。贺怡拉着娇娇的手，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的任务完成了，把娇娇给你接回来了。”又转身对娇娇说：

“娇娇，这就是你的爸爸，就是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说着就把她推到了爸爸跟前。

此情此景，李敏也是水世难忘

的。她说，自己一见高大魁梧又慈祥亲切的爸爸，果然就是常在画报上和礼堂里的画像上见到的毛主席，也同妈妈、哥哥说的一模一样，就情不自禁地扑上前去，柔声叫道：

“爸爸！”接着就投入了爸爸宽大温暖的怀抱里。

爸爸也兴奋地一下抱起了她，喃喃地唤道：

“娇娇，我的小娇娇！”又用同画像上一

样的脸，紧贴在娇娇细嫩白净的小脸。父女二人都沉入了人间常享他们却难逢的天伦之乐中。

爸爸让娇娇留在自己身边。她见爸爸工作完了休息时，就轻轻跑过去，抱住爸爸的脖子，在他的大脸上亲一下，乐得爸爸哈哈大笑，有时不是高兴地“吧唧”一声，回她一个响亮的亲吻，就是放下手里的文件什么的，同娇娇互相说笑逗乐一番。这时的爸爸就不再是画像上那个有点威严的毛主席，而是一个充满亲情，柔情的——大爸爸。

每当李敏说起当年的事，全身心都沉浸在那虽已逝去却又永恒的温馨甜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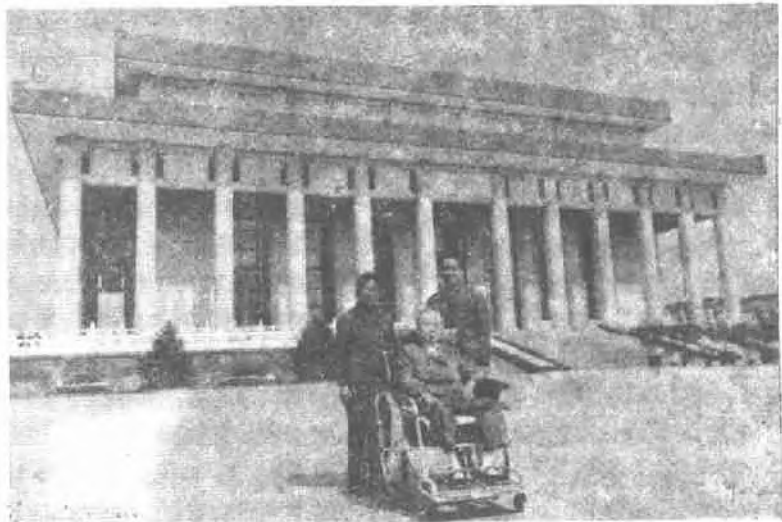
那时，有人把她叫成“公主”，常努力辨认着她哪儿像伟大的爸爸，哪儿又像美丽的妈妈，我却从她的秀丽清纯和文静端庄上，认为她真像一个公主。一次我问她：“你是一位‘公主’，怎么爱跟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孩子在一起，并且不分彼此呢？”

她又微眯上眼，稍偏了头，轻轻地说：“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教育过我，要多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来往，要同他们交朋友，学习他们勤劳、朴实和诚恳待人的好品德。他们还常告诉我，要学会爱别人，关心别人。”

李敏正是这样做的，她对入真诚相待和热情相助的事太多了。

有一年各班级举行除夕晚会，李敏因为感冒没能参加。当时李讷也在我校学习，只是不属一届。她赶来参加自己班级的新年晚会时，先来我们班找到我，交给我一个用红色绸带扎好的长方形纸盒，上面还用绸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李讷说这是姐姐李敏特意让她带给我的一份新年礼物。

晚会一散，我急急回到宿舍打开了李敏送我的礼品盒。太好了！上面盖着一张卡纸写着：“新年快乐！送给



好友的礼物。”还有一幅李敏亲手绘制的圣诞老人彩色画像，那洋老头的样子既快乐又逗人。彩画底下竟是满满一盒清一色的驼背大花生，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在一齐向人鞠躬拜年。

这份来自李敏的年礼，一下点燃了心中的火花。这一个新年我过得特别高兴和快乐。

由于我们总是常在一起形影不离，记不得怎么开始的，人们把我叫成了“王贵”，把她叫成了“李香香”。王贵和李香香是我国一部著名长诗中的主人公，五十年代还放映过以此为题材的电影。我的名字略去第三个字，恰好是“王贵”，她以李为姓，正好当上“李香香”。从此她就也叫我“王贵”甚至是“王贵哥”，我也叫她为“香香”，我们间的友谊就更加亲密、非同一般了。如今我们每次见面甚至打电话时，还是她叫我“王贵”，我喊她“香香”。

菊香院里的 “狠心”爸爸

在师大女附中的宿舍里，冬天每屋只生一个炉子，不到半夜火就不旺了，屋里也越来越凉。可是不知怎么我却睡得十分暖和。早晨醒来一看，发现我的身上，早已盖上了李敏的大衣。我感谢她的好意，劝她还是留着自己盖。但是一到冷天，她的大衣还是悄悄地盖到了我的身上。

每个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了。我父母早逝，无家可回。她说：

“这么吧，请你到我家去，我们一块玩玩，过个愉快的星期天。”

我忙摇摇头，开玩笑地说：“我不敢进你们家的大门。中南海的门卫，一个个都那么威严，我连看他们一眼都觉得紧张，哪敢从他们面前走过呢？”

到下一个星期六，她又执意要我

到她家去。我推托说星期天有别的事。她却蹙看眉头央求地望着我。

我不忍再辜负她的好意，答应她明天去。

这个星期日上午，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西门。门卫和气地问我什么事，我说来找李敏，是她让我来的。那门卫让我在接待室坐下，他去给李敏打电话。才一会儿，李敏就来了。她先跟接待的同志道了谢，就领上我有说有笑地进了中南海。

走近一个内院大门，她对门卫点点头，门卫摆摆手请我们进去。进到里头，又是一道门卫。我悄悄说：“这么多警卫，真跟过关一样了。”

“没事。”她朝门卫甜甜地一笑，门卫就给我们打开了门。我跟着她，进了叫菊香书屋的小院。里面非常安静，除了不声不响的警卫人员，没见到别的人。李敏把我领进了她自己住的一间南屋，一进门就说：“好了，这是我们的自由天地！”

我们就痛快地一边说笑着，一边翻看她的许多书。

我见她桌上有一封开了口的信，她抽出信纸让我看了。是毛主席的一位亲戚写来的，说是他的孩子没考上大学，想求毛主席给说句话讲个情。

我说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毛主席会帮这个忙的，让秘书打个招呼就行了。

李敏却摇摇头说：“不行！爸爸让我替他回这个信。”

我忙问她，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她说：“爸爸只说了一句话，就是：靠我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得照爸爸的意思办，既要把爸爸的意思转达过去，又要让人家满意，鼓励那个孩子振作精神，继续学习，来年考个好成绩。两边都要说到，把话说圆，你说这容易吗？”

说着，她又给我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我上初二那年，一放暑假就抽爸爸的

当时妈妈独自住在上海。爸爸听了说：“好哇，你去吧！”

“可我怎么去呀？”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

爸爸说：“买票坐火车去嘛！”

“就我自己，一个人去吗？”

“那么多人坐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发愁地说：“可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

他看看我，断然说道：“你是个大孩子了，莫要人陪，自己走！”

真没想到，一向疼爱我的爸爸，拒绝了我的请求。我不敢再说了，满心委屈地泪水注满眼眶。

当时我想，爸爸一直叫我“娇娇”，我何时被“娇”过“惯”过呢？我硬着头皮，还是自己坐火车去了。不是爸爸心“狠”，我哪能这样呢？

“中华第一家” 的平常伙食

李敏家的伙食极简单平常，其早餐更是同全国多数人家相同的“老三样”：稀粥、馒头片加咸小菜。

有一回，有人给他们送来一些可可、咖啡和奶粉，伙房大师傅就乘机给大家特别是几个孩子换换口味。早上煮了一小锅香喷喷的咖啡，冲好了奶粉，又把馒头片换成了面包，抹上黄油。

新鲜诱人的洋式早餐，李敏一口气吃了四片面包，喝了两小碗加奶咖啡，对为他们改善生活的大师傅道了谢，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哪知伙食改善了才几天，李敏他们被爸爸叫到一起，说要开个家庭会议。爸爸先让大师傅报了这几天的伙食账，发现超过了每天的规定标准。爸爸态度严肃地说：

“伙食标准定了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时候也不能超过。随便超过就不对！”

大师傅和李敏等都接受了批评，马上恢复了“老三样”，李敏他们后来干脆到机关食堂吃大灶去了。

高考后我们都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她进了化学系，我进了中文系，见面虽少，友谊照常。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在长身体，营养却严重不足。有几次相遇时，她见我说：“你又——吃胖了！”

我说：“你也是。”

我们说的都是玩笑话，但却谁也笑不起来。因为我们那不是“胖”，而是缺少营养的浮肿！可是她没有关心自己的健康，却记挂起我的身体来。她把别人送她的一些黄豆和代食品，平分成两份，一分省给了我，还不准我推让，只对我说：“这有营养，能治浮肿病，全给吃了！”

我关切地问他家特别是毛主席当时的生活情况，她悄悄对我说：

“平常我们回家时，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才能同爸爸同桌吃一顿饭，一来让爸爸了解我们的情况，检查我们的学习；二来稍微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让我们解解馋。大师傅每到这一顿，都要加做两个好点儿的菜。所以我们每周盼望星期六的这顿全家聚餐。

“可是，渐渐的，我们再吃这顿饭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照例加的两个菜，不仅质量显著下降，有时连油花也不见几滴，那味道同学校食堂里的也相差不多，就是爸爸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

“有回大师傅端上来一盘鱼，爸爸一向爱吃活鱼，可是这条只有半尺来长的鱼，身子又扁又干，都不够一人一口。我听大师傅说，爸爸也好久没吃鱼了，就想省给他吃，几个人都没动筷子。爸爸奇怪地看着我们，说道：‘吃呀，吃鱼啊！’

“我的鼻子忽然发起酸来，呆呆

地望着爸爸那也开始消瘦的脸，想说什么，一句也说不出来。还是爸爸把筷子伸向鱼盘，招呼道：‘吃，我带头！’

“我慢慢地吃了起来。不知怎么，我吃在嘴里，老是咽不下去，只觉得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味道，似乎酸、甜、苦、辣一齐泛了上来……”

“公主”和“孔夫子” 的恋情婚事

李敏是个少言寡语、爱好沉思的内向型姑娘，连她穿衣服都喜欢素净淡雅的颜色。由于她继承了父亲的端正和母亲的俊美，她确实显得像“公主”一样的文静和端庄，即使是普通的学生蓝制服和中式小棉袄，一到她身上就是那么可体动人。其实她也是一个正当花季的少女，其内心同大家一样，正燃烧着一股青春之火。

有次学校搞联欢，排了个《采茶舞》，她主动要求参加，由于她个子娇小，就当队尾的幺妹儿。随着舞蹈伴唱的“百花开放好春光，采茶的姑娘满山岗……”声，在大姐、二姐、三姐……的后面，出现了一个既活跃又美丽的幺妹儿，舞步轻盈，舞姿优美，一招一式那么合拍，一颦一笑那么动人，水汪汪的双眼溢出真情，灵巧巧的双手如花翻飞……

人们惊喜地发现，她竟是平时不声不响更不笑不闹的“公主”李敏。

不待她“谢幕”，周围就一片喝采评说声：

“真没想到，她的舞跳得这么棒！”

李敏毕竟是吃过洋面包，受过洋教育的人，她早就既不声张又不保密地交开了男朋友。对方是她在八一学校的同学，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我们几个和她要好的人，悄悄提醒和劝她：

“你这事让人知道了可不好。”

“叫老师知道了，你会挨批评的。”

“这事可得保密，对谁也不能说！”

……

她听着却笑了起来，似乎胸有成竹地慢言慢语道：

“谁规定我们女生只能交女朋友，男生就不能同我们来往呢？交朋友也不等于是找对象，友谊也不等于爱情。人要是把自己装在罐头盒子里密封起来，那成个什么啦？”

她对我从不隐瞒什么，甚至和我一起评说着自己的“白马王子”，因为他姓孔，我就把他叫成了“孔夫子”。有一天我们又在宿舍里说开了：

“李敏，你那个他长得很漂亮呢！”

“也很帅，就是眼睛小了些。”

“眼睛小好嘛，没听说吗？眼大无神，眼小迷人。”

“哦，‘孔夫子’把我们的‘公主’给迷住了！”……

有段时间，“孔夫子”学习成绩不太好，李敏不高兴了。那个年代她和许多人一样，把理想、事业和学习放在第一位。她就表示，如果他成绩上不去，俩人就减少来往甚至暂不来往，让他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他们的关系也等他成绩上去了再说。

在这以前，李敏已经领着孔令华去见过爸爸。那段时间内，李敏有次回家，爸爸问她：“令华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

“他学习很忙。”李敏回答。

“要劳逸结合嘛！”爸爸停了一下又笑着问道，“我看是有磨擦了吧？”

李敏如实说后，爸爸说：“就是一时学习不好，也莫以成败论英雄嘛！你转告他，要他好好学习，有时间还到我们家来玩。”

不久，孔令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李敏才又领着他再去

中南海，看望了爸爸。

1959年夏天，毛主席在中南海家里，为李敏和孔令华主持了婚礼。孔令华的家长及两家的至亲好友，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李敏爸爸和妈妈的战友蔡畅、邓颖超等。

毛主席请参加婚礼的亲友们，共聚一堂，吃了顿便饭，又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婚礼就告完成。“公主”领着她的“孔夫子”进了自己原住的菊香院内小南屋。里头不仅没有现今的新式装修，连迤拉灰墙也没有粉刷一下，更没有任何新家具和摆设之类，只把往日被褥床单等等洗得干干净净。

婚礼以后，毛主席有回偶然问李敏道：“噢，你的好朋友‘王贵’呢，她那天怎么没来？”

李敏说：“她到青岛去了。”

毛主席笑道：“哦，去找她的‘炮兵’了，是吗？”

原来那时我也谈上了恋爱，我的男友在解放军炮兵部队工作，正驻在外地。我的这些事，李敏都跟她爸爸说过，竟被他老人家记住了。

李敏的婚礼我未能参加，虽然十分遗憾，但是听了她转述的毛主席的话，满心感到欣慰。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居然还记得并问起我这个普通女学生。不仅如此，我大学毕业时，他老人家还送给我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作为纪念，可惜我当时不知道请他在书上签上名，但是这套书却和李敏那次送我的两张毛主席照片一起，一直被我珍藏着，老人家对我的关切之情，更始终珍藏在我的心底。

1961年，李敏生了娃娃。毛主席非常喜欢这个小外孙，可是有人容不得他们。1963年，李敏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奉命搬出了菊香院，不久又奉命搬出了中南海，连他们的出入证也给收了。李敏从此再见爸爸就难了！

毛主席知道这事后，沉重地说：“手心 and 手背，都是手上的肉啊！”

毛泽东女儿的苦处， 有谁知道呢？

世态炎凉，人间沧桑，我和李敏的友谊却从未中断，在外地教书的我，与她书信不断。1964年，我的儿子出生，她给寄来了小圆帽、小皮鞋和小围兜，从头到脚都有了。1970年，我随夫调到北京，和李敏恢复了来往，我常去看她，见她身体精神大不如前，我就多次陪她去看病、取药。

1976年9月8日，我又去她家，见她心情很不好，就没敢多问什么。我走时她把我送出门，走到楼尽头时，见她欲言又止，心事很重，就宽慰她说：

“你不舒服吗？要有病最好抓紧去看，我明天来陪你去吧！”

她无言地摇摇头。

我不安地问：“你到底怎么啦？”

她低着头愣了一会，还是说：“没什么，你回吧！”

我说：“那你也别送了，快回屋去。”心想明天我再来。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9月9日，她的亲爸爸，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

在那悲痛的日子里，我常常守在李敏身边，力求分担她的痛苦与悲伤。她曾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真羡慕别人，能常在自己父母身边，可我不行。想见见爸爸还得请示、报告，等待批准……太难了！”

她说，1974年去见爸爸受到阻挠，气得同人吵了一架。她当时说：

“你们凭什么不准我去看爸爸？搞运动就是让骨肉分离吗？”她又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封锁毛主席，好由人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我爸爸要知道了，也会反对你们的。”

但是权在别人手上，她就是见不着爸爸。

从爸爸生病到去世，只让她去见过三次。他眼睛红红地说：

“一次，我还在干校。（毛）远新打电话来，说爸爸病重，让我去看看，我连忙赶去了。哪知回去遇到江青，她说：‘主席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你的事，你走吧！你呆在这里干什么？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快走，也不许你再来！’我马上回敬她：‘我看自己爸爸，不用管你许不许！’”

“第二次，就是你来我家的那天，我是刚刚去中南海从爸爸身边回来。这时，爸爸仰卧在床上，已经非常衰弱，面无血色，声音细微，但是神智还清楚。当他认出我时，让我拉着他的手，轻轻说：‘娇娇你来，看我了……’这时我有满肚子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只不断对他点着头。他无力地抓着我的手，又说：‘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我呀？’我真想向他哭诉，是有人不让我来。但是我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他那衰弱无力有些发凉的大手，贴紧在我胸上……”

“隔了不到一天，就是9月9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爸爸！中央办公厅突然来车接我去中南海。一路上我的心剧烈跳动，胸中似乎要炸裂开来，下车时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由人把我领进了爸爸的房间。那一瞬间，我几乎控制不住了！”

“爸爸，静静地平正地躺在床上，还穿上了所有人都熟悉的‘毛式服装’，一条洁白的单子，一直盖到了他的胸口；虽然他的面容，像平时熟睡那样，那双曾经无比亲切明亮的眼睛，却紧紧地永远闭上了……”

“我浑身颤抖着，一下扑了上去，拉开单子，要去抓爸爸的手……”

“我哭着，喊着，睁着泪眼，盯视着他的脸……”

“但是，爸爸没有任何反应，再也听不到他亲切地叫‘娇娇’了……”

“多少年来，我有多少辛酸、委屈和痛苦，想向爸爸说，现在，再也说不成了，再也无处说了，我还能向谁

说呢？

“毛泽东女儿的苦处，又有谁知道呢……”

就在那些日子里，李敏似乎一下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在精神上似乎完全崩溃了，长期维系、影响和鼓舞着她的唯一支柱，从此崩塌了！我努力去分担着她正承受着的一切。

9月16日，李敏让我和她及孔令华的亲友一起，去人民大会堂瞻仰老人家的遗容。9月18日，她又让我的丈夫和儿子（就是她给寄过小帽子、围兜的那个孩子）去参加天安门前的追悼大会。

我去瞻仰遗容时，还未到停灵的人民大会堂内，那哭声、抽泣声、呼喊声和我自己的心跳声，汇成一片。当我看到静卧在苍松翠柏枝叶和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大幅红旗的老人家时，觉得自己的心，和李敏的一样，也炸裂似的破碎了！

“桂圆”的情怀与欣慰

八十年代初期，贺子珍妈妈来京治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李敏约我和她与孔令华一起去看望老人家。……

我跟着她俩轻轻地走进了病房。这时刚到下午的探视时间，贺妈妈已经午睡醒来，正静静地躺在床上，见到我们进来，高兴地坐起来。

李敏把我拉到她身边，凑近她耳朵指着我说：“这就是‘王贵’，其实叫王桂苾，她来看您了！”

我忙恭敬地又叫了声“贺妈妈”，不知所措地冲她笑着。她看看我也笑了，伸手拉住我的手，连着问了我一大串话。可是她的南方乡音太重，我瞪着两眼却没有听懂。李敏马上给我翻译道：

“妈妈问你，身体可好，爱人还在炮兵工作吗？孩子都多大啦……”

贺妈妈一面听我回答，一面继续

抓着我的手，我感到一股热流从她手上一直传到我的心窝。

当我问她的身体情况，祝她早日康复时，她乐呵呵地说：“我满好，满好嘛！”说着又用右手紧紧地握住我说：“你看，我的手硬是有劲呢，来，我和你比比试试，谁的手劲儿大？”说着就抬起右手，更紧地握住我，真和我比开了手劲儿。

她和我扳了几下手腕儿，高兴地说：“怎么样，还有点劲儿吧？”

李敏插话道：“我晓得，妈妈的手劲好大哩！”

“莫夸大嘛！”贺妈妈又冲李敏笑道。这时那位护理她的女同志给我们每人送来一碗莲子汤。

我不再客气，端起来就吃。

贺妈妈疼爱地看着我，忽然问道：“现在是几月了？”

不等回答，她自己又说：“九月了，农历是八月，我的生日又到了，你们没有忘吧？”

李敏说：“哪能呢，我们正计划着，等你出院回家，给你做个大寿桃，你看行吗？”

贺妈妈开心地说：“不只是我的生日呢！”说完又对着我笑。

我一下想起，李敏有回问我：“你是农历八月出生的吗？”我说是的，她又说：“我妈说过，你叫王桂苾，准是八月桂花开的时节生的，才叫这个名字。我妈妈也是八月生的，所以，她的小名叫‘桂圆’。既是桂花香又是明月圆，多好的名字！”

可惜，过了几年，贺妈妈因年迈多病，不幸去世了！不过她的最后岁月，由于有李敏守在身边，还是补偿了她失去得太多的欣慰以至欢乐。

一代伟人，依然活在人们的生活和心中

李敏家是四居室加一个小过厅，她专门腾出一间大屋，设置了一个毛

主席的灵堂。老人家的遗像前，各色花朵缀成的美丽花环，上面的洁白缎带上，恭正地写着：

永远继承爸爸的革命遗志

女儿李敏 继宁 敬献
女婿令华 东梅

遗像及其花环等等，都罩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内。

在隔壁当客厅用的房间墙上，挂着贺子珍的照片以及她当年和毛主席的合影。妈妈是1984年4月才结束了她那既灿烂又暗淡、既欣慰又辛酸的一生。

似乎就在两位老人家先后辞世以后，李敏从此就很少出门，几乎整年整月整日地厮守在爸爸妈妈身边。虽然只是他们的灵堂和遗像。

我成了李敏家常客之一。

她的生活越来越简单，家具全是该“离退休”的“古老文物”，饮食也差。有一天我们一块做饭时，俩人又发生了“路线分歧”。我吃白菜，总是把外层菜帮子都扒掉，她却把我扔掉的菜帮子又拣起来，对我说：“别扔，这上面有菜叶，还能吃，菜帮子切小点，多炒一会，挺好吃的。”

洗菠菜时，我又掐掉了一些没叶子的大梗子，她又心疼地捡回来，认真地说：“不行，这里面含维生素，吃了对身体有好处。要留着。”

有一回我要倒掉一些早干瘪了的油菜，又被她止住了，我说：

“你看看，都干成这样了，怎么吃？别要了！”

她说：“困难时期，比这还要差的菜，我们不是都吃过吗？你别看它干，用水多泡一会儿，照样能吃。”

有时连两天前吃剩的饭菜，她留着还要吃。

她的穿着更不讲究，我几次叫她别穿旧军衣了。她说：“是衣裳就能穿，扔掉太可惜，穿惯了么！”

就是这样，不管外头风转物移，

千变万化，好像都与她无关，依然我行我素。我拉她去了离她家最近的地安门商场，她简直像乡下人进了城。出来时她一心要请我客，在路边吃了根羊肉串，竟觉得味美无比。

我有一次到她那儿，见她女儿正拿着一份《北京晚报》给她念。我一看，那是篇题为《李敏的夙愿》的文章，说了她怎样为湖南故乡建造毛主席塑像捐助了人民币3000元。

东梅读完，问她：“妈，您平常总说没钱，要省吃俭用，怎么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呢？”

她说：“就因为平常花得少，一角一分地往下省，才能攒出钱来。”又对我说：“家乡的父老乡亲，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自愿节衣缩食，铸造爸爸的巨型铜像，还要建造爸爸的诗词书法碑林，要用很多钱，我是毛泽东的女儿，怎么能不出点力，尽尽本分呢！”

最近几年，外界关于她的传说不少，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书籍和报刊上。她对此毫无兴趣，不理不睬。有好事者来对她说：

“你的名字，重名的人太多。你应该姓毛，或者姓贺，干嘛跟着江青姓李呢？”有人建议她改姓。

她听了摇摇头说：“姓名只是个代号，我叫什么，都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亲生女儿，我知足了。而且，我这名字是爸爸给起的。”

这事她对我说过。毛主席很喜欢自己战争年代叫的“李得胜”，就把自己这个姓给了两个女儿，并从孔子《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一句，各取了一个字给她们，其中含有对女儿的教导与期望。她不是沽名钓誉的人，更不想利用自己是毛主席的女儿来捞取什么。所以她从未想改姓。只是为了区别于人，有时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娇娇”的小名。

人们怀念毛主席，自然地关注着她。有一个年轻战士，慕名找到“李阿姨”，见她就庄重严肃地敬了个标

准的军礼，并且一动不动地向她挺胸站着。李敏忙请他坐下，和蔼地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那战士激动地请她看了自己的证件，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李——阿姨，我出差来北京，战友们一再叮嘱我，想办法找到您，代表大家看看您。”

李敏深情地说：“谢谢大家，你们费心了！”

那小战士又说：“我们，都只二十来岁，没有直接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但是，我们特别敬重他，崇拜他。真的，向毛主席保证！”

这句当代常用俗语，从小战士嘴里脱口而出，逗得在一旁我笑出了声，小伙子也笑了，脸更红了。李敏也受感染地笑了。那战士又说：

“我们都小，谁也没见过他老人家，也见不着了。所以，我们就想见见您，表达一下我们对他老人家的爱戴和怀念！”说着就愣愣地盯视着李敏，似乎要辨认出她脸上，哪儿保留着那一代伟人的形迹；或者要努力记住，他今天所能见到的一切。

李敏也真诚地对他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下了！我谢谢你，谢谢大家！”

老年人也用自己的方式，通过李敏来表达他们对老人家的深情。

1992年底，一位70多岁老太太，拖着病怏怏的身子，冒着数九寒风，换了三次车，费了近三个小时，找到了李敏家。

进门以后，就拉着李敏坐下来，细细地端详着她，像对自己孩子似的说：“唔，你头发长了，该剪剪了！”

李敏却感动地说：“您老身体不太好，又走这么远，真难为您了！”



△李敏和女儿与本文作者

老太太说：“就是想看看您，不见到您，心里总放不下来。”说着老人就拉着李敏的手，轻轻抚摸着，两人紧挨着，一一问着李敏生活上的事。

接着，老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什么，送给李敏，说是她孩子从外地带回来孝敬她的特产。李敏推辞不肯收，委婉地说：

“您老留着吧，我这儿什么也不缺。”

老人固执地说：“你有是你的，这是我和我全家人的心意。”她说着又看看墙上的毛主席照片，又深情地说：“我这也不全是给你个人的，你得收下！”不容李敏再推，留下礼物，像她来时一样，走了……

一代伟人毛泽东，就这样，依然活在人们——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尤其是他自己的女儿的生活和心中……

（本文由王桂苾同志提供初稿及素材，经本刊编者加工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 卢弘）

大陆“人蛇” 出洞秘闻

段问群



海警和海军人员登上台湾货轮“泰拉斯号”后，赫然发现船上竟载有128名中国“人蛇”。

(警方提供照片)

百多年前，西方世界利用已发达的航海业，以极廉价的合同骗取沿南中国海岸善良敦厚的司粤劳工，一船船地载运到马六甲海岸诸国及中美洲，种植蕉园蔗林，或生产大麻白粉，亦或沦盗沦娼……“买猪仔”的行为已变成久远的传说，遍布海外的“猪仔”的子孙们，早已用自己的血汗奇迹般的推动了当地的经济高度发展。对这段铭烙在他们先辈脊背上的历史，但愿不要再重演了。

布什总统

始料不及的“黄祸”

百年后，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布什，于1989年签署的总统政府政令：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宣称自己是政治难民，就能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乃至获准有居留权。这个极富政治偏见的政令，恰恰使一个消亡近一个世纪的“卖猪仔”行动，今称“人蛇行动”的中国劳工出国狂潮给复活了。

80年代中期国际间流传一个笑话：

美国第四十届总统里根到北京访问时，曾质问副总理邓小平说：“你们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霸道，老是不让人民自由出入国境？”

邓小平副总理不失幽默地回答说：“我是在替你们着想啊。”

里根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讷讷

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邓副总理坦然一笑地说：“问题是你们政府要得了多少？一千万，五千万，还是两亿？只要你报个数，我立刻按阁下的意思去办。”

里根听后，脸色刷白，脊骨直冒冷汗。

而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更以人权民主的政治招牌起家，总统政令继续为亚洲黑社会、以香港泰国为大本营的“人蛇行动”开了绿灯，“新猪仔”行动则更加有恃无恐了。

1992年10月，一艘载搭119名中国“人蛇”的美洲货轮，在印度洋圣诞岛附近的水域遭到澳洲水警拦截。结果，这群原本打道偷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人蛇”，全部被澳大利亚政府遣返广州。

1993年1月9日，台湾货轮“索拉斯号”在南中国海近海域发出求救信号，新加坡国家水警和海军派舰赶赴现场，登上货轮后，赫然发现船底舱竟然密封着128名中国偷渡客（即人蛇），其中24名女性，并携土制手枪24支。

1993年1月30日，巴拿马注册的货轮“伊斯特伍德号”，在夏威夷西南水域发出遭40名中国搭客劫持的求救信号，据美国海岸卫队称，这艘货轮共载有450名中国“人蛇”。

中国“人蛇”大量偷渡到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其方式及数量早已今非昔比了。

美国《时代周刊》披露：以香港为大本营



的华人黑社会组织三合会及其它有关黑帮，每年单单把中国“人蛇”偷渡到美国的收入，就高达24亿美元。

《华盛顿邮报》报道：亚洲黑社会组织估计，每年偷渡10万人到美国，华人占72%，每人收费3万美元，收入总额高达30亿美元。其中“人蛇”仅预付10%的定金，剩余部分由出国后的打工中扣除，其中大部分人将面临终身做苦役的境地。人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现象呢？

“人蛇计划” 与“黄雀行动”

人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偷渡客，而是指由偷渡集团有计划地安排的，成群结队进行大规模偷渡行为的偷渡客。

这种有组织的“人蛇计划”，始于轰动一时的“黄雀行动”。

1989年6.4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基于西方“道义”，主动向搞学运失败的中国大学生给予政治庇护。由香港的中国大陆某些组织暗中部署，以及当局执法人员的纵容，甚至在西方情报系统的秘密支持下，许多著名的大陆持异议人士，先后逃出中国大陆，投奔西方。这一行动，后来被英国广播当局拍成电视纪录片，做了全球性的发行，并命名为“黄雀行动”。而后的“人蛇计划”虽未出于政治因素，却因势蔓延开了。

这个延续百年的人生悲剧，究竟有什么值得诱惑的呢？

伊斯特伍德号“人蛇”丙，男，27岁，粤东某县中学教员，家有爱妻，二男一女，上有父母，家有一幢三楼的宅第，可称是小康了，他还发表过新诗和小说，在当地小有名气。问他为什么抛家弃职，远离故土，他讷讷一笑说：出国瞧瞧，算没白活，还能打工赚钱，公家能给这机会吗？

索拉斯号“人蛇”丁，汕头地区花县一个个体户，30岁，未婚，相了几位对象，嫌他没海外关系，一赌气，订了“人蛇”契，自己成

海外关系了，他无所谓说：“凭自己的模样，没准碰见个大二三十岁的富婆，姘上几年也是个盼头！”

“人蛇”D来自闽北一个极穷的县，村里的棒劳力全在外地打工，他背有点驼，识几行字，老婆跟外人私奔了，他恼急了，将独生女托给姐家，自己发誓到海外一定要混出个模样，将来让那对臭男女给他捶背搓脚。

“人蛇”K，人蛇中屈指可数的未婚女子，原籍川西南的一个盛产名酒的县，她与同村女伴结伙南行，在深圳、珠海当过纱工、吧女，也在一家私人开的桑那浴池替男人捏背踩腰，还风流过几回，染了性病，她看透红尘，凑足私房钱，决心下西洋，她漠漠说：“哪里能挣大钱，哪里才吸引我！”

一位年事稍长的“人蛇”甲，意味深长地点透一句说：“在中国，人走了，茶不会凉。”他是一位工程师，头顶都秃了，为定职称那几块钱的级差，绞尽了脑汁，海外的侄女婿以前是他的助手，人家现在一个月是几千马币，合上万元人民币，是他排挤侄女婿走出国门的，如今他也步其后尘了。

镜头一：索拉斯号船舱内，中国“人蛇”群，赤膊身体，蹲在舱底，一群蓝衣蓝帽的水警和军人，用华语逐个审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蛇”。这些来自新加坡的军人太都是华族，他们的祖先也曾这样飘洋过海，如今他们用冷漠的审视目光，监视“新猪仔”，斯情斯景，苦涩心肠的确难以言表。

镜头二：“人蛇”中间一位来自以销烟戒毒闻名的东莞虎门的年轻后生，他大言不惭地介绍，他爷爷的爷爷参加过林则徐的缉毒禁烟的行动，曾祖父亦因查禁贩卖猪仔有功，升为管带，如今，岸巡官的后代被“老猪仔”的后代屈尊审讯，真有点因果轮回了。

广角镜一：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闹市中的低档妓院，当地警司查获33名来自中国大陆云南省和贵州山区的非法过境的卖春妹崽，她们之中年幼者13岁，年长者仅21岁，都是由大陆与泰国一些黑社会组织欺骗卖身到此地的。

当地报馆调查,这个市红灯区近200家妓馆,中国雏妓及妓女约占35%。

广角镜二:新加坡国芽笼红灯区与阿拉丁大街附近的红灯街,其中来自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的中国姑娘,几乎是普遍的事了。她们中没有合法的护照,甚至没有任何代表国籍的证件或信物,但是,从她们那熟悉的川黔语系和淡漠的眼神,可以判断她们的身世。

广角镜三:中南美洲哥伦比亚,以盛产和贩运海洛英闻名于世的南美小国,每年非法从亚洲黑社会购得近千名亚裔劳工,其中中国“人蛇”占50%。

广角镜四:美国迈阿密一个垦殖园,以产橡胶和可可豆著称,该庄园仅从1990年至1992年就收购了400名中国“人蛇”,这样的庄园在美国已是无法统计了。

众所周知,像中国“人蛇”这样超密集的人口贩卖集团,如果没有国外势力与国外黑社会的插手,没有中国内部贪污不法官员从旁协助,集体偷渡的行为是无法实现的。在中国,偷渡行为基本属于见不得光的犯法勾当。如果没有荫蔽、别出心裁的掩饰手段,是不可能达到贩售的目的。所以,制定方案,确立计划,安排路线和严守机密,是亚洲黑社会成功的秘诀。

路线一:有关贩卖集团或黑社会组织先将中国“人蛇”安排抵达香港或台湾海域附近的岛屿,再转从港台出发到澳洲或夏威夷。到了澳洲或夏威夷后,有两个方案,一是留下来,二是再从这两个地方出发到美国西岸各州(如图所示),如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等,但主要是到加州的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大城市。

路线二:有关黑社会组织先把中国“人蛇”安排到香港或台湾,让他们转搭改装后的“货轮”,以“货物”的名义直接把他们偷渡到美国西岸去。

路线三:有关黑社会组织先安排中国“人蛇”经由陆路或空路进入泰国,再由泰国黑社会安排他们向西出发,经由印度洋到达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或再经过大西洋到美国东岸,或者向东出发,经由太平洋到美国西部。

这并非空穴来风。泰国北部一位黑帮头头马老大,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伯尔顿访问时,直言不讳地透露了他以每人2万美元的代价安排中国“人蛇”前往西方的途径。

马老大说,他派遣部下联络中国偷渡客到云南省,再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或取道缅甸,或直接沿湄公河水道南下,进入泰国。抵达曼谷后,有关组织会给他们伪造的护照和签证,按着上面的第三条途径,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去。马老大不无炫耀,他把中国“人蛇”偷渡到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成功率在80%到90%之间。

按契约合同,“人蛇”既然是在黑社会的安排下投奔“天堂”的,到了“天堂”以后,他们自然就得“知恩图报”或替黑社会经销毒品,或成为黑帮打手、刺客、或沦为娼妓、人妖。事实上,他们想不“知恩图报”也不成,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中国国门,往往只付得起十分之一的偷渡费,其他费用必须通过替黑社会工作的方式来偿还,这算是对踏入“天堂”的报效吧!一个卖身为奴的报效!

“人蛇”群体的 含金量 and 礁渣

英国剑桥大学终身名誉校长,中国科技史之父李约瑟博士,曾经精辟地揭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有时可以把地球缩小成为尘粒,有时也会将尘粒扩大成地球,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智慧就在于精辟而且神秘,让人类科学永久不衰到寂寞和孤独!”

中国近十年来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上的成就,确实创造了一大群企业上和事业上的成功之士,同时也势必空闲出另一群能力或际遇较差的人被抛弃在社会主流之外的现象。这批人,由于渴望发财心理的涌动,不愿意安于现状,于是,就设法到他们认为是充满了冒险机会的外国去谋求发展。这种情况酷似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人,不惜飘洋过海、到海外殖民地去淘金一样,将人生命运置于经济刺激这个无情的大赌盘中,旋转、拼搏,优胜劣汰,以求一逞。

市场经济学的供求定律告诉我们:凡是有

需求的地方，自然就会有供应。在“黄雀行动”中成功协助中国异议分子偷渡出境，使他们安全抵达西方国家的香港、台湾和其他黑社会势力，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庞大的“需求行动”。

与百年前贩卖“猪仔”异同的是，当代“人蛇”中进过学堂的人几乎占88%，有文化知识者亦不在少数，其中戴眼镜的人，便占六分之一，这与昔日清一色文盲加愚昧的前辈相比，已算是高文化圈了。这些人中间有医生、有工程师、有讲师、有诗人还有学过律师专业的。从工种划分，有工人、农民、学者和复员军人、有经营失败者、有失恋者、有逃婚者，还有官场失意之士等，芸芸众生。

“人蛇”B，一位学过律师专业的中年学者，爱人及子女于三年前移民美洲，他几番办出国均遭移民嫌疑而禁止探视，成为新牛郎织女，无奈之下，抛官弃位，择了偷渡这条险途。

“人蛇”乙，一位有两家大学文凭的某市夜大教员，女友嫌其位卑薪低，另嫁一位已有一房太太的外籍海员，远走高飞。出于报复，乙也参加了“人蛇”行列，去海外谋回一个公平。

知识在中国大陆已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荣耀了。因为，所有可容纳知识位置的地方已被知识者拥塞得异味十足，有博士的地方谁还稀罕硕士，有大学生的单位更不会青睐中学生，知识一但滞销，比什么货物都难找到婆家。

偷渡客行为不分高下优劣，金钱底下人人平等，“人蛇”S是少数几位文盲加法盲，他在家乡大埔是做挖河泥工的，大字不识，但很有经济头脑，他带了许多不惹眼的小咸菜，船一上了公海，不少人晕船呕吐，S君的小咸菜就颇具疗效了。他切成无数小块，然后，高价兜售，奇货可居嘛！不少晕船者花大价钱买来止吐，还真灵。S君说到目的地后，他会选择开饭馆，他会三十几种烹鱼手法。

人蛇007号，身材魁梧，语气凶狠，他曾是大陆西北某省蹲过大狱的假释犯，据说有人命案，他也不避讳，称能出了国就算拾回条命，

谁要有本事惹恼了他，他也不畏惧外国监狱的滋味，闹好了与泰森关一起，还真他妈够世界级冠军呢。

人蛇085号，别看他五短身材，人又瘦干，但他是五省著名的神偷惯犯。他说：有机会到海外施展才华，也算为国争光嘛！

人蛇N，是逃婚的女高中生，她爸要她嫁给当地一位乡长的傻儿子，那是位能把自己拉的屎吃个精光的双料傻蛋。她悄悄打开爸的柜橱，偷走男家的聘金，正赶上人贩子，一赌气下海出洋了。

在人蛇中间还有两位精神病患者，那是家里人垫钱给逐出来的，在底舱整天高呼低号，真令人心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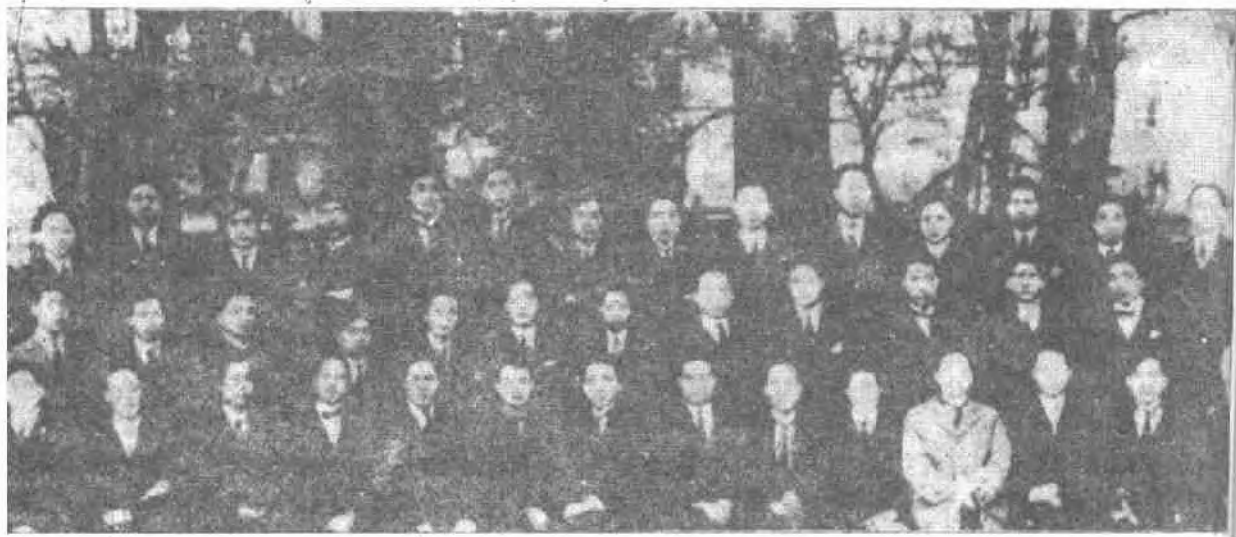
人蛇Z曾是某县的警员，因一桩经济案放了案犯，被除名，案犯家属私下给他操办了这条出国的买路钱，人蛇007与他是同乡，可谓是冤家路窄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私贩“人蛇”这样庞大一笔收入，自然会驱使黑社会鬼使神差，全力以赴，更何况，干这一行偏门行业的风险性，要比走私海洛英小得实在太多了。对此，美国移民局东南亚司一名官员有一段精辟的评论：“这种做法的盈利和走私海洛英相差无几，但面对的刑罚却轻得多了。这给他们带来了好几十亿既‘人道’又‘干净’的美元，没有人会在这种交易中蒙受损失。因为，美国政府执行的总统政令对中国‘人蛇’既不处罚也不会遣返回国，只要有办法登陆，就能够永久在美国居留。”

“人蛇”或“猪仔”都是外族一直视中国人为抽象意义上的“黄祸”为梦魇的西方国家，居然会伸出橄榄枝，并自鸣其乐地给予政治难民地位，只能说这是历史的诡异罢了。也许100年后，中国人仍会以其他方式迁徙他国，但是，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何方何土，都不应忘却中华民族世代相依的这个古老而永恒的根脉，那时也许会是一位能使华人真正繁荣昌盛的新大陆呢！中国人是不应忘记自己民族的尊严啊！（责任编辑：刘家驹）

“老托派”郑超麟 坎坷一生

● 靳树鹏



△1922年，在巴黎召开的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合影。第一排左2赵世炎，左四郑超麟，左六陈乔年，左八陈延年，左11王若飞，后排左10周恩来。

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现在仍坚持托派观点

在健在的人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是罗章龙，第二个就是郑超麟。郑超麟与周恩来等人于1922年在法国共同创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在苏联正式入党，李大钊参加了他的入党仪式。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录员，罗章龙是正式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人说，郑超麟是中共的大人物之一，除了资格之外，大概因为他是党内“才子”之一。

他后来同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但不是去当什么奸细、间谍，而是他不同意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反对斯大林主义坚信托洛茨基主义。在他的词典上不是“马恩列斯”，而是“马恩列托”。他至今在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以此为荣。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上海关押郑超麟他们的那座监狱里，也出现了类似社会上红卫兵一类的组织，也举行了斗争会，头一个被批斗的犯人自然就是郑超麟。

1966年10月24日，举行了对郑超麟的第一次斗争会，到会的有30

多人。郑超麟宣读发言稿：“托派并非反革命，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陈独秀不是反革命，我本人不是反革命，所有托派犯人都不是反革命……”数语一出，会场就开了锅，他被拖到中间，按跪在地上，连骂带打，拉耳朵，抓面皮，要他收回这几句话。

“郑超麟，你敢说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

“托洛茨基不是反革命。”

“毛主席说过托洛茨基是反革命。”

“毛主席没有说托洛茨基是反革命。”

他们翻阅《毛主席语录》，没有找到什么枪炮子弹，又翻阅《毛泽东选

集》，终于在第一卷152页注释[30]中找到斯大林说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侦探间谍，是工人阶级死敌那番话，这当然是重型炸弹，于是对郑超麟的斗争升级。

郑超麟答辩说：“这段文字是注释，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话。”

于是他们再翻阅《毛泽东选集》一卷到四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没有找出毛主席自己说过托洛茨基是反革命的话。

后来又对郑超麟斗争了两三天，再后来减少人数，不用暴力，在长桌旁又口舌斗争了他三五天，他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签字按了手印，才停止对他的斗争。

1990年5月1日，郑超麟在未发表的《九十自述》一文中写道：“70年前，当我20岁左右时候，各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名为共产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没有改名而坚持原来的立场）；去年以至今年，我们则看到相反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自然也有一部份未改名，而保持原来的立场）；70年前发生了一种过程，今天70年后则发生相反的过程。这表示什么？一般人，这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表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破产罢了。”

他的确够顽固的，始终对斯大林主义不以为然。他三年前对笔者说：“陈独秀最可贵的是从列宁主义前进到托洛茨基主义。”其实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主义一开始就有保留，到晚年既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也不相信托洛茨基主义。

郑超麟已90多岁高龄，唯一的儿子7岁病逝，至爱的夫人先他而去，只剩下孤苦零仃、腰弓目障一老叟。早年奔走革命出生入死的艰险生活，不曾损害他的筋骨体魄；长期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生活，无论国民党

的监狱还是共产党的铁窗，无论刑讯审问还是精神折磨，都不曾改变他的信仰。你可以不赞成他的信仰，但不能不佩服他的意志。至今他毫不暮气颓唐，每天孜孜以求，读书写作。他已一无所有，还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这是他超乎常人之处。

才识不凡，见过大世界

郑超麟是旧家子弟，少时即读四书五经（但当时没读过《礼记》），酷爱龚自珍的诗文，且偏好老庄。他的旧学根底自不待言，对马、恩、列、斯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更认真研究过。他爱读史，对世界史和中国史都有所研究。他精通英、法、俄、德四种外语，案头翻译落笔成章，他还懂世界语。他还研究语法学、音韵学，并长于诗词。他是现代中国有才华和学识的人物之一，他还是本世纪历史活见证人。羊牧之赠他的诗说：“此老人间能有几，沧桑阅尽四朝中”。1991年《人民日报》上有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是“活的百科全书”。

郑超麟一生曾与之谋面相识或交游共事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声名赫赫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或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陈乔年、刘少奇、罗章龙、罗亦农、项英、潘汉年、彭述之、恽代英、张太雷、向警予、杨之华、邓颖超、邓小平、陆定一、聂荣臻等等。他写道：“五次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对其他领袖人物，他都有较深的交往或较多的了解。

他曾亲见过列宁的死，参加了列

宁的葬礼。他见过红场阅兵台上斯大林等要人。他聆听过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查斯基、季诺维也夫和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等人演说。他认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人物维经斯基、鲁易、罗明纳兹、米夫等等，当然也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权重一时的鲍罗廷。

在国民党方面，他见过蒋介石、汪精卫、徐谦、孙科，更不要说曾参加过共产党的邵力子。就是国民党元老，他也见过几位，如朱执信、林森。他1919年去法国时，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曾在漳州旧道台衙门欢送他们。

他与文学界的沈雁冰（茅盾）、蒋光赤、王独清很有交往。党还派他指导联系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他也认识创造社中的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李民治（即李一氓）、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生诸人。

他一生经历过的大事件史有所载。

1922年在法国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个发起人之一。赵世炎是“少共”总书记，陈延年、李维汉、周恩来也是领导人。

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带领他们十几个人从巴黎北站出发去柏林，再从柏林去苏联，周恩来从法国回德国，与他们同行。“忆昔来游正少年”，“人物风流胜神仙”，他怎么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呢？他们从巴黎到柏林途中在科伦换车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在柏林办理去苏联护照期间，周恩来曾充任导游，带他们游览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和名胜古迹，并去了一次波茨坦，当然也要领他们去吃中国菜。他们从柏林走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入苏联境。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有一颗红星。他们读书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又称斯大林大学，在莫斯科，他们曾
在自己的寝室欢迎孙中山派往苏联
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
团。

他们是到苏联留学，绝不是为了
取得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走上
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
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
血，是牺牲。”

1924年，他们回到上海，正是中
国革命的一个高潮即将到来之时。

郑超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
部任秘书，负责撰写、翻译、编辑、出
版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及各种书籍。他
忘不了慕尔鸣路一个弄堂里的房子，
那是宣传部办公的地方。这幢房子两
楼两底，厢房沿马路有一个过街楼，
当时瞿秋白、蔡和森和夫人向警予，
李立三和夫人李一纯，彭述之，张太
雷的家属，都住在这里。楼上厢房空
着，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桌子旁边几
把不整齐的椅子，有一张空床是留给
郑超麟的。那张大方桌子他工作用，
全楼会客也用，也是中央主席团开会
的会议桌。开中央主席团会议，陈独
秀来了，王荷波来了，林育南来了，蔡
和森从客堂楼侧门走出来，彭述之从
过街楼走出来。这是郑超麟第一次见
陈独秀，时在1924年秋他刚回国不
久。

1919年11月4日，郑超麟他们
30几个福建学生从香港登上法国邮
船保罗·列嘉号。他在船上第一次看
到《新青年》杂志，翻开的第一篇文
章是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写的《宪法与
孔教》，文中说，“‘孔教’本失灵之
偶像，过去之化石”，对之“不可不有
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
不流，不止不行”！郑超麟从小读圣贤
之书，同意康有为提出的定孔教为国
教的主张，中学时也写过这类作文，
故对陈独秀的主张非常反感。他在船
上第一次写日记，这天写了一篇很长
的日记，大骂陈独秀。船行33天，他

们于12月7日在马赛登陆，他的思
想却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大变化，从大
骂陈独秀到崇拜陈独秀，这就是他在
法国邮船上经过的他自己的“五四运
动”。把陈独秀奉为导师。现在自己竟
在他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他经历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和上
海第二次、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
不是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却是积极参
加者，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缚虎擒龙
非我事，枪林弹雨旧曾经”。后来他参
加了党的四大、五大和著名的“八
七”会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天早晨，屠杀
革命者的枪声使睡在横浜桥宣传部
机关里的郑超麟惊醒。汪精卫“7·
15”武汉反共时，郑超麟又恰在武汉。
他虽然都幸免于难，没有成为烈士，
却耳闻目睹了白色恐怖，“工农处处，
血花飘洒”。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二
七”大罢工以来死难的烈士，特别是
与他很亲密或他认识知道的人，寄托
了他的哀思，表示了他的愤慨。

他1924年从苏联回国，路上20
来天，走了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也游
览了世界上最冷的城市伊尔库茨克。
但是，他的游历毕竟有限。在中国，除
了武汉三镇的汉口外，他从未到过长
江以北，更不要说北京。他1919年去
法国辞别父兄遂成永诀，再也没有回
过乡井。他一生中33年被监禁。现在
他自由了，却已是90老翁，又怎么走
得动呢。

他为革命做出过贡 献，但又成为革命的 “罪人”

郑超麟自称是一个不爱出头露
角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
人物。他为革命做的工作都普普通
通，或者说都实实在在。当年与他接
触较多的人，都认为他有见解，工作

最勤奋，更敬佩他对人对事一丝不苟
的态度。他能演讲但不善演讲，却长
于撰述和翻译。他在莫斯科时，就有
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上
发表，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论辩证
法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他回国后参加
了《向导》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也写文章或翻译文章在《向导》、《新
青年》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他亲
见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写了一篇
此次惨案的纪实文字发表在《向导》
上，这可能是难得的真实记载这一事
件的第一手史料之一。后来他实际
上成了《向导》的执行主编，在三年时
间里，除了一次例外，都是他以记者
名义回答读者来信，没有一期《向
导》不是他亲自校对。再后来他是党
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主编，
或称编辑主任，刊名也是他拟的。他
在这两个刊物上都写了不少文章。

他参加上海区委（即管辖江苏、
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党组织），是七名
区委委员之一，做过湖北省委宣传
部长和代理湖北省委书记，出任中央
出版局局长，还做过中央特派员赴福
建整理党务。他翻译不少革命著作，
如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农
民问题》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
论》。他还在培养革命骨干的上海大
学讲授社会学（即历史唯物论）。

郑超麟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
贡献，是他在国内首先翻译了《共产
主义ABC》一书。1919年3月，俄共
（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无产阶级执政后的第一个党纲。布哈
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了向广大
党员和群众宣传解释新党纲，进行系
统的共产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由于作
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论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道理，并
对民主与专政、民族、宗教、军事、
法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组织、
银行、货币、国家财政等作了理论上的

分析和论证,总之,因为它内容广博,通俗易懂,出版后备受欢迎。列宁认为这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据记载,至三十年代初,它的俄文版至少印了18次,另外还有20多种外文版,被奉为“共产主义宣传的范本”。这本书直译可为《共产主义入门》或《俄国共产党纲领简释》。郑超麟大胆地把俄文本和各种文本所有的绪言和党纲本身都删去,只保留解释党纲的文字,并把书名译为《共产主义ABC》。这本书一出版,立即成为中国那几年二三种最畅销书之一。可以这样说,当时的革命者,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有觉悟又有一定文化的工农群众,都读过或知道这本书。它对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奇怪的是:笔者案头有一部《中共党史简明词典》,其人物编中共收有900多个人物,但没有郑超麟的名字。这部词典的报刊编中,收有《向导》和《布尔塞维克》(该词典作《布尔什维克》)两个条目,但解释的文字中也没有郑超麟的名字。笔者案头还有一本《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收有《共产主义ABC》这个条目,但不写谁是中文译者,当然也没有郑超麟的名字。当时郑超麟自己有一个原则,自己翻译的书在党中央出版机构出版的,一律不支取翻译稿费,也不署姓名。后代人是看不到“译者郑超麟”这样的物证,但此书是谁翻译的,党内上层都知道,并不难调查。笔者案头还有一本《中国共产党大事典》,干脆就没有《布尔塞维克》这个条目,《布尔塞维克》纪念馆天天在上海开放,大事典里连几行字也没留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郑超麟是托派,而且是中国托派常委,是宣传部长,是个首领。

托派一直担着恶名,无论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斯大林曾说:“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

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所以,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了“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四案,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被枪决。《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152页注释[30]写道:“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这些注释文字是根据王明和康生诬栽中国托派的文章撰写的。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就大反托派。王明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疾言厉色地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在王明、康生的心目中,托派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切敌人中最十恶不赦的一类。

但是,这些恶名是不该加在托派身上的。据1988年8月4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已决定为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四大错案平反,指出所谓的这四个组织都是不存在的。对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并为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我国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168页注释[33],把前引那条注释中关于中国托派的文字改写为:“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

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516页注释[9]又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比较新注释和旧注释,变化很大,旧注释加在托派身上的罪名,在新注释中都没有了。新注释说的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有罪无罪问题。因此,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无论是苏联托派还是中国托派,过去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恶名都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托派也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背景下产生的,最早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1923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苏联党内发生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派的大辩论,从中央到基层到党员都分成两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时把托洛茨基论述中国大革命的文章带回来,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六大路线一部分人赞赏。这些人,无论是从苏联回来的,还是原在国内的,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被党发觉后又置党的劝说和警告于不顾,终于被开除出党。他们后来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公开打出托洛茨基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世界各国托派的命运可能都不好,中国托派就更糟。中国托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中共六大路线,理所当然的被国民党认为是共产党一翼。中国托派召开统一大会后不久,其中中央机关就惨遭破坏,



一九九〇年四月，本文作者在上海会见郑超麟

捕，但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是国民党逮捕他，这次是共产党逮捕他，而且被监禁达27年之久。他们这一案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被判15年、12年、10年、5年、2年有期徒刑。但对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曾猛5人却始终未起诉，也未判决。

他记述过我党一批
领导人物青年时代的恋
爱，他和刘静贞是一对
苦命鸳鸯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卷首的《自序》中写道：“《恋爱与政治》一章，本拟删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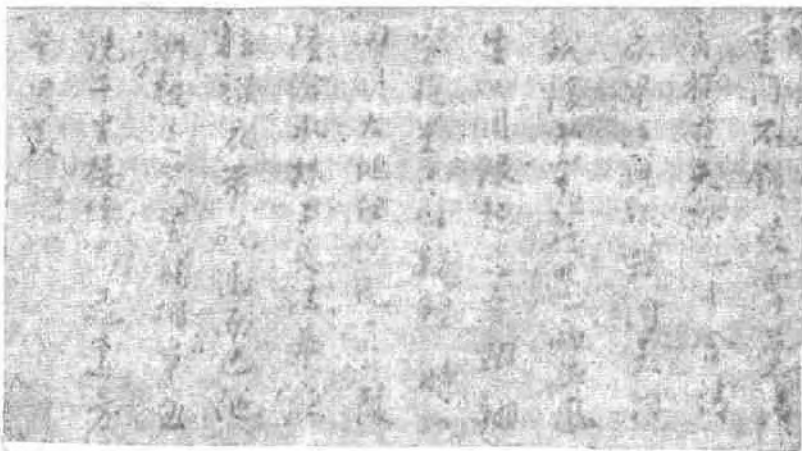
后来连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除陈独秀外，几乎所有托派人物都不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郑超麟更是以极左的面貌反对这一政策。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该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拥护。郑超麟却提出这些极其错误的

主张。
1952年12月22日，一夜之间，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在大陆的托派全部逮捕。郑超麟从青年时代起投身于中国革命，也为这个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又成了这个革命的“罪犯”。

郑超麟一生三次被捕。

第一次是在1929年3月18日，郑超麟与夫人刘静贞同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何资深的夫人张以森住在一起，国民党是来抓张以森的，郑超



△楼适夷书郑超麟作的《齐天乐》

麟夫妇也同时被捕去，关押40天左右被保释。这时郑超麟和刘静贞都是中共党员。

第二次是在1931年5月21日，他已是中国托派常委和宣传部长。这次共捕去十数人，他的夫人刘静贞亦在内。因郑超麟是托派首领，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陈独秀住址，成了此案的首犯。虽经蔡元培、于右任先后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杨虎写信保释，也未能奏效，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并释放政治犯后，郑超麟才于1937年8月29日出狱，被关押6年多。

他1952年12月这次被捕，即第三次被捕，他的夫人刘静贞也随即被

为其中颇似上海小报上的桃色新闻，难免被人斥为无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掺杂其间。我认为在‘不妨害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容许的。这一章中所写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牺牲者，存者之中也许有几个现在做了gentleman或lady，他们也许以我写出他们少年时期的恋爱为有意诽谤。这里，我只好向他们道歉。若是没有联带关系，可以避免不写的，我都不写了。读者请勿忘记，我也是其所写恋爱者当中一个人。现在同当初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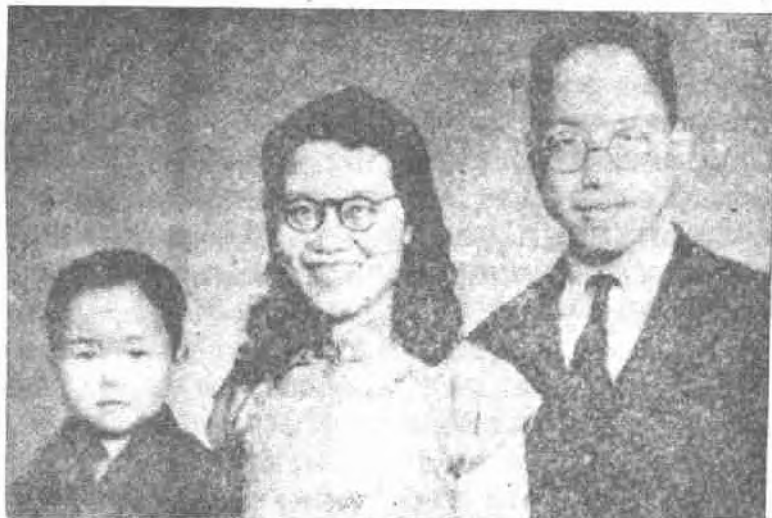
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是没有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的。”

国内刊行的《郑超麟回忆录》中并没有这一章，是经作者本人同意由编者删掉了。1991年法兰克福ISP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郑超麟回忆录》，却保留了《恋爱与政治》这一章。

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是值得赞美的。他们有的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有的毁家纾难资助革命，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革命，他们都勇于献身，义无反顾。他们那时的生活和斗争紧张激烈，艰苦卓绝，随时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可革命者之间的爱情还是那样强烈，那样纯真，那样炽热。这些恋爱故事，其中有的就是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也够罗曼蒂克的。他们那时的恋爱观以及解决恋爱纠纷的方式，有些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比如自己的爱人抛弃了自己，与自己的同志同居相爱了，怎么办？那时在革命者中行“倒戈”之风，多是女的抛弃男的，也有个别的是男的抛弃女的。革命者之间的恋爱纠纷和风波是不少的，有的还是很大的风波。再比如，都是在知名的人物之间，出现了事实上的第三者，怎么办？结果提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当事人都在场，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地各自阐明自己的意见，最后由陈独秀裁定。这是现在的读者能够想象的吗？

他们那时的斗争生活极不稳定，他们的恋爱自然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在郑超麟记述过的20多位男女主角中，也不乏伉俪情深者，如瞿秋白与杨之华，施存统与钟复光（即施光南父母），可是男主角都过早牺牲了。郑超麟和他的夫人刘静贞相爱得最长久，从青年到晚年，老而弥坚，可他们又确实确实是一对苦命鸳鸯。

二十年代上海一张小报登过郑超麟的“风流韵事”：郑超麟和蒋光赤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蒋光赤的爱人



△郑超麟全家摄于1942年秋



△刘静贞摄于1937年

被郑超麟夺去，蒋光赤在会议上请求组织决定让郑超麟把爱人还给他，但郑超麟不肯还，两个吵起来，结果陈独秀因为郑超麟工作努力便把这爱人判定归郑超麟了。这个故事纯粹是胡编乱造，不但郑超麟和蒋光赤不是中央委员，而且郑超麟也没见过蒋光赤的爱人，根本不存在爱而夺之的事。蒋光赤曾把这张小报拿来给郑超麟看，看后他俩捧腹大笑。

头一个给郑超麟介绍对象的是蔡和森，那是宣传部机关在福生路的时候。大概因为郑超麟勇气不足，讲

攻得不够猛烈，而没有成功。

郑超麟与刘静贞结合的红媒是王若飞。

大革命失败后，郑超麟同瞿秋白一道随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上海。瞿秋白叫郑超麟在上海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将中央机关搬往广州，拟任郑超麟为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租下一幢小洋房可作为永久性的联络机关。郑超麟租到了兆丰花园东愚园路弄堂式洋房。后来中央没有迁往广州，这房子作了党报编辑部和宣传部。现在这个房子已对外开放，供人参观，即《布尔塞维克》纪念馆。

1927年11月间，王若飞来到宣传部，拉着郑超麟去聚丰园吃晚饭，原来是一对同志结婚。郑超麟是认识新娘的，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他们是第一次见面。陪同新娘来的有一位女宾，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短发、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却带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吃饭时，郑超麟较少注意新娘，而是更多地注意这位女宾。饭后，郑超麟找到王若飞，询问这位女宾之种种。王若飞哈哈大笑说：“我今天是有意让你和她见面的，因为她

对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同你的差不多。”

这位女宾就是刘静贞，云南昆明人，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加入托派。

郑超麟同刘静贞相识交往了。他觉得两个人是在进行一场斗争。刘静贞并不拒绝同郑超麟见面，但总装成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心意，表现得与其他人见面毫无两样。有时两人谈话正投机时，她会突然说，准备回云南了，可是过了一会，她又说了别的话，有了别样的表示。只有郑超麟去她家，她从来不去郑超麟的家。总之，郑超麟一会失望，一会有望，在患得患失中同她“斗争”了一个多月。

1927年12月24日是圣诞节，郑超麟备了一桌酒席摆在愚园路的房子里，请来的客人陈独秀、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罗亦农和夫人李哲时，王若飞，还有别的人。郑超麟当然想请刘静贞，但没敢请，知道她会推辞的。王若飞设了计，就走去对刘静贞说：“你不是想见老头子一面吗？今晚正有机会，我带你去见他。”这里说的老头子是指陈独秀，刘静贞自然高高高兴兴跟着王若飞来了。进了门，她才知道这是郑超麟的住处。这是一些知名的男女，酒筵当然是风雅欢快的。这天晚上，刘静贞第一次让郑超麟送她回家。他们从兆丰花园步行至静安寺，再坐车至圣母院路福煦路口。圣诞筵就是他们的定情筵，这天夜晚他们互诉了衷曲。郑超麟老来在狱中，填了一首《河传》，就是记这一晚的。其词为：

“圣诞，朋筵，画楼小苑。一老群贤，灯辉室暖。席上谈笑生风，气如虹。 萼华初探羊权舍，将闹夜，共步塘光下。妙龄少女，转瞬王母瑶池，鬓成丝。”

第二年清明节前后，他们结合为夫妻。

郑超麟与刘静贞第一次被捕，虽

然在狱中只40几天，但刘静贞得了肺炎，再晚保释几天，她将死在狱中。

他们第二次被捕，一个多月后刘静贞被释放，在狱外苦苦等了6年。

他们第三次被捕，刘静贞被关押将近5年才获释。她这次竟在高墙外等待他，守护他，为他奔走20年之久。这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她鬓发斑白，骨瘦如柴。1979年郑超麟获得自由后才几个月，刘静贞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郑超麟的悲痛又怎能用语言来形容！从他们结婚到刘静贞逝世共52个寒暑，他们爱得生生死死，刻骨铭心，但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仅仅26年。

他已是93岁老翁， 现只能在斗室里奋力写作

大概两年前，笔者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出厅里，见过一张放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第一排有郑超麟。他那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满面春风，和蔼可亲。笔者后来又见过他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几张照片，每一张都是那样笑容可掬。是的，不少人都说他谦虚和蔼，笔者见着他，确实是一个十分谦和的长者。许多人说他知识渊博，得到党内诸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赏识和重用。不错，他少年时就酷爱读书，他个人收藏的旧小说之多，在他们福建省漳平县堪称第一，同学们戏称他为“教授”。人们还说他记忆力极好，思路敏捷。笔者见到他时却已是一个90衰翁，但谈锋犀利，长谈几小时用语依然准确，并十分注意分寸，且记忆力惊人。他叙述起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和了解的人物时如数家珍，他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很关心，他对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更是

一清二楚。笔者拜读过他近来撰写的两篇长文，不仅逻辑性强，还引了不少典籍诗文，可他已经几乎没有阅读能力。他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头几年脸贴在书信上还能勉强阅读，近来离开放大镜已经不能阅读。他的侄孙女郑小芳每天下班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当天友人的来信读给他听。他如何能把那么多的典籍和诗文引在自己的文章中呢？我想主要是靠他的记忆，只有个别的才借助放大镜去查对一下。他青壮年时定能过目成诵。

郑超麟他们第二次被捕后，在监狱里，他应青年同志的要求每天给他们讲述一段共产主义理论。这里当然没有参考材料，也无须备课，只凭他的记忆去讲，但反映好。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郑超麟和何资深两人要被打靶。但他们很镇静，完全没当一回事。一天，只把郑超麟一个人提出去照相。大家都知道，照了相后两三天就枪毙，无一例外。可郑超麟却像一个得道高僧，每天照样讲课，照样下棋，照样谈笑风生，他的风度感染了大多数难友。不知为什么，郑超麟照了相竟没有被杀。

后来郑超麟和何资深二人被押赴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南京监狱给了郑超麟一个机会，使他翻译了多部世界文学名著。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是个好心人，从军政部要来翻译《德国军事法典》的美差，交给郑超麟、潘梓年、楼适夷等五六个犯人来翻译。他们每天坐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里，可以读读写写，狱外的各种书籍也可以送进来。但真正的译者只有郑超麟一人，当时潘梓年和楼适夷只粗通德文。他非常勤快，不断地读书，不断地译书，在完成交下来的任务同时，还翻译了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的《诸神复活》等等。笔者见过三四十年代的一本书上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介绍绮纹（这是郑超麟翻译文学作品的笔名）

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广告，共有八九部之多。其中的《诸神复活》(上、下两册)，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又重新出版。如果不是在监狱中，他是不会有这么多的闲暇时间翻译文学作品的。

郑超麟是非常勤奋的，老而不辍。但现在，他已不能自己读书，主要是靠别人给他读。至于写，也只是拿着笔在纸上描画，他已看不见都写了些什么。有时钢笔没水了，他以为写上了；有时把下一行字又重叠地写到头一行字上；两个字的一个词语他可能把后一个字写在离头一个字很远的地方。就是这样他也不用别人替他写，连与他相依为命的侄孙女也不用，文章自己写，写出精彩的文章和书信。只是他的文章需请认得他字的人抄清后才能送去发表。

1952年底被捕后，主要是独居囚室思考，1964年以后又允许他们发表议论和公开著书。他写了一本批判斯大林政制的《干部主义论》；写了一本《狱中读毛泽东选集》，还写了一本书批判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此外还有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四部中短篇小说译稿和若干学术著作译稿。他是坐在地下翻译写作，这样长年累月下来，他的腰已直不起来，一个身高1.70左右的人，现在已很难断定他准确的身高。1968年监狱军管以后，他的这些手稿统统被军代表抄去，并被军代表下令全部焚烧。当然也有劫后余烬，即那八卷四百多首旧体诗词，经他十几年的追忆才忆起84首，不足原来的五分之一，这些余烬于198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玉尹残集》。

他们这一案的重刑犯人坐满20年牢之后，有关部门决定把他们放出来，严密管制。此消息一出，不少人提出抗议，说托派犯人不能释放。据说，周恩来曾出面传达毛主席的话，向干部解释，大意是：托派杜畏之在狱中检举陈伯达是托派，这是立了功，为什么还要监禁呢？托派郑超麟至今不认罪，再关下去他也不会认罪，还是释放出去的好。至于这批托派释放后，再搞反革命，那很简单，抓回来就是了。他们终于得以释放出狱，监外管制。

郑超麟毕竟不是普通犯人，比如曾特准他吃营养伙食，还曾单为他订一份《解放日报》，还可以购买书籍。他1972年9月28日出狱后，被送往上海南汇县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80元生活费，比该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的妻子刘静贞也获准搬来与他同住。他们住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准出门。他1979年6月5日获得公民权时开了个会，并请他们这一案的人到南京和苏州参观旅游，郑超麟因刘静贞有病未参加。回来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靖任秋还在衡山饭店请他们喝酒，不久给他分了一套新居。

郑超麟先生获得公民权后，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托派立场，仍被邀请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些年来如果较多地注意他对改革开放的形势充满希望，而不是较多地注意他没有改变政治立场，交给他一些研究课题，特别是再能给他配几个助手，他会做出更多的成绩，他的日常生活也能有人予以关照。既然没能如此，他只好一个人在斗室里默默求索，当然也写了

不少文章，写了书，写出的书信也有一部分值得发表和保存，一共大约有80万字，现在只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党史研究者，撰写中国共产党诞生史的作家，电影《开天辟地》的编导者和主演，电视剧《秋白之死》的编剧，当然也有党内著名人物的子女等人来拜访他。但这些毕竟是很有限的。他的侄孙女参加工作之后，他经常是一个人在房子里扶着墙壁，摸着桌角倒水喝、上厕所、找东西。他并不富有，就是他雇得起保姆，家中也不方便为保姆安床。他已九十多岁，说来病就来病。去年他心脏病突然发作，他以为大限已到，但终于抢救过来。1993年元旦前他来信说：“我近日不仅视力下降，记忆力也衰退，做事颠三倒四，恐将不久于人世。1993年元旦不远，是可以看到的；1994年元旦就不知道了。”除了他侄孙女外，是一些好心的邻居帮助他读书读报，抄清他的文章，帮助他看病，照顾他生活，以及帮他热一下每日必有的简单午饭。这多少让人感到悲凉。

郑超麟先生书房兼卧室的墙上挂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苏渊雷先生亲作亲书的七律一首，就引此结束本文吧。

玉尹残编把诵频，
天荆地棘一起麟。
ABC读少年老，
丁字碑传客泪新。
孤愤酸情谁得遣？
童乌病妇世难春。
彭陈不作声名在，
硕果犹存偃蹇身。

(责任编辑：刘家驹)

启事

本刊第6期25页胡乔木同志照片，由于人民教育印刷厂照排车间严重失误，错制成阴图，为本刊声誉带来影响，谨向胡乔木同志家属和读者致歉。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

一桩历史谜案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 尹琪

1939年的春天。

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央为了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在敌后搜集战略情报的任务。

过去中共在战略性情报搜集上渠道窄，层次低，如若不在较高的层次上开辟情报来源，便很难有新的突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汉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敌后去负起这一重任。

潘汉年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作家。1926年加入中共后，曾致力于左翼文学运动，在组织和领导整个左翼文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十年代初，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他担任了党的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领导职务。三十年代中期，他代表中共先后和福建人民政府、和陈济棠、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一系列谈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在上海和香港又继续做抗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8年秋天他奉命回延安参加扩大的六中全会，会后就被留在延安参加中社部的领导工作。由潘汉年到敌后第一线去指导情报工作，无疑是很合适的。

1939年5月，潘汉年往西安、重庆、辗转到达香港。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对于潘汉年再次来港工作，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俩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这段时间，在香港和广州已有过愉快的共事经历。廖承志比潘汉年小两岁，但他对这位经验丰富热情诚恳的老同志有着兄长般的敬意。潘汉年对廖承志也很有好感，觉得他充满活力、性格开朗、为人坦率，因而也很愿意和他再度合作共事。

当时的香港，实际上已成了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情报战场。英、美、苏、日等国都有情报人员在这里活动。各国驻港的领事机构无疑也负有搜集情报的任务。国民党原中统军统在这里都设有情报机构。

抗战开始后，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情报工作便主要依托在办事处的机构内，由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潘汉年到达香港时，这个班子由李少石负责，成员有连贯、柯麟等。

会见廖承志之后，潘汉年开始通盘考虑整理和建立情报网络。8月，延安来电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同时决定建立华南情报分局，责成潘汉年负责组建这一机构，并统一指导整个华南地区的敌后情报工作。

经过和廖承志磋商，并报经中社部批准后，潘汉年在华南情报分局本部建立了一个核心情报工作班子，并从南方局调来了张唯一实际主持工作。张唯一处长人称“老太爷”，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同志，作风稳健，经验丰富，深得众望。在他的属下，又先后调集了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简竹坚、张建良等一批情报干部，分别负责搜集交通、电讯等情报资料，其中张建良的情况最具传奇性，他原名华克之，1935年曾因秘密组织刺杀汪精卫的活动而受世人注目。他那时只是一个爱国热血青年，并无特殊政治背景。后来又与著名杀手王亚樵合作谋杀蒋介石未成而遭通缉。抗战后一度赴延安，后又辗转回到香港。几经曲折后被潘汉年吸收为秘密党员，专事情报工作，成了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的一个得力助手。

除分局所属张唯一和“八办”所属李少石这两处重要情报据点外，潘汉年又进一步沟通并加强了同东北抗联驻香港办事处以及苏联在港的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抗联在港办事处负责情报工作的董麟阁，为苏驻港情报

机构工作的朱明、金仲华、邵宗汉等，原来都是潘汉年所熟悉的，有的则是过去的情报关系。现在通过潘汉年的协调与指导，使各情报点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情报网络。

潘汉年还和国民党某些派系在港的机构或代表联系。例如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幕僚、孔在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胡鄂公，在三十年代就曾为中共的情报机构工作过，和潘汉年有过合作的经历。抗战后他虽然已为孔祥熙服务了，但也并未与中共反目。反而主动表示要和潘汉年建立“私人”联系，愿意向潘提供一些他所搜集和掌握的情报。

二

在对香港的情报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之后，潘汉年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上海。因上海是当时敌后的最大据点，是一个更具有吸引力和更需要投入的情报战场。“八·一三”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绝大部分地区，但英、美、法等国仍保留有几片租界地。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在这里仍然很活跃。日本在上海建立有庞大的情报和特工机构，包括日军大本营派驻的所谓“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的由外务省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还有汪伪政权所建立的“特工总部”。国民党政府的两大特工情报系统在进行大规模的情报活动。中共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当时主要由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撤退时留下的一部分情报干部在开展。因此，潘汉年亲赴上海，是着手加强和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

离港前，潘汉年接待了一位神秘的来访者。此人名叫袁殊（又名曾达斋），在当时的情报战线上是一位极其特殊、以致被认为是深不可测的人物。他在大革命时代曾热衷于搞无政府主义。后去日本留学接受了左翼影响，三十年代初回国后便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和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都很熟悉。后又参加中共的情报工作和第三国际远东情报机构活动。他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情报机构也有联系。1935年他被国民党军统逮捕，随后就自首转而成了军统人员。1936年，军统知道他和日本情报系统有过关系，便让他再赴日本，和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恢复联系。抗战前夕的1937年春天，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时，曾找到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潘汉年，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批重要的情报资料交给中共，并表示今后愿意为革命效力。潘汉年深知袁殊的特殊作用，便接受了他的要求，指示他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实际行动弥补在历史上的错误。抗战开始后，袁殊继续留在上海，一面参加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一面继续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系统保持联系。在此期间，他因执

行军统的某项任务被汪伪的“特工总部”逮捕，但很快就又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保释出去，并让他正式加入日本总领事馆以“岩井公馆”命名的情报机构工作。但他没有脱离军统，仍在继续为军统服务。1939年8、9月间，他应召到香港参加由戴笠主持的工作会议。在这里，他打听到潘汉年已从延安来到香港，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潘汉年。

袁殊在会见潘汉年时诚恳表示，前一段时间他和中共虽没有联系，但并未忘记当初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指示。现在联系上了，希望中共方面能继续让他参加革命工作，为抗战效力。潘汉年对袁说：“你要求为革命工作，我们欢迎。你目前的处境，也不必改变。外人的议论和舆论的抨击，也不必介意。历史自会有公正的评价。你现在先回上海再进一步了解些情况，我不久将去上海，到时候我们再研究确定你的具体工作问题。”

会见袁殊后，潘汉年便积极考虑如何利用袁殊在日本人的情报机关内建立内线，并由此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步险棋；日本人会采取怎样的反措施，袁殊能否完全经受住考验，这些都是未知数。一旦事与愿违，后果就不堪设想。但如果不利用这条内线情报工作，就不可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1939年9月，潘汉年秘密到达了上海。一天晚上，潘汉年按约在百老汇大厦和袁殊见了面。袁殊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目前仍在扩充力量加强情报搜集工作。我和岩井战前就熟悉了。现在他对我也颇倚重。除让我担任情报工作外，又让我出面组织‘兴建建国会’，主办《新中国报》，从事和平运动的宣传。你看我应怎样应付日本人的要求又同时开展自己的工作呢？”潘汉年稍稍思索了一会儿，便将自己事先已有的构想向袁提出。他说：“你可以按照岩井的要求去做，并尽可能做出点‘成绩’来使他感到满意。同时逐步将我们的人引进，在他们的机关里建立我们的据点。把他们的文化宣传机构变为我们的掩护阵地。我们当然也要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情报材料。你也可以为他们写些宣传文章。反正你的身份是已经公开的。”袁殊当即表示，他愿意按这样的安排尽力去做。因为他事实上已经背上了汉奸的恶名，虽然风险不小，但他在情报战场上有多年的经历，并不缺少经验与胆识。

不久，从延安来的情报骨干刘人寿果然经由袁殊的介绍，进入了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并担任了机要秘书。此后，经袁殊、刘人寿之手便将“岩井公馆”所能接触到的许多重要的日本情报材料，通过秘密电台不断发往延安枣园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袁殊较早就



从外务省情报系统获悉：日本已决定同苏联进行秘密谈判谋求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正同苏驻日外交官秘密接触，同时获悉：东条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美英争霸，日军大本营正按此战略行事。这两项战略情报不仅对延安中枢机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而且经由延安转告苏联后，苏军便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将其在远东的防御部队大量抽调到西部去对德作战。

此外，在袁殊主持的《新中国报》社里，也先后调进了共产党员翁从下，进步记者叶文津。他们是潘汉年特地通过南方局从桂林《救亡日报》调来的。为的是要尽可能地控制这一舆论阵地，并使它成为一个新的掩护点。

三

岩井英一一是日本外务省系统的资深情报官员。他出身于日本同文书院，战前就先后在日本驻中国的上海和成都领事馆内任职，并从事情报活动，有“中国通”的外号。抗战开始后，他升任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另以“岩井公馆”的名义建立专门情报机构，负责搜集情报。此人老谋深算，为了在情报战场上有所收获，和军方的情报机构一争高下，他十分重视物色中国情报人员为他服务。他知道中国的情报人员可能会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不避讳。他只希望有人能替他广搜各方面情报，好不断向外务省上司交差邀功，别的也就不怎么在乎了。情报工作特点本来就是有得有失的。只要对他个人有所得，让他的成绩引人注目就是他的成功。而所失和他个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他也就无所谓了。他把袁殊从“特工总部”保释出来，并且也知道袁在历史上曾是中共情报人员，和国民党军统也有联系，但他仍然很看重袁殊，既让袁做秘密情报工作，又让袁以公开的身份从事文化活动，显然都是在权衡了得失后的选择。他也正需要利用袁殊这样和各方情报机关都有过某

种联系的人物发挥特殊作用。

有一天，袁殊对潘汉年说：“我和你的接触，日本人不会不注意的。如果岩井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接触情况，我该如何向他解释呢？”潘汉年已经从袁殊的介绍中掌握了岩井的背景和特点，他想了一下便胸有成竹地对袁殊说：“那你就用我的化名‘胡越明’告诉岩井，说我过去是你的一位教师，是一位左派人士，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住，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可以在香港帮助你搜集中国大后方以及英、美和中国关系等各方面的情报资料的。”袁殊又问：“如果岩井要我将你介绍给他，该怎样答复？”潘汉年说：“那也不要回避。你就答应替他约我见面好了。如果谈的情况不错，我们就不妨利用日本人的掩护把香港的情报摊子再搞大一些。”

几天后，袁殊果然告诉潘汉年，说岩井要和他直接见面。约定的地点是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里。潘汉年经过仔细准备便应约去了。

潘汉年会见岩井时，袁殊也在座。岩井首先对“胡先生”愿意和袁殊合作表示欢迎。接着向潘询问了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潘汉年从容应答，很有分寸而又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香港、重庆和大后方的许多一般性情况，包括国共两党和一些民主派别情况，以及苏、美、英等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等。岩井听了显得很有兴趣。他又一次表示：“欢迎胡先生做我们的朋友。”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后，潘汉年便返回香港，坐镇华南情报分局，统筹和指挥敌后情报工作。不久，袁殊便应岩井的要求专程去香港转达他的意见：正式邀请胡越明（潘汉年）先生为“岩井公馆”工作，搜集香港和大后方的情报。并要求制定一个开展工作的计划由袁带回上海交岩井核准。

潘汉年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利用岩井的这个要求把香港的工作规模再扩大一些，同时也可以解决部份情报经费的来源。他对袁殊说：“我们就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

护，在香港扩大一下阵地。你回去对岩井说，我计划办一家公开的刊物，团结和联系一批人广泛搜集情报。我们每半月可以向“岩井公馆”提供一份综合情报材料，要他们每月付给我们2000元港币情报费。我们办刊物还要一笔开办费，也要他们先予支付。”

袁殊回上海后立即向岩井报告了“胡越明”（潘汉年）的工作计划。岩井很快就批准同意，他让袁殊再赴香港和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小泉清一一起去会见潘汉年落实“计划”：拨一万元港币作刊物开办费，约定由小泉清一代表“岩井公馆”每半月接收一次情报。

潘汉年商请正在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的恽逸群来主编新办的刊物，并定刊名为《二十世纪》。决定刊物以中间派的面貌出现，内容尽量灰色一些，便于作掩护。

与此同时，潘汉年向廖承志、张唯一等介绍了他和“岩井公馆”所建的情报关系。经研究，决定在潘汉年指导下由张唯一、徐明诚共同负责每半月编写一份有关抗战大后方和国共合作方面的情况，有时再增编一部份美、英、苏等国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作为向“岩井公馆”提供的情报。不言而喻，这类情报在内容上是要再三斟酌的，不能毫无价值又不太有价值。

四

潘汉年在敌后主持情报工作时的另一场惊险曲折的斗争，就是和著名的汉奸头目、汪伪“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打交道。

李士群其人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在大革命时代曾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2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CC组织收买他成了驻上海的情报人员。1938年受中统徐恩曾指派到香港去做日本情报工作。到港不久，他就投靠了日本人，由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丰一介绍到日本驻华使馆去做情报工作。由于他在帮助汪精卫进行叛国投敌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重用。除长期担任“特工总部”头目外，还历任伪江苏省省长、伪警政部部长等要职。

李士群成了大汉奸后，并没有把自己的路走绝。他知道在汪伪内部矛盾重重，他自己的处境也是危机四伏。他因受周佛海的排挤而得不到汪精卫的充分信任，日本人对他也并不完全相信而处处预防或牵制，国民党特工系统曾把他列入重点打击对象。因此，他在充当汉奸角色的同时，又时时在谋求着“狡兔三窟”之计。于是他一面向国民党特工系统传出信息，表示他的“特工总部”今后将“停止捕杀渝方人员，望彼此谅解”，一面又在暗中设法打通和中共的联系渠道，为自己多留一条

后路。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关系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表示，他愿意和中共建立秘密联系，为中共提供某些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将他过去的朋友胡绣凤派到他那里去担任他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立即将李士群表示和要求报告了南方局领导。

很快，中共南方局就给上海地下组织回电，要求上海地下党立即派出地下党员关露，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即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露去接受的任务，就是要让她去李士群那里担任秘密联络工作。

关露原名胡寿楣，原是一位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共，一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和地下革命斗争。抗战开始后仍留在上海坚持工作。南方局所以指名要她去接受任务，是因为李士群要求去他那里做联络工作的胡绣凤是她的亲妹妹。因为胡绣凤正在大后方工作，一时无法调回上海，便决定先由关露去开展工作。

关露到达香港后，接待她的是廖承志和潘汉年两位。潘汉年向她介绍了李士群的历史情况和现在动向，要她到李士群那里之后“只能用眼睛和耳朵，不要用嘴巴”，意思是多观察、少说话。又反复叮嘱说：“以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头称是。她以党性的自觉，接受了这一艰难复杂的任务。

关露回上海后就按要求到了李士群那里工作。潘汉年委托上海的另一个情报干部吴成方负责和关露联络。从此，李士群的动向以及他向中共方面提供的一些情报，便经由关露、吴成方这条线报告到中共的情报系统。潘汉年每次从香港到上海来，也都要给予必要指导。

在最初一两年间，李士群所能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不多。潘汉年也没有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潘汉年的工作重心从香港转移到了上海。由于上海租界已完全被日本占领，上海的形势和环境都更为严峻。潘汉年才决定要进一步打开和李士群的联系渠道，多做李士群的工作，以保证上海的地下工作能够坚持下去。他决定亲自出马去会见李士群。

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通过关露和袁殊的安排，在上海愚园路李士群的家里会见了李士群。这次会见，目的只是要把联系的层次放在更高一级，以便进一步打开对话渠道，同时为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情报活动增添一层保护色。双方在寒暄一阵之后，便进行了一些表态性的谈话。李士群说：他欢迎潘汉年和他直接接触。他表示：以后中共方面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一定尽力

帮助。他也希望中共方面能对他多多帮助。

这次会见，除袁殊在场外，还有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李士群的一名助手，当时担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胡均鹤。此后，李士群就将和潘汉年的联系任务交由胡均鹤负责。

潘汉年的直接工作是收到了成效的。不久，李士群就主动约请潘汉年到他家里再次见面。这是李士群实践他要“帮助”中共的表示。会见时，李士群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行动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会见结束时，李士群又拿出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表示对中共情报工作经费的支持。潘汉年婉言谢绝。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租界地区被日军占领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在省委统一安排下，撤退工作逐步地进行。但当省委负责人之一刘长胜撤退途中经过瓜州地区时，因带路的交通员不善于应付伪军的盘查而被扣押。后来总算处置得当而脱离险境，越过了封锁线，但这一情况给后撤者等于发出了警报，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有更妥当的交通线路安排，否则很危险。

1942年9月，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要他们也尽快撤离上海。刘晓便找潘汉年商量，鉴于刘长胜撤退过程的教训，这次撤退的人员目标更大些，需要做更安全安排。商量结果，决定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辟交通路线，并由潘汉年出面去和李士群交涉。

潘汉年在李士群家里再一次见到李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同时还带有几名助手。希望你能为我们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

李士群也很干脆的回答说：“这不成问题。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要请你们和我多交换一些情报。我们有什么消息，将由胡均鹤通知你们。”

根据李士群的建议，双方约定，在潘汉年到根据地之后，互相用电台继续保持联系。事后又由胡均鹤提供一份密码交给潘汉年带到根据地去使用。

李士群又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去具体安排，帮助潘汉年等一行经由镇江渡江北上，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负责护送。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潘汉年、刘晓、王尧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以及刘、王二位的夫人张本、赵先一行五人，化装成阔气的商人，从上海乘火车到达镇江。奉李士群之命，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早已做好

各项准备，将他们一行安排住下后，又是陪着游览名胜古迹，又是请吃饭。隔了一天，由刘毅亲自护送，用一条机帆船将他们送过长江到达仪征县城。然后又向北行，一直将他们送过敌我交界线到达新四军的驻地；刘毅才回去复命。

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领导机关向根据地撤退完毕。

五

潘汉年回到新四军根据地后不久，被中央情报部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并要求他依托华中局继续指导（遥控）上海的情报据点工作。华中局根据潘汉年的建议，成立了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三人组成的情报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方面的工作。

1943年4月间，种种迹象表明，敌伪军又有“扫荡”企图，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饶漱石要求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加紧对敌情的搜集。这时，情报部门和李士群之间的联系因出了事故中断了。潘汉年经过考虑后便向饶漱石提出建议说，由他自己亲自再去一次上海，一面可以检查和部署一下那边的情报工作，一面可以会见李士群，争取直接从他那里得到某些有关“扫荡”的情报。饶漱石立即表示同意。

稍事准备，潘汉年便从根据地出发进入敌占区。随行的仅有交通员何萃一人。到达上海之后，潘汉年首先同仍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张唯一、刘人寿等分别见了面，然后通过关系找到胡均鹤，提出要直接会见李士群。胡均鹤说，李士群目前在苏州家里（李士群作为特工总部头子在上海有个家；作为伪江苏省省长，在苏州也有个家；作为伪警政部长，在南京还有一个公馆）。要和李士群会谈，只有到苏州去。到了苏州之后，李士群家人说，李已去南京，说有事可到南京去找他。潘汉年感到李士群此番的态度有些异常，他估计李士群是已经知道他南下的意图。究竟是有意避开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经过一番思考，潘汉年决定去南京，即便李士群有什么新打算，想必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因此，潘汉年便继续由胡均鹤陪同前往南京。

到达南京后，胡均鹤将潘汉年带到李士群的公馆。李又不在家，据说是去见汪精卫了。在李家，由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另一个头目杨杰负责接待潘汉年，他以“萧先生”（潘汉年曾化名萧叔安）的称呼向一些汉奸头目介绍潘汉年，称潘是李士群的朋友，从而使潘汉年的此次南京之行公开化了。这显然是李士群事先安排好的。当晚，由杨杰出面，宴请潘汉年。并将潘送往一高级旅馆休息。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才出面会见潘汉年。李士群首先谈了一通所谓当前形势，说现在日本人很重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接着，他就把话题一转，急切地对潘汉年说：“汪（精卫）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这突然提出的问題，一下子把李士群此次由上海而苏州，由苏州而南京所预谋的目的全部露底了。原来他这次是要借潘汉年这位中共代表人物来为自己在汪精卫面前邀功的。意在表明有办法能够拉到中共方面的要人来为已经越来越孤立的汪伪政权壮一壮声势，让汪精卫对他更有所倚重，并在和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得到一点筹码。

潘汉年意识到，事情既到了这一步，拒去会见汪精卫未必是明智的。如果李士群的预谋失败，在汪精卫面前大失面子，就有可能使他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死心踏地反共卖国。自己的安危固然可虑，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扫荡”根据地的情报，对于根据地的安危则事关重大，另一方面日本人已经通过周佛海在和重庆方面拉关系。汪精卫让李士群出面找共产党，正表明他的处境不妙。他想会见中共代表人物，无非是想借此来显示他在政治上还有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同时还可以借此加剧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磨擦。他还期望通过会见中共代表以造成他的某种开明、民主、能够联络与容忍对立党派的假象。主意已定，他答应李士群去会见汪精卫。

当天下午，潘汉年便应邀前往汪精卫公馆。事先都已安排好了，首先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下不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在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对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要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

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汪先生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也不会对你过不去的，将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本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汪精卫是故作姿态，潘汉年是虚与委蛇。

会见汪精卫之后，潘汉年立即返回上海。在上海，李士群又和潘汉年见了一次面，提供了一些有关“扫荡”问题的情况，表示要继续和新四军保持联系，交换情报。潘汉年已知此人居心难测，不能轻信，只说回根据地研究之后再进一步联系，而未作直接承诺。

在对上海情报据点的工作又做了一些部署之后，潘汉年便迅速回到了根据地。

会见汪精卫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題，但重要的是会见本身的浓重政治色彩，其后果使潘汉年竟感到有些后怕。他回到根据地时，恰值华中局整风运动进入尖锐复杂的重要时刻。饶漱石正在利用整风运动弄权排斥异己。就连陈毅也被整得在根据地呆不下去了。饶漱石整人有术，潘汉年颇有顾忌。因此，他在向饶汇报此次敌占区之行时，只谈了从李士群那里获得的一些有关“扫荡”的情况，而南京之行以及会见汪精卫一事便没有如实向饶报告。他担心饶漱石会利用这件事整他。他准备去延安时再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人说清楚这件事。不料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南京和重庆方面都先后将这件事传出，并有意渲染和歪曲。延安方面因未接到过潘汉年的报告便加以否认，潘因此也就更被动了。1945年春天，潘汉年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时，本想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这件事，不料又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去了这一次最重要的机会。“七大”之后，潘汉年便远离中央，长期奔波在情报与统战工作的第二线。此事就一直被搁了下来。直到1955年的4月初，在毛泽东已经决定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时，潘汉年才将当年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一事的情况向中央做出交代和检讨。

可惜，时间已经太晚了。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了一根引爆的导火线。情况刚被报告到中央最高决策人那里，潘汉年就立即被“逮捕审查”了。这一审查，使潘汉年这位久负盛名、功绩卓著的革命战士遭受了长期的痛苦灾难。直到27年之后的1982年，才宣告平反、恢复名誉。而这时，潘汉年已经含冤离开人世5年多了。

（责任编辑：仲文）

不该开的“天窗”

● 贺星寒

编者按：老作家巴金写了一篇建议设“文革”博物馆的文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央报纸也发表过。此文本已收进《讲真话的书》。但是1990年这本书出版时，却将文章全文抽去，只留一个题目。出现了共和国图书第一“天窗”事。最近出版的这部书，已将巴金的这篇文章补了上去。这样做是很好的，知错改错便好。但这中间是有发人深省的教训的，但愿今后再不要发生这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了。

奇怪的空白

1990年底，在成都、北京及上海等全国少数几个大城市新华书店架上，出现了一本厚厚的书。此书内文占1148页，78万余字，虽只印了2000册，但全部都是精装本，足见出版社对此书之重视。这种规格，在当时是罕见的。书名十分朴实，也十分响亮：《讲真话的书》。

在扉页后面，有作者巴金一幅近照。

初版的2000册很快售罄。求购此书的信件不断寄来。同时，很多读者或写信来，或亲自登门问询，为什么在《讲真话的书》第1026页上，只有一行标题，而文章是空白？

难道是印刷厂的失误？是排版中的疏忽？

作为四川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书，编辑、校对、印刷、装潢都是十分考究的，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对于读者的天真提问，本书责任编辑，也是文艺社的副总编辑戴安常，只好托托眼镜，顾左右而言其它。追问急了答一句，你们自己看嘛！

奇怪的空白！

细心的读者在第11页的目录表中看到，空白页的文章标题还在，但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括号内有两个字：存目。也就是说，只保留一个标题。而在此书封底上，赫然印着一行

大字：本书收集作者从1977年到1989年所有的著作——包括《随想录》五卷。

既然收集了“所有的”作品，就不应该有缺，既然缺了，就应承认自己是选本。在巴老的二百多篇文章中独独抽去一篇，且搞个空页，实在叫人吃惊。三个字陡然肃然地跳在眼前。

开天窗！

这三个字仿佛已经进入历史，抖出来有积年的尘土。那是在国民党独裁专制时期，有一些年头实行过新闻检查制度，报刊杂志若有文章不能通过，就必须撤换。一些报刊，重换来不及，或者为了表示抗议，干脆就将那一块空白同时付印。于是报刊常常出现这种老百姓称之为“开天窗”的情形。

而“天窗”应该有的那篇文章，可能是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

共和国成立40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过这等事。我以为这是共和国第一“天窗”。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什么文章，如此厉害？

“文革”博物馆

“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这便是“天窗”中孤零零地保留的标题，而文章则全部被删去，约2000字左右。

这2000字中，难道藏有投枪、匕首和芒刺吗？是的，可以说全篇都充满了对“文革”这场灾难的控诉，而且指出，如果再来个第二次，“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整本《讲真话的书》，都是对那场大浩劫的反思。为什么别的篇目都能容忍，而独独要去掉这一篇呢？难道是指建立“文革”博物馆这种大胆的想法吗？

其实巴金早说清楚了，他只是是一句话，并没有完备的计划。建立一个博物馆，并非很困难的事情。如今梁山泊、大观园之类的民俗馆不是轻而易举地就建立起来了吗？但“文革”博物馆始终停留在呼吁阶段。所以，任你设想如何大胆，都是无所谓。这不可怕。

我们终于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与其它诸篇稍有不同之处了。此文发表时正值某个不是运动的运动之后。老人回叙了在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情况，然后说：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巴老毫不留情地把矛头指向那些留恋“文革”的人物。这些人从此

也将巴老视为眼中钉。

巴老在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中看到极左者的嘴脸，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敲响警钟。而吹鼓手们自然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方来的力量。于是我们听到了流传的小道消息：巴金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个××主义者。

××主义者本来是一种个人的价值选择，外人只要判断准确，却也无无可非议。但在某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先扣上一顶帽子，以后进行讨伐，就出师有名了。

“天窗”难道是被强制而开的吗？

自动开“天窗”？

我们的猜测不对了，据说，“开天窗”并没有来自上面的任何压力。

最先的传闻是，此书的特约编辑说服了巴老，同意《“文革”博物馆》一篇以存目面貌出现。也就是说，巴老同意“开天窗”。

李×系巴老亲属，又曾是四川省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之一，自然说话很有分量。所以这条传闻听来可信性颇高。但人们又免不了疑惑，其中有个对此穷追不舍的角色，即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龚明德。

龚明德是位中年编辑，在四川住了十来年，依然不改湖北口音，而且是个倔脾气。1988年5月，他刚责编完巨型《巴金年谱》，接手责编《巴金近作》第五本。他想另辟蹊径，搞一本1976年后巴金作品的全编。这一动议得到巴金同意，巴老6月4日迅即给龚回了一封长信，谈了很多具体的设想。在这信中，巴金只说过“用不着把译文也收入凑数”，而决无对某些篇章只存目的意思。

在1989年，龚明德有一次深刻体验严峻人生的机会，由此也未能如愿当《讲真话的书》的责编。但是，他

始终关心着此书。对于上面那种传闻，即巴金同意“开天窗”，他是抱怀疑态度的。

1991年初，龚明德在上海见到巴老。说到《讲真话的书》中《“文革”博物馆》一文存目的事时，巴老说：“开天窗不是我的意思，可能编者与出版社怕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

根据巴老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开天窗”决不是巴老的意思，他没有什么需回避，需掩饰，需害怕的，也不怕沾上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如龚明德去拜望时的感觉：“我眼前的巴金；实构成一座宏伟雕塑，雕塑通体鲜明地透示着一个主题，即‘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之后的大安祥，大坦适。”

但是，巴金是否被“说服了”呢？

只能沉默

我认为，巴金是不可能被说服的。急于要想去说服巴金的，有两方面的人，一是特约编辑，二是出版社，其代表为副总编辑兼此书的责任编辑戴安常。

据透露，在编书期间，曾挂长途电话到北京一个单位请示。这位领导的回答是：“相信编者会很好处理这个问题的。”其时该在1990年1月至9月间。

而责任编辑对此的看法是，取掉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了保护出版社不被吊销”。

而“上面”是谁呢？××及某领导自然包括在内。他俩一直是上下级关系，互相都很了解，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便有上边的意思作后盾，前去“说服”巴老了。而挥舞在手中的，则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

下面是我的想象：××以亲属及

特约编辑的身份，向巴金不断地念叨上边的精神，指出《“文革”博物馆》有沾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最好不收入。巴金以老病之身，不耐其烦，最终归于沉默。

于是，“编者”认为已经把老人说服了。

老人并没有被说服，而是以沉默作抗议。他在1991年5月23日写给四川省作协会员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我长期‘脱离’生活，又没有资格发言。请原谅我的沉默。”为此事作了个注脚。

“天窗”的启示

“开天窗”在其作祟者看来，一可以避免那篇刺痛背脊的文章，二可以将巴金这杆大旗纳入自己营垒，三可以以为自己宦途高升增加实绩。但最终的实际效果与他们愿望相反，唤起了知识分子的深层思考。

《讲真话的书》（初版及再版）1026页的“天窗”，显示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绝对统一梦的破裂。

1991年金秋时节，国际巴金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讲真话的书》人手一册。国内外学者面对1026页的空白大惑不解。几位有收藏癖的中外专家可能已经意会到其中奥妙，将此页作签名留念之用。他们请饱受“文革”之苦的名人如胡风遗孀梅志以及日本、美国、朝鲜等巴金研究者签字。空白不是空白，它暗示着巴老警惕过的局面，如果国人不加制止，有一天它会再次卷上重来。

最近出版的《讲真话的书》（增补本），已将此书再版存目空白了的一页，那篇要建“文革”博物馆的文章补了进去。虽然增加了一页，这一页却分外沉重，分外明亮，分外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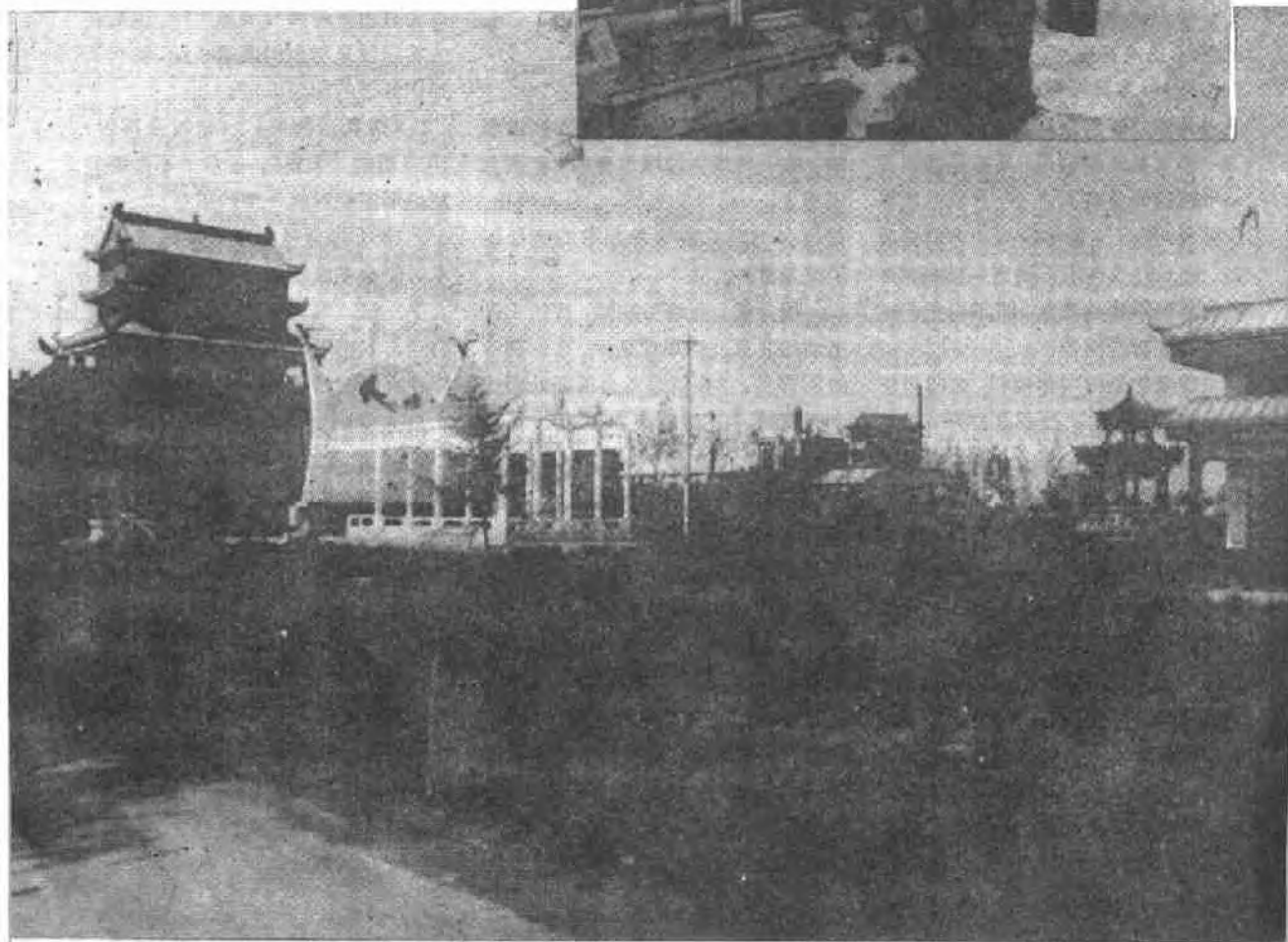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杜导正）

一个女人的乡村

都市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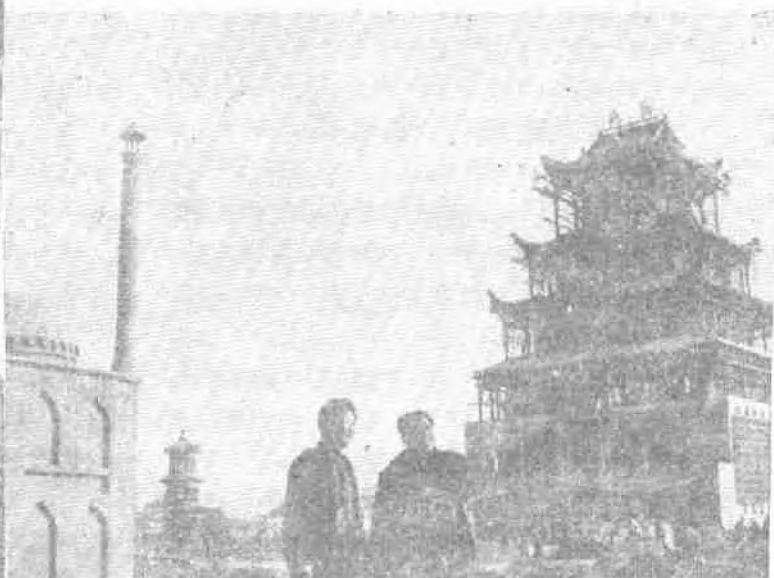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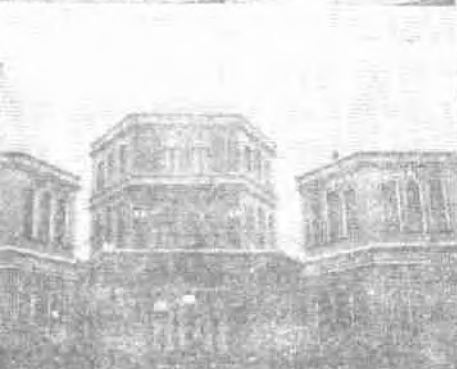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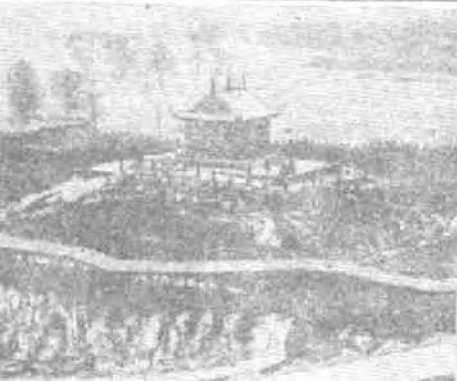
——记河南京华实业公司总经理刘志华

● 刘东平 王 凡





△江泽民总书记在京华公司视察（后排左三为刘志华）
 ◁加拿大式建筑风格



在炎黄子孙最初繁衍的中原大地，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叫作小冀的小镇，它位于今日的河南省新乡市郊外。

小冀镇内有一个自然村落，70余户，300多人。它原本同中国那些最古老的村落一样，闭塞而且贫穷。

可如今，当我们走近这个村落，首先看到的是绿荫丛中高耸的北美风格的塔楼。塔楼周围，乳白色的西班牙式、暗红色的英国式、青绿色的俄罗斯式农民公寓，错落有致。在带有飘逸着伊斯兰神韵的拱形门穹映衬下，更浓郁了几分域外氤氲。

依傍着这片异国情调的建筑群，一座集中国风光名胜精萃的“京华旅游城”，水上游乐宫，矿泉游泳馆，均已初具规模。我们的目光，被这五彩缤纷如梦之境所缭乱，这哪里像是中国的乡村，简直是异国的都市。这一“都市”1992年创造的总产值为2150万元，人均产值5万元。

而令人惊奇的是，使这片神奇的都市的崛起，使乡村发生巨变的导演，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刘志华。

刘志华，50出头，高高的个子，双眸透着坚毅。五十年代末，她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如今，她是这座“都市”京华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在刚刚揭晓的中国农村十大名人中，她的名字被列在第一位。

甩脱穷帽子

20多年前，小冀属于中国最穷困的一隅。当时刘志华所在的生产队，农民们囤里没存粮，床上无完被，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还饥一顿，饱一顿。

1972年，又到了一年一度改选生产队队长的时候。虽说这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官，可在官本位的中国，这微不足道的位置还真让人眼热了一阵子。而这次改选，面对着4头瘦牛，3间草屋，1辆破车，8000元欠款，200多号饥肠辘辘的庄户人的烂摊子，成年男子们退缩了，他

们都已过了一次“官瘾”，但似乎都没尝到想象中的实惠。此刻，谁也没勇气再把这个“官”揽到自己头上了。

“男人们不干，俺们妇女干！”她当时想得很简单，“俺就不信邪，豁出去带着全村人干，仍甩不脱这穷帽子？”

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她上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先得让全村人吃饱肚子。据说她当选的那夜，梦中突然大笑起来，丈夫将她推醒，问她笑从何处？她说是梦见好长好长一条桌子，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她招呼村民们赶快来吃，吃啊，吃得肚皮发胀，腰带都撑断了。丈夫听罢，也被这番美梦逗乐了。

但是，梦毕竟梦不出粮食，要想温饱，还得靠干。这时，正赶上为冬小麦追肥的季节。俗话说，苗无肥不壮。可队上一贫如洗，哪有钱买化肥呢？刘志华琢磨了许久，琢磨出个穷办法，带领全村劳力，到附近的化肥厂，挑排出的废氨水。

隆冬腊月，北风刺骨，氨水一溅到棉袄裤上，立即结成冰砣，而且熏得人恶心。刘志华起早贪黑地带头干，氨水浸，严寒冻，脚和鞋时常粘在一起，拔都拔不下来，走路一瘸一拐的。

全村的人都被女队长的行为所感动，不再观望彷徨，都铆足了劲，硬是靠肩挑手提，用这不花钱的“化肥”，把全队120亩麦田浇灌了一遍。

人不负地，地不负人，辛勤的汗水化作了丰收的果实。1973年，全队小麦亩产从200斤一下升到900斤。记不清多少年了，村民们第一次有了温饱的年景。第二年，她们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向国家交售了余粮。

在本世纪七十年代，8000元的欠款，对刘志华所在村的村民来说，无异与天文数字一样巨大，何时能还清呢？搬不掉这座欠款山，村民们就总也直不起腰来，刘志华为此愁眉不展。

她听说临近的聂庄因搓草绳赚了钱，心想稻草村里有的是，技术也简单，便也生出搓草绳的念头。搓草绳要机器，可哪来购机钱呢？去

借贷！但许多农民听了直摇头，背着8000元的欠款，又举债，这女子疯了。

刘志华不为所动，硬是软磨硬泡贷来了500元，买了5台搓绳机，趁冬闲，说干就干。

几个月下来，大伙用血汗挣来了第一笔大钱700元，从未挣过这么多钱的村民们，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这一沓钱传来传去，你数一遍，我数一遍。

搓绳机转得更欢了，又一个冬夏过去，8000元的债山被搬掉了，村民们挺直了腰，长长地舒了口气，同时他们也渐渐服气了：志华这女子行呵！跟她干准没错！

不叫“志华”叫“京华”

家家户户囤有粮，缸有油，穷惯了的农民们愁眉舒展了。但刘志华不是小富即安的人，也恰在此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连任几届的女队长，敏锐地感到：渴望已久的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机遇来临了。

刚高中毕业回乡时，这个新农民就渴望着改变旧农民贫困的处境，实现书本上说的那个理想，消灭农民与工人间的差别，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而消灭差别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经济上腾飞。经济的腾飞，走传统的农业之途是不行的，必需搞多种经营，兴办企业，走向市场。刘志华又陷入苦思，筹谋新的方略。

1979年春，刘志华到新乡市办事，在一家饭馆用餐，看到一盘质似肉、形像竹笋的菜，尝了尝，觉得味道鲜嫩滑爽，便问这是什么菜。饭馆的人告诉她，那是腐竹，是用黄豆加工出来的。

刘志华动心了，黄豆在俺中原农村有的是，做出的腐竹这么好吃，何不建个腐竹厂呢？

可刚清了债，有了温饱的农民，又要他们集资借贷，盖厂房、进设备，干一些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又不免犯嘀咕。钱从哪来，技术谁传授，干砸了怎么办？

“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我自己的！”刘志华再次显示了大智大勇。在她的坚持下，厂房

盖起来了，设备也置办了，又从广西请来个师傅。可师傅开口就要月工资1000元，刘志华一咬牙，给！把自己和丈夫的积蓄，刚过门儿媳妇的拜堂钱，通通拿来先垫上。

白天，师傅带着操作，刘志华目不转睛地学。晚上，师傅休息了，刘志华又凭记忆演练，终于掌握了全部工艺，她自己也能做出又白又嫩的腐竹了。

产品出来了，没有销路，一切白搭。刘志华扛上一箱腐竹，直奔北京。北京崇文门菜市场的经理，仔细端详着刘志华送来的货，那成色，那质量，真没挑儿。“这货我们要了，回去马上按样发货”，经理一锤定音。成功啦！她高兴地差点蹦起来。

从这以后，一箱箱的腐竹源源运往北京，销量占了京城腐竹市场的80%，且至今不衰。那腐竹还上了中南海的宴席，人民大会堂的礼品柜。

1983年，一座日产一吨的腐竹厂在小冀这片土地上耸起，效益猛增。在这基础上，京华实业公司诞生了，刘志华出任总经理。有人说：公司是你创办的，何不用你的名字志华命名？她说：我们的第一批产品是在北京打开的市场，我们就是要面向首都，面向大市场，所以叫京华才有意义，才有气魄。

有了腐竹厂作龙头，其他新企业像滚雪球似的，一个个建了起来。罐头厂、豆制品厂、豆浆晶厂、纸箱厂、日化厂……那几年，京华公司的产值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5年之间，总产值达到1250万元，创利税120万元。京华公司一跃为河南省一级企业，新乡市明星企业。

企业的不断增设，往日的农民，如今多数亦农亦工，工农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刘志华初当队长时那为妇女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的朴素愿望，如愿以偿。

“刘氏感情管理学”

刘志华既有刚强、坚毅、百折不挠的性格，又饱含着温柔、善良、宽厚慈悲的母爱之心。

自从担任生产队长以后，她就像一位爱神，把温暖送到了每一位乡亲身边，用感情的纽带，将京华人拧成了一股绳。

村里有位70多岁的杨观景老汉，无儿无女。一年，老汉的胃大出血，昏死过去。刘志华得知，急忙放下工作，亲自把老人送进医院。随后，她组织人为他献血，为他煎汤熬药，并与丈夫轮换着整夜整夜守护他。老汉的病日渐好转，刘志华却倒在了病床上。

还有个叫刘志全的农民，从小患小儿麻痹，残了一条腿，受人歧视，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刘志华给了他慈母般的爱，为他安排工作，帮他成了家，就连他母亲的丧事，他妻子生育，都是刘志华一手料理的。当他搬进新农民公寓时，她又来帮他布置房间。刘志全感动得哭着对她说：“大姐，您真是比我的亲娘还亲啊！”

其实京华的每家每户，都能感得到、说得刘志华对他们体贴入微的关怀。公司建了幼儿园，职工子女全部免费入托、就餐、穿衣。公司免费出车，送学龄少年到新乡市内的中、小学校上学。职工生病，公司安排住院，并预备上公司和刘志华个人的两份慰问品去探望。刘志华还规定，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10元零花钱，冬夏发两套新装，还专门请大医院的大夫，为他们检查身体。逢年过节，每位老人还会收到一份由公司赠送的精美礼品。

而未得恩泽的，是她自己的儿子。在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的忙碌中，她耽搁了孩子们的读书教育，现在几个孩子均在京华当普通职工。

一次，她一个儿子为招待来看望他的同学，迟到了近一小时，刘志华责令他停职检讨了半个月。后来，她又让这个孩子到公司的办公室工作，任务布置下来，是扫地、擦地、提水、倒痰盂，学做事，学作人。干了半年，没有领取一分钱。

爱心换来了爱戴，公正赢得了信赖，刘志华成了京华人的灵魂。她每次出远门，老人们总是叮咛复叮咛，乡亲们则送一程又一程。如若问京华人最担心什么，你会听到这样的答复：俺们最怕志华生病。俺们最怕上级把志华调

走。

有一年，刘志华病重住院，京华人一下就凑了10000多元医疗费。刘志华昏迷了20多小时，京华人整整一天一宿没合眼。

刘志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京华感情管理学初探》的论文。她在文中写道：

“京华管理学的主题，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让职工感到自己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气氛中，一个爱的世界里，从而激发起建设家乡和祖国的热情，当一个人的人格受到尊重，个性、才能和爱好都得到发展时，人的向心力、创造力是不可估量的。”

“金钱能买到有限的体力和技术，但决买不到热忱、忠诚、创造力。我们的感情投入，赢得的是爱与信赖，其价值是无限的。”

这位富有爱心和远见卓识的女企业家，以她独到的感情管理学，赢得了京华人的心，激起了无限的创造力，凝聚着全体村民一道去实现她心目中那乡村都市的宏伟蓝图。

架起通往都市的精神之路

今天，当每一个人走入京华，都会像本文的开头描写那样，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留下强烈的印象。但人们大概不会想到，刘志华让农民们住进这样的公寓，并非只是为了美化和改善居住条件，而是有着非一般人所思的极深用意的。

人们的确难以想到，这个往昔农业生产队的女队长，她的思维空间竟是那样的辽阔，人类美好未来生活构想的命题，对她竟也是那样富有吸引力。农民的物质生活改观了，但如果精神世界还留在旧社会，他们就永远作不了新时代的主人，也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可见的乡村都市是崛起了，但传统的农民意识不割舍，农民们也就走不进现代的都市。

但要让农民摆脱数千年形成的习俗、观念的束缚，又谈何容易，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因此，盖公寓，就要有都市味，再加点欧美风格；室内装饰，要搞成现代

水平的，使昔日的农民，置身一个全新的环境。

为了动员庄户人住进去，却费了老鼻子的劲。中原的农民们留恋祖辈相传的地基、瓦房大院，迟迟不搬。当时，刘志华的丈夫家的5间瓦房、一个大院刚落成不久，为了示范，她硬是同丈夫说服家人，忍痛拆了新房，举家率先迁入公寓。

公寓楼房，抽水马桶，热水浴缸，燃气炉灶……与独门独户，人畜同院、老井辘轳……等乡村生活方式和习俗，有着迥异的差别，久而久之，农民们旧的生活方式，不够科学的习惯风俗，自然而然地得到矫正。

为了打破旧式农民一生囿于一隅，不知天外有天的闭塞状况，刘志华规定，由公司出资，所有京华人，一年外出旅游观光一次。旧日京师、沿海特区、风景名胜，都可去逛逛。短短几年，已安排18批近500人次游览了北京、青岛、苏州、杭州、西安、北戴河等地。64岁的张玉兰大娘告诉记者：“早些年，我连小冀镇都没出过；这几年，我已快光顾了半个中国。”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汉，他曾在临潼贵妃池洗浴，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没有见识，愚昧不开化的自卑感，正在京华人中渐渐消逝。

京华的人在变，昔日看到城里的什么都稀罕，如今家里家外，比城里还风光。面对公司宾馆、娱乐场所琳琅的裸体雕塑，再不会脸红害羞，懂得了那是艺术品。风格各异的建筑，雕塑作品，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在这人类文明集萃的氛围，给村民们一种新的生活情趣，培养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1987年，刘志华作为中国中小企业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那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让她触景深思。归国后，她对乡亲们说：咱们要在京华消灭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不仅要奔着国内的一流水平，还要瞄着世界的先进水平。京华若要继续保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急流勇进，提高人的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民的面貌，已经刻不容缓。

刘志华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贫困，她这个高才生不得不于高中辍学，回家务农。含辛茹苦地拉扯孩子，侍奉老人，供养自己的丈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为了这新乡地区第一个北大学生，她和孩子们，都未能得到望眼欲穿的高等教育。

刘志华为京华学龄少年读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上新乡市内最好的中、小学，请优秀的退休教师，在课后为上学的京华职工子弟辅导功课。

1989年，京华公司和平原大学联手，在小冀创办了经济管理专业大专班。50多名农家子弟，跨进了乡村大学的课堂，系统地学习数学、哲学、心理学、现代企业管理等学科的知识。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途径，京华目前已培养出5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员，6级以上的熟练工人，占做工总人数的80%。刘志华又在筹划建一所正规“农民大学”，让更多农村青年，享受大学教育，成为一代新人。

要在经济领域开拓，要追赶世界潮流，作为总经理的刘志华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她不光为下一代人增益知识创造条件，自己更是抓紧每时每刻学习。

无论白天多忙多累，晚上回家，总要读一会儿书，这已形成习惯。她的床头、案上、书橱中，摆满了古今中外、政治、经济……等书籍。她读过的有关企业管理的书籍，可列一长长的单子，譬如《法国的六个公司的管理》《发达国家的管理》《企业管理之王——丰田公司》《科学管理——索尼公司发展的动力》《了不起的买卖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罗尔斯顿·普里纳公司的神妙的增长》……

难怪乎她如今能稳稳地操纵京华企业之船，航行于经济之海；无怪乎她总有远见卓识，魄力超人……她确实是个不一般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责任编辑：仲文）

上海滩

的

外婚介绍所

● 孙孟英

空中国际涉外婚姻所被摧毁

1992年5月26日，上海某区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站着一个年龄约30岁的男青年，他低垂着头，神情疲惫。

“判处诈骗犯李志刚有期徒刑三年，没收其430万日元和20万人民币的违法所得……”庄严的法庭对罪犯作出了严厉的判决。

罪犯李志刚，原是上海某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1990年自费出国，到了日本，李志刚方知赚钱不易。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养尊处优，怎能受得了在日本没日没夜的拼命读书，超负荷的打工呢？可不打工挣钱，拿什么去支付昂贵的食宿和学杂费呢？

一天晚上，李志刚正在酒店的后作间里洗碗，老板微笑着走到他身旁，笑盈盈地把他请到了办公室。

“我想托李先生为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李志刚问。

“我妻子已死十多年，现在一个人生活总感到有些寂寞孤独，很想请你帮我在中国上海找一位妻子。”

“行，这很容易。”李志刚当即答应，但又马上问道，“老板，你讲讲择偶要求吧。”

“我已45岁了，最好寻找的对象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人长得漂亮点，懂一点日语，其他条件你帮我把握就行了。”

“老板，我有一个表姐正符合你的条件，她现年31岁，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中学当教师，人长得很漂亮，精通日语。我临来日本前，她还托我为她物色一个日本男人……”李志刚说完从衬衣袋里摸出皮夹，取出一张彩照递给老板。



老板仔细看了看照片，满意地说：“长得很漂亮，那就请你对此事多多关照了。”

李志刚当即在办公室里打越洋长途电话给他表姐，表姐听完他的简单介绍表示愿意谈谈。

打完电话，李志刚对老板道：“我表姐叫我把你的照片寄一张让她看看。”

“不用寄了，你回国一趟把照片带去，这样，还可以把情况讲得更清楚些。”老板有些迫不及待了。

李志刚回国后，促成了他表姐与老板的婚姻。从而使他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误工费、误学费及酬金。

初得甜头的李志刚，开始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他打算干“国际婚姻掮客”这一新行当。他深知上海有那么些姑娘爱嫁洋人，而日本低档男子爱娶廉价的中国姑娘，这“买卖”定能做大的。

就这样，李志刚广交国内外的“社会朋友”，组建了一家跨国的“国际空中婚姻介绍所”，并担任了这个介绍所的“老板”。从此，他来往于上海、日本，将一批批上海女青年介绍给日本男子。钱像水一样流进他的腰包。

1992年初，李志刚上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得知他在做“国际红娘”，就托他帮帮忙，李志刚一口答应。但要她先支付20万日元，女同学为了出国，只好如数筹集了这笔钱给他。谁知李志刚“牵线搭桥”后，见“亲事”要成之际，又以要挟手段从女同学处再“宰”一刀，又要了130万日元，同时他再向那位日本男朋友更狠地敲了一杠子，要了300万日元，从而引起了这位女同学的气愤，诉诸法律，由此，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情景。

六亲不认的“女老板”

在上海的一些大宾馆和饭店内，地下“涉外婚姻介

绍所”比比皆是。每个介绍所的“老板”都与境外一些个人或“团体”联营。其中不少介绍所还闻名国外，不少境外人特地慕名来华寻找这些介绍所，以求得婚姻上的帮助。

这是一位日本籍妇女，名秀川，个子不高，体态丰腴，50来岁了，仍扮得十分花俏，加之现代整容术的发达，使她看起来似乎只有40岁左右。

五年前，秀川的丈夫因脑溢血突然弃世，留下公司的管理重担全部落在她身上。起初，秀川整天忙于公司事务，根本无暇顾及自个事儿。天长日久，随着她对管理的驾轻就熟，一种孤寂感逐渐浮上心头。一个没有生养过孩子的寡妇独身空守一套小洋房，其滋味可想而知。她很早就听说中国南方尤其是上海的男子中流行“妻管严”，且个个天性儒雅，性格温和，爱妻子，体贴人，并善于理家务，做事讲话通情达理。这样的上海好男人，早已是她梦寐以求的未来的“丈夫”了。

一个偶然的机，秀川从一个在她公司工作的中国留学人员中，了解到在上海华丽大酒店里设有一家名叫“美丽梦涉外婚姻介绍所”，这是一家主要是做日本“业务”的。

去年春，秀川满怀美梦能圆的希望，随日本旅行团来到上海。几度辗转她找到了“美丽梦涉外婚姻介绍所”。“美丽梦”老板是个少妇，名叫丽丽。父母、丈夫常年在日本，她每月拥有大笔汇款，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众多的男女青年千方百计巴结她，求其帮忙介绍日本对象。丽丽闲着没事，也当起了“外婚媒人”。由于她一炮打响之后，托她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接待方便，就去高档酒店包租了一间客房，由此“生意”越做越火。这次丽丽得知秀川是日本一家公司的老板，生怕上钩的“大鱼”溜掉，答应秀川在一个月內把此事办妥，并保证在人品、相貌、年龄、学问等方面使其满意。说来也巧。一天，丽丽的表妹来找丽丽，托丽丽为她的男朋友小方办理去日本留学。在介绍中得知小方系名牌大学毕业，又懂日文，年龄32岁，不由心里一动，暗忖是个理想的“合格人选。”丽丽当即要表妹将男朋友带来见面。

当天晚上，丽丽带着男朋友小方来了。丽丽见小方风度翩翩，举止不俗，日语讲得也流畅，满意极了。并表示出国的事，她全包了。第二天丽丽便直接打电话给小方，嘱其单独来，说有要事相告。

一见面，丽丽便开门见山地告之小方，要为他介绍一个50来岁的日本女人。

小方一听先是一愣，片刻道：“表姐，你在开玩笑吧？”

“那个女人可是个有钱的大老板，人看上去只有40

岁上下，蛮漂亮的，又无子女，以后那万贯家财不就是你的吗？”媒人最厉害的就是一张嘴，她见小方犹豫，乘胜追击道：“出国是很难的，你关系都没有还能出什么国？”

沉吟半晌，小方缓缓道：“那你表妹芳芳怎么办？”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跟她解释的。再说你俩又没有结婚，现在是恋爱自由，你怕什么？我以后也为她介绍一个老外不就完事了？我这个当表姐的都是为你们好啊！再说那老太又能活多久，你若真与我表妹好，下半辈子你俩仍可以在一起过嘛，你这么脑子一点也不活？就这样定了，明天我就挂长途到日本东京，叫秀川即刻来上海，先见见面。你娶了她，包你一世享福不尽。国外老夫少妻，老妻少夫根本不稀奇。别犹豫了。”

数日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秀川打扮一新，身穿一套黑色的时装套裙，兴奋地搭机来到上海“相亲”。

晚上，丽丽带着小方来到秀川下榻的一家五星级宾馆，在楼下的酒吧内与秀川会面。

秀川见眼前的小伙子长得漂亮，精通日语，学历又高，心里很满意。而小方见坐在对面的老太并不见老，而且长得很清秀，丰满，姑娘的风韵仍犹存，比想象中的不知要年轻漂亮多少倍，这一切出乎了他的预料。

丽丽见秀川与小方交谈时眉来眼去，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觉大事已成八九，于是她借故托辞离席。

一切顺利，丽丽为此获得了秀川给的一万美元的酬金。两个月后，小方与秀川领了结婚证去了日本东京。

一直蒙在鼓里的芳芳得知一切后，又哭又骂闹到了丽丽处。丽丽花言巧语对其哄骗了一番，随后答应也为她寻找一个有钱的“洋阔老”，这才算平息了芳芳的心头之“怒”。

不久，丽丽为表妹芳芳果真介绍了一名日本老华侨，也去了日本。不用说，丽丽又拿到了一笔可观的介绍费。

据统计从1982年中，全国约有10万对外婚夫妇，上海就占了3万多对。其中不少是通过地下“涉外婚姻介绍所”促成的。而“外媒”每成功一对的收费在1千元至1万元不等。

她失身又失“洋郎君”

寻找外婚，并非是一件美事，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里，有许许多多的“崇洋迷外”者，他（她）们不仅迷恋国外的“洋货”，而且还迷恋国境外的“洋人”和华侨。结果是外婚不成却失了身，从而铸成终生悔恨。

她，名叫施玲玲，芳龄24岁，长得眉清目秀，在南京路一家商店当营业员。几年前，她听人介绍说日本有

个学校大量招生，于是她四处托人寻找赴日门路，殊料有关方面说那学校是假的，寄出的学费也就如扔在海里，一去不回。虽然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她的出国之心却依旧不“死”；自费出洋留学不行，就一心寻走“嫁洋郎”出洋之路。

一天上午，20多名日本游客，高高兴兴地走到施玲玲的首饰柜台旁选购东西，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对她特别有“好感”，边买东西边朝她不停地微笑。她很“中意”那日本小伙子，很想同他“交朋友”，无奈肚里洋话学得太少，她只好写了张纸条给日本小伙子，表示愿与他交朋友。

日本小伙子看不懂中文，就让导游小姐看。导游小姐看了纸条后就去寻找施玲玲，谁知那导游小姐正是玲玲中学时的同班同学。

一番互问之后，施玲玲将内心的“苦恼”悄悄对老同学诉说。导游小姐听后当即表示愿为她出力，寻找一个“洋郎君”。

几天后，导游小姐去施玲玲家“报喜”，告诉她已为其联系了一家涉外婚姻介绍所，并将她的照片拿给了介绍所的老板，老板看后非常满意，称说凭这样美丽的FACE肯定能找个大老板。同时导游小姐为介绍方便，还把施玲玲带到一家设在某大宾馆内的“外婚介绍所”，让媒人见见面。

媒人是一个长得瘦长的中年男子，名叫袁某，即“外婚介绍所”的老板，此人愿是一名导游，因收受贿赂被单位除名后，就干起“外媒”这一行。袁某打量了施玲玲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我是受你的老同学之托帮点忙而已。我这个人爽快，喜欢做事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只管牵线，对方究竟如何我也只知大概，要靠自己去摸底，今后是好是坏你自己掌握，我一律不负责任。”

“那当然，当然！”施玲玲连声答道。

“那就好！”袁某不经意地笑笑，“当然我是要根据你的条件去寻相应档子的。”

以后的日子，对施玲玲来说可谓度日如年。半个月后，导游小姐兴匆匆地来找她，说是袁某已为其找了个非常富有的老板，只是年纪略大了一点。介绍费600元，保证见面约会两次，成功后再付2000元。

周末夜，在僻静的豪华酒吧。两面靠背软椅，辟出了一片幽雅的小天地，一个大腹便便颇有些绅士派头的中年蓝眼睛男子，色迷迷地盯着袁某带进来的施玲玲：“好美啊！”这个英国人会中文。

“这是施小姐。”袁某指着施玲玲，随后又指着英国男子道：“他是拉迪斯先生。”

“请坐！”拉迪斯彬彬有礼地道。随即一声响指，服

务员端来了一盘盘玲玲平时听到价格便咋舌的美肴。

“施小姐是我们上海的一名美人，她呀，就是很想出洋见见世面……”袁某挑明话题。

袁某抬腕看了看表，似有些着急地说：“有个朋友还在家里等我呢，恕我失陪了。”以此脱身。

施玲玲和拉迪斯经过几次接触，很快就进入疯狂的“热恋”之中。拉迪斯挥金如土，施玲玲以身相报。时机成熟，施玲玲向拉迪斯提出要出国去看看，拉迪斯总是推却说，去英国手续麻烦，他正在想办法。然而，半年多过去，施玲玲已流产两次，“红派司”没有一张，出国依然是个梦。

终于有一天，拉迪斯对着身态有些臃肿的施玲玲缓缓地说：“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些合不来，照你们中国的话说，没有共同语言。如你一定要缠着我，那我只有返回英国或香港，不再回来！”

施玲玲顿时呆了。许久，她才回过神，眼泪泉一般地涌出，绝望地大声说道：“难道你一直在玩弄我的感情，骗我！”

“骗？玩弄？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这不是两相情愿的吗？当时我们又没有说一定要结婚！”

当晚，施玲玲哭哭啼啼地去找媒人袁某。

袁某闻讯不惊，说话却冷静得像局外人：“我跟拉迪斯先生也不很熟，他只是我过去当导游时的一名老游客，对于他的为人我就更不太了解了，这样吧，我去找他，再试试……”袁某深知英国家伙玩厌后像是在扔破帽子，再去找他这“希望”等于是零。

第二天，袁某去找拉迪斯“商量”，结果对方只是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摞美金，让袁某转交给施玲玲作为补偿。当然也少不了再次给袁某“意思意思”。

晚上，袁某去了施玲玲家，双手一摊：“没法了，你俩后来的事都是双方情愿的。要是你先让他开结婚证书就……”他把一叠钱塞到她手里，“这是补偿。此事到此结束，如闹大对你的名声不好听。另外，我会再为介绍的。”

不久，袁某又为施玲玲找了个加拿大老华侨。这次施玲玲总结了上次吃亏经验，立即同老华侨开了结婚证。出国梦总算圆了。她能快活吗？

袁某开设的地下“涉外婚姻介绍所”，据说成功率在80%以上，名声悄传，登门求“媒”者不少。他说：“愈是求媒人多，成功率愈高。这是因为挑选余地大了，我可以按档次、年龄分类为他（她）们编排。”袁某曾不无得意地对人炫耀说，“做红娘，也要讲艺术，因为这是一门心理学。”

其实，袁某的外媒形式十分简单，他有一份欲在华

觅偶的洋人或华侨的名单。这些名单主要有他过去的一些洋人和华侨老游客提供给他，其次是原单位的同事提供，他们要求的中国女性是年轻、漂亮、温柔。国内欲找外籍丈夫的姑娘在他那里也有花名册，她们的要求条件除有钱外，就是能带她们出国，享受富裕的生活。袁某在为他（她）们的“架桥”过程中，只是根据双方情况对对号，然后将国内姑娘的照片拿给男方或寄出境外（男方不在国内），如对方看中，约定会面，其中不少人特地从境外来中国大陆相亲，再经媒人一番美言，成功率就高了，因为男女之间不可能“长谈摸底”，几乎都决定在见面时的那一刻便“钟情”了。

不择手段合伙斩“洋客”

不可否认，“华侨”两字，在中国大陆的许多人眼中，几乎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华侨成了大陆许多男女瞄准的第一求偶对象。而不少华侨出于种种原因，也将丘比特之箭射向大陆。这就给了地下涉外婚姻介绍所的“外媒”们赚大钱提供了方便之机，他们由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赚起大钱来。一些华侨“阔老”在“斩”后又未相中而大呼上当。另一些人即使囊中羞涩，也往往打肿脸充胖子，处处装“财神”，结果有人分掉肉里钱，又未娶上妻。

他名叫朱大敏，40岁上下，在新加坡也只是个“下等”的平民。且不说工作仅在一家饭店内打杂，收入微薄无法“阔”，就连长相也“寒碜”，猴脸小眼，个矮身瘦，脚且略跛。如此档子的人，到了中年还光杆一个，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朱大敏看到不少与他“档子”接近的男子，一个个地到中国大陆领回漂漂亮亮的老婆，心里痒得发急。于是，他东跑西颠地打听门路，终于有人向他指点了中国大陆娶妻的“秘密”。他便急急忙忙同中国上海的一家叫“东方喜鹊”的地下涉外婚姻介绍所写信联系，同时拼命打工攒钱；每天早上去饭店搬菜，晚上去夜总会附近替人擦皮鞋，一年省吃俭用，手头终于有了一笔折合人民币3万元的积蓄。

1991年春，朱大敏匆匆来到中国上海，马不停蹄地同“东方喜鹊”涉外婚姻介绍所老板余某取得联系。余某是一个干瘪老头，狡黠的细眼忽闪忽闪，拐弯抹角地打探朱大敏的身份及腰包虚实。朱大敏被外媒余某追问得心直发毛，索性攒起派头，“唰”地甩出有千元数的一叠钞票：“这是介绍费，成功后再追加5千元。本人是新加坡一家大酒店的老板，钱不在乎的。”

星期天的傍晚，外媒余老头，带了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来到朱大敏住的酒店。

“这是梅小姐，人称南京路上一枝花。”余某指着姑

娘道。随后他又指着朱大敏道：“这位是朱老板，在新加坡开有一家大酒店，是有钱的大阔佬。”

那朱大敏却连连点头，自然要装大老板以示“高贵”。

架起“桥”之后的第二天，朱大敏就迫不及待地约梅小姐逛起南京路。不知何时梅小姐的手已挽住了他的手，这使朱大敏一下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带回新加坡。转眼梅小姐带着朱大敏走进了一家高级珠宝首饰商店。

在首饰柜台旁，小梅要营业员拿出一枚价值千余元的嵌宝戒，顺手戴在指上对朱大敏道：“你瞧，我带这个好看吗？”

“你人漂亮，戴什么都很美。”

“我想买下，可今天没带钱。”梅小姐双眼看着他，等待其开口。

“我来出钱买吧！”朱大敏大大方方地掏出钱包。

梅小姐又乘机叫营业员拿出一根足金项链。

“这金项链纯色不太好，以后我从新加坡买了送你。”朱大敏生怕她再开口买下，就抢先说道。

“不么，我现在就要。又不是买给别人，我早晚是你的人么。”梅小姐故意撒娇似地拉了朱大敏的衣角，“以后这东西，不全都是你的吗？”说着她在众目睽睽下捧起朱大敏的手狠狠地亲了一下。朱大敏被她这一“招数”给“击”得神魂颠倒，不由自主地再次慷慨解囊。

走出珠宝店，梅小姐又把朱大敏带进一家高档的服装精品商店。一套新颖别致的时装又吸引住了梅小姐。

一见标价，朱大敏的脸上微微渗出了汗珠，未等梅小姐开口，便急急说：“我今天出来没多带钱，还是……”

梅小姐的脸刹那间晴转阴。不一会，她自顾自地往车站方向走去。

“你这是干什么呀？”朱大敏追上去问道。

“我要回家。”这时一辆电车进站，梅小姐跳上车。

“唉，那我们下次再……”朱大敏急切地问。

“我会叫介绍人传达的。”她甩下句话，车开动了。朱大敏望着远去的电车，茫然不知所措。

第二天，梅小姐带着一个男孩来到外媒余某处，一见余某道：“公爹，昨天那小子太小气了……”原来他是他的儿媳。

“那丑家伙小气？”余某问道，脸上却露出了一种不信的表情，“你可别独吞了，我是看在死去的儿子和孙子分上才让你发发财的！”

梅小姐不高兴地 from 衣袋里摸出一枚戒指和一根项链往桌上重重一放：“你也太不相信人了！你把那个姓朱的当成前几个美国来的老华侨了？他才比不上他们的派

头呢？”

新加坡华侨朱大敏最后“相亲”成功否，这一切都是不得而知。但是，在地下外婚介绍所的外媒者中，像余某这样搞“连档”骗诈求婚者的情况不是个别的，他们往往利用求婚者娶妻心切，就不择手段地大施“美人计”，让漂亮女人先假装“谈恋爱”对他们先敲掉一票后，再借故姑娘“不喜欢”而告吹。随后再为他们真的作“媒”。当然，这一切境外来的华侨求婚者是不知道的，他们也不可能知道。

她把“一凰”介绍给 “三凤”以求大利

在形形色色的地下外婚介绍所的外媒者中，他（她）们的赚钱手法各不相同。有的外媒为了多赚钱，竟然把一个求婚的境外华侨或洋人介绍给多名国内的求婚者，从而收取多份介绍费及礼品。

这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外媒”，人称张家姆妈，年届六十有五，却不显老态。她家中富有，却不知足，总想着多扒分，好在巧舌如簧，善为人做媒，加之女儿又在香港，专替她物色“对象”，为此还特地申请装上了直拨电话，两地一线牵，办起了一家“外婚介绍所”。

有位中国血统名叫杰克的英籍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离婚不久便想续弦，于是把目光投向大陆，他认定大陆姑娘的挑选范围广。

通过张家姆妈的女儿，他来大陆结识了张家姆妈这位老“外媒”。

“我在大陆的时间不能太久，为此想尽早挑选到一个理想的姑娘做老婆。”杰克直爽地说。

“这好办，我给你多介绍几位漂亮姑娘让你选择，可是——钱就要……高了。”

“钱没有问题。这样吧，我按人头给你介绍费，如成功的话，我定会再重重酬谢你的。”杰克说完从衣袋摸出一叠人民币往张家姆妈手里一塞：“三千块小意思，你先收下吧。”拿了钱，张家姆妈自然办事有了劲了。当晚她就把原先托她介绍的三位姑娘依次排队，开始“接力”式般的介绍。当然，三位姑娘是绝对不知情的。因为她们彼此都不认识，同时也都必须付一次“介绍费”。这对张家姆妈来说是一笔大收入。

“三凤逐一凰”的三角“大战”开始了。杰克第一天与三位姑娘见面：上午，他与一个名叫菲菲，身材苗条，脸肤白皙，容貌清秀的姑娘在早茶中见面；下午，他在酒吧与一个名叫娜娜，身高体胖，圆脸大头的姑娘约会；

晚上，他又与一个名叫琴琴，脸蛋漂亮，体态丰满的姑娘在舞厅内碰面。

杰克见过了三位“妻子候选人”之后，先把长得身高体胖、圆脸大头的娜娜姑娘“筛掉”，把重点放在菲菲和琴琴两人身上。

而非菲和琴琴为了能博得杰克的好感，对他特别热络、殷勤，讲话做事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他，失去其的欢心从而失去去英国的机会。

而杰克每天在她俩中周旋作乐。时间一久，菲菲和琴琴互知有“情敌”，争风吃醋起来。彼此为战胜对手，夺得杰克的“心”，她俩各施计谋，不约而同地把“计谋”重点放在重礼“孝敬”媒人张家姆妈身上，以期借媒人之口“撬掉”对方。

张家姆妈乐得坐享其“礼”，对菲菲说：“我一定为你在杰克面前多多美言，使他深爱你。”对琴琴说：“我肯定为你出力，战胜你的情敌！”其实她收了重礼后，根本没有为她俩说过一句话，出过一点力。

张家姆妈是一个精乖的人，她要等着自然结果，因为她心里明白，无论哪一位成功，都少不了对她的重谢，所以不必去为她俩在杰克面前白费口舌。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角恋爱”，杰克最终选中了美丽漂亮、体贴温柔的琴琴姑娘。

其实是琴琴姑娘的“嗲功”勾住了杰克的魂，从而战胜情敌菲菲。

外媒张家姆妈由此又得到了一万元人民币的酬金。情场上失败的非菲姑娘，却哭着又去寻找张家姆妈，要她去找杰克评理。因为她已被杰克“占了便宜”，精神上受不了。

而张家姆妈冷淡地对菲菲道：“我事前曾对你讲清过，我只管牵线搭桥，其它一概不管。是你自己心热的时候冲动了……这能怪谁怨谁？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伤心难过都没有用，日后我再为你介绍一个如意的华侨吧。”

就这样，张家姆妈将菲菲打发走了。

我们不能绝对说涉外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不能说“外媒”们纯粹为了钱。但是，外媒中的贪钱之烈，手段之狠，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产生的偏向及其旁门左道往往使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外媒”究竟是“桥梁”，还是“祸水”？地下涉外婚姻介绍所是害人“魔窟”，还是成全他人婚姻美事的“宫殿”？

（责任编辑：仲文）

“中东路事件”与莫德惠

● 刘作忠

1929年，我国革命政府同苏联政府因中东路主权问题，发生了武力纠纷。中东铁路，系俄国沙皇政府为侵略目的，于1903年在中国境内建成的一条丁字形铁路。当时称东清铁路，它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从哈尔滨又有一条线南达大连、旅顺。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军占领，改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称东清铁路，民国成立后改称中东路。根据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东路属商业性质，由中、苏共管。

1929年5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收回中东路路权。5月27日，哈尔滨特警处奉命派军警搜查了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并驱逐在中东路工作的苏方职员。5月31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7月7日，张学良专程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决定武力收回中东路。7月13日，苏联政府通牒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中俄合办铁路的协定；18日，苏联宣布对华绝交；20日，苏军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8月17日，中国政府发表与苏联交战的宣言。自此，中、苏双方经常发生武装冲突。12月22日，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苏伯力与苏方代表谈判后签订《伯力会议草约》（即《伯力协定》）。协定规定中东路暂时维持冲突前的状态，双方派代表到莫斯科继续谈判。

1930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委派时为中东铁路督办的莫德惠，出任中苏会议中方全权代表赴莫斯科谈判。莫德惠，字柳枕，天津北洋高等巡警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段祺瑞内阁农商部次长、奉天省省长、东北大学校长。莫动身前夕，夫人傅静娴一病不起后辞世。莫毅然以国是为重，不及夫人殒殁，便忍悲含泪匆匆就道。莫的女儿披麻戴孝，赶

赴车站为持节异域的父亲送行。莫在出发前，又面告全体随员一律改换中山装制服，以明示服膺中山先生遗教。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不久，专门委员刘泽霖突然失踪。经了解，原来是为了一件小事被苏联警察拘捕，苏方想借此给代表团来个下马威。莫察觉苏方之用心，决定向苏方提出抗议，要求其必须当面道歉，惩办凶手并写出书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对全体随员说：“如果苏方不作满意的答复，你们先回国，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同他们较量。苏方开始只愿口头道歉和惩办凶手，而不愿书面保证。莫一面派人交涉，一面下令随带专车升火待发。苏方见我方态度强硬，只得派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登门，向莫德惠、刘泽霖及代表团全体成员道歉，并送来照会，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谈判期间，苏方代表、外交部次长加拉罕，坚持《伯力协定》，维持原状；莫德惠却按我政府指示，收回路权。折冲数月，苏方理屈词穷，只得让步。1930年10月11日，双方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蒋介石闻讯，专门致电嘉勉莫德惠和代表团成员“不辱使命”。在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后，莫回国请示。国民政府于1931年2月27日再次指示莫德惠：

一、中东路问题以赎回为原则；二、通商问题以平等为原则；三、复交问题最后决定。

谁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攫据中东铁路。已开过25次的中苏会议，也就无形中断。会议期间，莫时逢50寿辰，他赋诗纪念：无端狡寇犯边城，仗节何辞万里行，终使虏庭能俯首，只因大汉有先声。

（责任编辑：仲文）

“寿堂牙痛安”牙病心放宽

——“四病克星”用药反馈



敬告读者：海豚牌“四病克星”（指高血压克星—资寿尼群地平片、牙痛克星—寿堂牙痛安胶囊、感冒克星—寿堂效灵感冒胶囊、痛经克星—寿堂妇科万应膏）。全国销售，石家庄市新华制药厂办理邮购，资料备索。

邮码：050091



真是“神药”

去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那5岁的“小皇帝”突然闹牙痛，痛得在床上大闹“天宫”。我赶忙踏着夜色跑药店。什么去痛片，安乃近，强的松；什么“牙痛一粒灵”，服过都不顶用。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带儿子到了沙坡乡医院。医生给开了瓶石家庄市新华制药厂的寿堂牙痛安胶囊，我立即给他服了一次。真灵！不到一节课时间，我那可爱的“小皇帝”再也没闹过牙痛。“牙痛安”真是“神药”。后来，我把这药推荐给同校老师使用，仅用两瓶就治好了李老师患了三年的牙病。

●广西陆川沙塘乡北安学校 尹悦文

我是一个医生，牙痛了两年，治牙病的药也用尽了，就是好不了。去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家庭医生》报上“四病克星”的介绍，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第二天我到邮局汇款去石家庄市新华药石邮购：寿堂牙痛安。半月后，10瓶“牙痛安”寄来了。这10瓶药，除了治好我的牙病外，还治好了20多个牙病患者，至今没有复发。

“牙痛克星”使我联想起其它三病克星，接着我汇款300元邮购“四病克星”。几个月来，“四病克星”成了我治病的首选药，真是药到病除，名不虚传。

作为一名医生，有好的技术，还要有好的药物，对这四种常见病，只要病人愿意并坚持接受这四种药的治疗，是有把握治好的。

* 四病克星 * 成了我治病的首选药

●福建邵武市金坑乡危名素诊所

我是一个多年牙周炎患者，受尽难言之苦，多方投医，中药、西药服了不少，终无良方。

牙出血的症状更使我痛苦和难堪，加上口臭，使我不敢在人前说话，真象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痛苦万分。

去年，偶然一次去到医院，医生给开了二瓶石家庄市新华制药厂生产的“牙痛安”。一瓶药未服完，口臭病除。当时我认为这可能是暂时的效果，谁知竟出现了奇迹——服了两瓶后，停药近一年，没有再犯过。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最大的幸事。我从内心真诚地感谢新华制药厂，是他们给我们病人研制出这样的灵丹妙药。

“寿堂牙痛安” 帮我喜结良缘

湖北罗田石桥铺粮油食品所 陈光明

我闹牙痛，不仅疼痛难忍，且伴有口臭，精神压力很大，和我热恋的姑娘几次提出要与我分手，过去我虽多方投医问药，都无济于事。还是我的恋人理解我，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报上看到石家庄新华药厂生产牙痛克星的广告，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跑遍县城也未买到，只好托人从武汉买到两瓶“寿堂牙痛安”，在牙痛发作时服了两粒，真灵！牙痛很快止住了。服完两瓶后牙痛再未犯过，口臭也消失了。更可喜的是几次要与我分手的姑娘终于与我喜结良缘。

感谢灵丹妙药 * 寿堂牙痛安 *

●河北衡水市砖瓦厂 马炳武

读者、作者和编者 热心、热情通热线

亲爱的读者：

《炎黄春秋》自 1991 年 7 月创刊，至今已满二周年，共出版了 16 期。她靠着您和各方面朋友的关心支持，正顺着改革开放大潮步步前进。为了使她今后步子走得更正、更快和更稳，也更受大家喜爱，特请您对本刊提出批评意见和指导建议。现附表如下，请抽暇填写，及时寄下。

请接受我们的谢意和敬意！

《炎黄春秋》编辑部 1993. 7.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
地址			邮编	电话
您经常阅读并喜爱哪些杂志？				
本刊您是订阅、零售、借阅的（请在“是”上画圈），已续过总第 _____ 期				
您认为本刊文章好的有：				
差的有：				
您认为本刊封面好的是总第 _____ 期				
差的是总第 _____ 期				
您认为本刊标题、版式好的是：				
差的是：				
您认为本刊应增、减哪些栏目或内容？				
您认为本刊有否特色、优点？				
有何缺点、错误？				
您对本刊有何建议、要求和希望？				

（此表欢迎复制、多写、常寄）

一桩历史谜案：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伟人之女李敏的往事近情
保卫南京：唐生智司令蒙冤

『老托派』郑超麟坎坷一生

『我丁玲就是丁玲！』

汪东兴谈毛泽东